S50
30
8169

瞿秋白著

中國革命

與

共產黨

(фам.) (имя) ссылочная
ЦЮЙ, ЦЮ-БО (=Страхов)

КИТАЙ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Издание КУТК. Москва 1928 г.

[На китайск. яз.]

Цюй, Цю-Бо

Страхов,

КИТАЙ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中國革命与共產黨

目次

I. 中国革命領導權之爭
1. 中国革命之性質与階段
2. 国民党问題与革命鬥爭方法
II. 中国共產党之過去与前途
1. 中国共產党与機会主義
2. 八七緊急会議
3. 十一月中央擴大会議
4. 廣州十二月暴動
III. 中国革命當前的问題
1. 誰得到領導权
2. 武漢反動与廣州暴動
3. 五大示衆
4. 共產党的任務

S50
30
8169

252837

1.263

中國革命與共產黨

I 中國革命領導權之爭

(一)中國革命的性質和階段

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中国的大革命，雖然有極大的世界歷史的意义。中国的国民革命，经过国民党的叛变，遭着历次的失败，他现在是进於更高阶段的发展，进於苏维埃的革命，引起更多更广的工农兵士群众的奋鬥，使阶级鬥争的形势更加明显而剧烈。这两年中中国革命的过程，和中国革命之中阶级关係的变更，都是我们所应当研究的。

中国革命究竟是甚麽样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主义革命呢，还是无产阶级性的社会主义革命呢？这一问题的答案，决不能是机械的，机会主义派的要求，正在於他们要利用『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而断定中国的领导权应当属於国民党（属於资产阶级）；或者像托洛茨基似的，要故意的『左倾』说中国没有封建制度，中国革命乃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而口头上断定革命的领导权自然是属於无产阶级，（因而轻视中国的农民土地革命）。所以只有机会主义派才能武断的要求对於中国革命性质问题机械的答案，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或者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革命。

事实上中国革命的性质，並不是简单的民权主义革命，主要的是反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民权主义革命，而以彻底的土地革命，为其社会内容，有确定的生长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趋势。

同时，中国革命发生於俄国十月革命之後，发生於世界革命已经开始的时代；如果我们将中国革命隔离着来看，那末，『自然並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中国革

命和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反抗帝国主义暴动的战争一样，
也这些很多的殖民地暴动，並不僅是無產階級的暴動，
而且部份是小資產階級，以及激進派資產階級的暴動。
——這些運動大多数不是無產階級領導的——然而這些
过程無論如何不能隔離着來看。在世界歷史的过程中，
這些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份。反对世界資本的鬥爭之指
導权，在世界無產階級的手裡，而無產階級領導起其他
階級。因此，他們的運動亦就是世界革命的組成部份，
（布哈林：一九二四年六月共產國際第五次大会上党綱
向題的報告）。中国革命，所以向始便是世界的社会主
义革命之組成部份。他的目標自然不能不是列强帝国主
义的統治。

中国革命是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在這一意义上当
然可以得着兩方面的結論：第一，中国的民族資產階級
經济与帝国主义的經济侵畧相同，中国的資產階級在革
命的初期是贊助並且参加革命的；中国革命的資產階級
性也就在這種对外的經济鬥爭裡表現出來。第二，中国
的反帝国主义鬥爭與世界無產階級的反帝国主义的運動，
是在同一個世界革命的營壘之中，是在第三国际指導之
下；中国革命發展的前途，除非是不勝利，否則必然是
非資本主义的，是趋向於社会主义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

再則中国式的豪紳軍閥封建制度，是帝国主义剝削
中国的主要基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在中国境内開設
工厰，布置了統一般的收買原料的買办制度，輸入多量
的工業製造品的日常必需品——這種經济侵略，使中国
經济落後而不能發展，中国的民族資產階級不能成反封
建的势力，他多半是與封建的豪紳地主經济有極端密切
的關係。帝国主义帶着資本主义式的貿易，侵入中国的
農村；這種現象只是使中国的豪紳地主更加商業化，更
加重剝削，去做帝国主义压榨中国農民汗血的中介，同

時也就做軍閥統治的支柱。（托洛茨基的反对派說，中国只有商業資產階級侵入農村，而並非封建式的地主制度，這完全是不对的。他们所見的，恰好与事实相反；中国並非單純的商業資產階級侵入農村去購買土地剝削，恰好是地主豪紳階級在帝国主义的商業侵入與經濟压迫之下，只能半資本主义化，而不能不維持中世紀的剝削制度，而且不能不日益加重這種剝削的过程）。所以中国革命对内的目標，不但是政治上推翻軍閥制度，而且必須徹底的实行土地革命，必須要徹底的肅清封建制度的一切餘孽：地方上的豪紳統治，地主階級的私有土地等々。本來也用不着怪疑的，——一切民族主义的運動，只能是資產階級民权主义的，因為落後国家的主要群衆，都是農民，而農民正是資產階級的資本主义經濟関係之代表。如果說無產階級的政党——对於農民運動沒有一定的態度，不去在事实上贊助這種運動，而能在這些落後国家之中实行共產主义的策略及政策，——那簡直是烏托邦的幻想』（列寧：一九二〇年共產国际第二次大会对於民族问題的報告）。而在中国的革命，則一切具体的客观形勢，尤其明顯的表明：中国革命的社会内容，必然是要徹底的土地革命。

中国革命是土地革命——在這一意义上，我们亦可以得着两方面的結論：第一，中国革命的發展進到土地革命的開始時期，才算正是民衆的民权主义革命的開展；徹底的土地革命——推翻豪紳民主階級軍閥的統治，肅清一切封建餘孽，亦就是更進一步的掃除帝国主义对華統治的支柱（比争得関税自主，廢除不平等條約等更進一步），這種徹底的土地革命，即使一直進到土地国有，他的社会内容也是最徹底的資產階級民权主义革命，不是紳商大資本家的資產階級，而是農民的資產階級革命。第二，中国民族資產階級與豪紳地主階級有極密切的関

係，同時，中国的無產階級，在国际無產階級指導之下，奮發的力爭独立的群衆闘爭之発展。因此，農民的土地革命運動，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而蹶起的時候，不但豪紳地主階級立刻要反動，就是民族資產階級也不会不背叛革命。只有中国無產階級能夠領導農民的土地革命；而資產階級，甚至小資產階級革命家，都至多只能的想用和平方法改良土地関係以避免土地革命。因此，中国無產階級必須爭得革命的領導权、領導農民群衆的平民式的土地革命，而徹底的完成資產階級民权革命。那時，中国的民族資產階級，不但停止其為革命中之一種動力，並且要変成反革命的力量。中国的革命，徹底的土地革命，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更確定的具有生長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趨勢。

中国革命的性質，由於他的对象，固然是資產階級民权主义的，可是由於他的動力，却是無產階級的。中国革命的社会的内容，雖然是土地革命，徹底肅清封建餘孽的資產階級民权主义的革命，可是并不因此而必須由資產階級衆取得革命的領導权。恰々相反，中国革命正因此而不能不由無產階級爭得領導权。中国的資產階級不但不能領導農民的土地革命，並且不能夠參加初期徹底実行反帝国主义的革命。他能夠參加初期的反帝国主义革命，但是，他參加的目的，実在是因為他恨帝国主义和軍閥蒿起了革命，蒿起了工農廣大的群衆革命運動，所以他要參加革命，而奪取領導权，以為消滅革命之用。

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他的性質正在他的急劇発展之各階級裏明々白々的表現出衆。中国革命的階段，也就是無產階級与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权的过程。

中国辛亥革命失敗以後，於歐战期間開始第二個革命的浪潮（五四運動），中国的民族資產階級以及小資

產階級群衆逐漸積極起來。同時，中国無產階級也躍登政治舞台。從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到一九二五年五卅運動，是革命前夜的時期。這一時期之中，中国社会中之各階級都在團結組織自己的力量，但是，当時無產階級已處於革命先鋒的地位；反帝国主义的鬥爭雖然早已開始於五四運動，可是引導這一運動到真正革命的道路：和苏联革命及世界無產階級联合，拋棄共某一强国親善以反对別一强国（親美排日）的策略，提出廢除不平等條約及関稅自主等要求，揭破美帝国主义的欺騙軟化政策的——始終是無產階級。無產階級的罷工和種々鬥爭，也在這時期中大々的發展起來。中国革命是以無產階級為骨幹而發出來的，這一事实，無論何人不能否認。国民党的改組，国民革命軍的改造，抵貨罷工鬥爭的劇烈，廣東農民協会的開始組織与鬥爭，以及廢除不平等條約的要求，国民会議要求的提出，——總之，一般反帝国主义及軍閥的運動——，都是無產階級及其政党做先鋒的。

五卅運動的爆發，便將前此積聚団結的一切革命力量，滙合而奮發起來。說五卅運動是中国革命的開始，決沒有什么誇大的。五卅之後，中国革命便急劇的進展，中国的階級鬥爭劇烈起來，中国革命中階級分化的过程也像迅雷閃電似的開展，中間經过廣東国民政府的成立，五卅上海的總同盟罷工，廣東十六個月的省港罷工，国民政府的北伐，上海無產階級的暴動，武汉国民政府与蔣介石南京政府的对立，蔣介石李済琛滬粵反動，汪精衛唐生智的武汉叛変，八一的南昌暴動，直到一九二七年廣州的十二月暴動。中国革命的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过程，是由一般的反帝国主义運動，進於革命战爭的北伐，進於推翻中国一切封建餘孽的土地革命。無產階級在這过程中的作用，正是聯合战線中最先進最勇猛最徹底的革命階級，爭取国民革命的領導权，力求領導

中国之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到底，实行彻底的土地制度的变革，取得民权革命的完全胜利，而使他进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就在无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的背景裏，显然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自从五卅运动到广东北伐达到扬子江流域时期。这一时期中的革命运动力，仍然是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不过要注意的便是：五卅运动一开始，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就实行他的妥协政策及出卖无产阶级的策略，就发现戴季陶主义与蒋介石的三月二十日政变。国民革命之中，虽还说不上阶级分裂，但是已经有日益明显的阶级分化的过程，资产阶级就已经开始他的"帝国主义之下的立宪主义"的策略。甚麽叫做帝国主义之下立宪主义呢？这"立宪主义"就是中国资产阶级要利用中国无产阶级及劳农群众的革命势力，来求得中国资本家的地位，向帝国主义要求让步，中国资产阶级利用五卅时期的群众运动，希望在关税会议，法权会议，上海租界的华董问题上得到帝国主义方面的相当让步。总之，这一阶段之中，中国资产阶级虽然还反帝国主义，但他并不要求帝国主义对华统治力完全推翻，他只求帝国主义方面的某种让步（例如关税自主），他已经準备着和帝国主义妥协，而共同来压迫工人阶级的斗争。北伐的革命战争，虽然客观上民族资产阶级是拿着武器与帝国主义工具作战，但是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同样是"帝国主义"想借此一面扩充自己的兵力以压迫工农，一面取北洋军阀而代之，以求得与帝国主义和平修改条约之资格（中央政府）。同时在这一阶段中，中国的农民运动已经开始迅速的发展。——从河南的红枪会运动到广东农民协会运动，已经含着争取政权的意义；在那个时候，海丰农民便叫出"国民党死了，烟得臭了，

我们要農民政府》，——這便是平民已經起來要推翻豪紳政权的象徵。一九二六年湖南以至湖北農民運動的発展，更進于偉大的劇烈的農村鬥爭，与当地工人労働者的鬥爭，同時並進，已經開始將土地问題直接提到革命的議事日程上。這時期中便更加明顯的暴露中国資産階級的第一特性：他一開始便站在反对土地革命的方面，他不但是与豪紳地主階級"妥協"，他簡直是領導豪紳地主階級反对農民的鬥爭。联合战線的破裂，可以說是在這一联合战線開始行動的時候，便已経発端了。

第二階段是　從国民革命軍達到武漢，到武漢汪精衛反動的時期。這一時期的革命联合战綫，就是所謂工農小資産階級的联盟；蔣介石派的叛変是在帝国主义威脅利誘之下，在豪紳地主階級的新軍閥推動之下，中国民族資産階級所領導的反革命運動。中国資産階級的特性，在於他経済発展上的薄弱，他雖然在五卅運動前後已経畧為共買办階級分化，但是他和半封建性的豪紳商業階級仍旧是混合的。商業和的豪紳地主階級実在是民族資産階級的"右翼"。一九二七年四月叛変之中，蔣介石与李済琛代表這両個階級的混合战綫：民族資産階級与豪紳地主階級的混合战綫，反对工農小資産階級的革命联盟。同時我们還应当注意両件事：一是中国民族資産階級経済発展的薄弱，使一般店東小資産階級以及種種中等階級，和他相联絡而混合着——小資産階級的上層分子（店東等々）実在是民族資産階級的"左翼"。二是中国的民族資産階級在如此薄弱的状態之下，他沒有全国範圍的階級力量，尤其是豪紳地主階級帶着極濃厚的地方色彩，内部分着許多派別，当無産階級与資産階級破裂联合战綫的時候，那豪紳地主階級内部各派各系之互鬥，也在寧漢分裂鬥爭的掩護之下，雙方插着新式的旗幟進行。因此当時南京所形成的反革命中心，是

以民族資產階級做領導，結合宋南的豪紳地主階級，復以革命的口頭禪及種種欺騙政策，对外抗爭的激昂態度，（僅僅態度而已）等等去征取上海暴動期間革命熱情並衝動的小資產階級，以進攻無產階級及農民的革命鬥爭。同時武漢所形成的革命中心，應当有無產階級領導的工農小資產階級聯盟的形成，應当在劇烈爭鬥的過程之中，去提高並保障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去抑制以至排除武漢內部的資產階級及豪紳地主的勢力，而力爭民权独裁之實現。寧漢的分裂并沒有劃然分明的使武漢之中立刻實現純粹的工農小資產階級的聯盟。（事實上也不会如此）當時的武漢之中，不但有資產階級的勢力，并且豪紳地主階級還握有極大的权利。武汉內部的爭鬥，和武汉與南京的爭鬥有同樣的社会內容，就是工農的徹底的民权革命与豪紳資產階級的背叛革命相鬥。武汉內部的分化，在武汉政府尚未完成的時候，便已經開始。武汉領袖在当時真是一步都離不開的，只是責难太多了。他們的朋友，他們在企業界的親戚，以及擁有土地的豪紳，都对他們警告，這使怯弱的他們發生了恐懼了；（美国週報，1927年12月7日号）。对对蒋介石李济琛的嘉生智軍隊，湖南的豪紳地主階級的勢力，同時已对工農進攻，勾結湖北的資產階級之孫科等已也向工農進攻，他們的背後本帝国主义蒋介石的對鑽政策，督促着。小資產階級尤其是店東小資產階級是在資產階級的掌領之下而動搖，当時就是共產党的中央，以及地方指導机関，也跟着小資產階級動搖，——這是我們必要公開承認的。其結果不是無產階級領導農民之廣大的熱烈的爭鬥，領導小資產階級去实行革命，而是小資產階級要領導無產階級去制止農民的爭鬥去停滯革命，以至去出賣革命。這是不是工農小資產階級革命聯盟的实現？当然不是的。這一聯盟是受小資產階級的動搖妥協以及

共產党机会主义的指导机关的妥协而恶化了，而丧失其革命性了。武汉政府的反动，武汉革命中心的消失，小資產階級离开革命而动摇，当然是革命失敗之又一表現。小資產階級的首东，他们的革命，比帕反革命还要秉得利害，他们夢想着祈禱着"資本鎮一战綫"的勝利，以反对手工业人店員的進攻。這一類的中等階級同時就是"小地主"，就是依賴封建式的剥削方式以維持的階級，他们反对土地革命。

中国革命第三階段是国共完全分裂，南昌八一暴動到現在。這一時期的開始，雖然表徵一是革命的武汉中心消失，及革命遭着第二次的打擊；但是中国無產階級的政党，在国际無產階級的指示之下，開始糾清内部的机会主义，整頓失去組織無產階級的力量，去領導農民的暴動。南昌的八一暴動及湘鄂贛粵的農民暴動，共產党与武汉国民党中央的破裂，更使中国知識分子的小資產階級，官僚的知識階級，或者說時髦些，要員業，幹事業的知識階級，离开工農的革命。所謂左派国民党要消失了他的基礎。但是革命战綫雖然縮小，革命主要動力的兩階級——工人和農民的革命力量却得着更廣大而深入的發展。工農群衆在這一階段之上，一直發動到極偏僻的鄉僻壤之中。如果向来認為專利的反帝国主义口号，在五卅以後很迅速的普遍到一般小資產階級群衆（工人不用說），成了市儈小販的街談巷議，編成上海灘上的小唱，成了一般学生知識分子所謂青年的天經地义；那么，不久以前还認為是共產党中（"左傾派"的土地革命口号，在武汉反動之後也很快的要成為一般工農群衆的口号，極廣大的散佈出去，隨着自发的一般農民暴動而普及到一般極廣大的群衆之中，一直波及到兵士的群衆。現時的世界简直完全改觀了樣子了。不但蔣介石和李濟琛的国民党，甚但汪精衛和張發奎的国民党在工農

群衆中的信仰完全喪失，甚至「真正国民党左派」或者「国民党的真正左派」在工農兵民之中的信仰也日益丧失淨尽。五卅以前「学生子」這個字在工人以及農民群衆中等於「革命党」，工農是欢迎的，往々自己来請他们去做領導的。武汉反動前後，不但普通的「学生子」，不但国民党的「純潔青年」，甚至於稱為共產的「学生子」（机会主义的共產党員，——国民党的真正左派）也已經在群衆之中喪失信仰。農民群衆遇見這些不堅決的革命者「領導者」甚至於要　他们，（廣東某縣）；工人群衆对於這些不領導工人鬥爭的「領導者」；也拿着切菜刀追着殺（唐山）。這是工農革命勢力中间的过程。同時忠实同志的正式国民党，在武汉清党，江精衛受唐生智利用以為驅共工具之後，再当一次「反共倒蔣」的工具；唐生智派与廣西派反動軍阀雙方夾攻蔣介石的工具，不久蔣介石去後，唐生智和廣西派衝突，江精衛亦能不同着張發逃回廣州，蔣介石又能利用江精衛来反对廣西派軍阀及西山会議派政客之特別中央委員会。廣州暴動之中，江精衛派完全消滅，完全投降蔣介石，而蔣介石的統一全国与南京政府主席的成功，再伏下蔣桂兩系的混战禍根。這期中湘，鄂的寧汉战爭，廣東的張黃战爭，及国民党中種々複雜的斗爭，都只是表現豪紳資產階級逐步背叛完成革命事業之後，内部的矛盾衝突更加激進，受着各地農民暴動的打擊，兵士群衆的動搖，尤其廣州苏維埃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的暴動，他们的統治十分不能穩定。国民党軍阀以前在民族資產階級与無產階級的聯合战綫的国民革命之中，曾經用「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几日，他们的軍力客觀上还是代表革命勢力向北洋軍阀進攻。現在一切革命勢力都和国民党軍阀處於絕对敵視的地位。他们只想用「在帝国主义之前爭寵」的手段，去和北洋軍阀比賽，他们完全降投帝国主义。

蒋介石的親日論越唱越高，奉洛琛更公開的親英。最近半年以來的局勢，很明顯的是：最初小資產階級恐慌動搖，懼怕共產的革命方法，而幻想着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改良方法，能够稍〻解放中国，稍〻改善「民生」……而後這些幻想很快的烟消雲散；国民党公開賣国，混战之下的苛捐雜税財政紊乱一切政治自由完全剝奪，不用說工農兵士受着極重大的害殺，就是小資產階級也並沒有因為「取消共產時代劳資條件」而能發財，只有日益破產窮困。据之中国資產階級民权革命的任務，絲毫也不能解決，中国民族資產階級不但不能領導土地革命，並且也不能實現他的「帝国主义」的綱章（修改不平等條約，関税自主等〻）。一般農民群衆固然是繼續着發展暴動，建立地方苏維埃的政权；大城市工人階級在国民党軍閥压迫摧殘之下，正在団結集中自己的力量，准備領導農民兵士的暴動，而完成革命任務較大範圍内的勝利；就是一般小資產階級群衆，也已經開始動搖於国民党与共產党之間一般的不滿於現状，承認国民党「腐化，妥協，保守，自私，只有不兌現之三民主义」，更是極普遍之現象，而且是極普通的現象（我故意摘出的「中国公論」——一九二八年三月——偶然的材料。）。

中国革命的現時階段，顯然是無產階級領導農民的土地革命到底；保障已得的对於農民的領導权，徹底完成反帝国主义的資產階級民权革命。創立工農民权統裁制（——苏維埃政权，苏維埃政的方式是最容易，最便利於轉到無產階級統裁制的），——只有這条，才能於帝国主义之下解放中国。

三 国民党问题及革命鬥爭方法

中国〻民革命的發動与發展，在極複雜的階級関係之中，在極迅速的發展階段之中——亦就是階級結合形勢

的急遽轉瞬的交易之中，都和国民党问题有密切的関係。

国民党问題是什麼问題呢？他实在有兩重意义：一是各階級結合的方式，一是国民革命的政权形式。国民党在辛亥革命之後，早已崩溃瓦解。辛亥革命的同盟会——国民党，在革命"成功"之後，大部分腐化，投降了袁世凱，投降種々反動勢力。辛亥革命時的革命動力之一，華僑式商業資產階級已經買办化。他們当時在国民党中是右派的代表，他們最初还希望袁世凱組織之下的責任内閣，隨後简直完全变成猪舒設員，軍閥走狗，如吳景濂等。就是這老国民党之中的左派孫中山等，也只是想憑藉小軍閥的武力，去打倒北洋軍閥，他們不能和群衆発生関係。中国的資產階級的民权革命，根本上的社会内容，是農民的土地革命，但是孫中山只有改良主义式的平均地权的空政綱，而且当時还藏在口袋裡不敢拿出来。孫中山的民权主义，不是代表民衆爭政权——中国々会制度迅速破產之後，他是没有出路，只有護法的口号。至於中国革命的反帝国主义任務，孫中山那時也除富国强兵，爭些"国际平等地位"之外絲毫不敢有甚么主張，反而在未得政权之前，先就首口应承的对帝国主义発出"保護外人生命財產"的預約券。他那時已經是怯弱的資產階級的代表。国民党早已不存在了。所以在五四運動期间，我們看見中国々民党完全不起作用。

国民党的復生，導源於五四運動期间，国民党領袖中一部分的"左傾"，然而国民党的改組，始終等到第三国际和中国共產党的贊助，方才見於事实。這一过程，就是中国無產階級的階級爭鬥發動起来，一般平民小資產階級的反帝国主义運動進展，而結成国民革命联合战線之新的国民党（一九二四改組的国民党）新国民党是国民革命联合战線的表現，是事实上联合战線的反映。這就是在中国革命的第一時期，代表無產階級農民小資產

阶级及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和政纲，确是接受了反帝国主义的口号。当时国民党的政策是联合苏联。工农组织及斗争的发展也开始着自由，一九二四年勃兴的反帝国主义宣传，和冯玉祥政变，以及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都在国民党的联合战线之中发展出来。国民党当时确是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政治组织。孙中山赤化，和冯蒋赤化，也在此时期喧腾于帝国主义之口。

当时革命战线之中，固然民族资产阶级是参加的，是赞助的。但是我们应当注意一件事：国民党组织成份之中，自然遗留着辛亥革命以来已经朽腐的成份。国民党之中，不但有民族资产阶级，并且有买办阶级一部份商业资产阶级买办化的成份。所以一开始改组，国民党便有少数右派冯自由等，反共的先声，起来反对。这种斗争实上继续到消灭刘镇寰，杨希闵的战争。五卅之前，孙中山死后的第一次中央会议上（广州一九二五五月）戴季陶沈玄庐等已经起来提出所谓国民党的最高原则——反对阶级斗争这是民族资产阶级戴季陶主义的发端。自此之后国民党内反对改组的右派表面上消灭，而承认改组，同时要求控制共产党的新右派之斗争已经开始。五卅以后，戴季陶主义便公开的发动，孙文主义学会组织起来，黄埔军官学校的右派形成起来。国民党的右派中央要员在西山开会，以廖仲恺被杀，案破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与省港罢工开始时之左倾政策，为反对目标。这西山会议便在戴季陶主义的旗帜之下进行反共的斗争。说起西山会议派，这是中国革命背景最复杂的反映其他和戴季陶派的离异。中国革命之中，在他最初的一阶段，不但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并且有高绅地主的参加。当时中国社会中革命与反革命的对垒；一方面是孙中山的广州政府。一方面北洋军阀的政府。但是广州

政府影响之下的势力，实在有豪绅地主阶级的军队，而且所谓革命的政权，事实上建筑在这些军队之上（从杨刘一直到冯玉祥）有民族资产阶级的成份，有小资产阶级的成份，也有农民无产阶级的成分。这一"革命同盟"之内，早已在这个时期发生内部之斗争，争领导权之斗争。革命联盟的国民党内争领导权的争斗，就表现于争国民党的指导权。当时争斗的分野，就是工农小资产阶级，——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汪精卫等）与新右派之争。当时的右派是什麽。他是民族资产阶级所领导的，但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还只很小心很谨慎的发动自己的斗争。而豪绅地主阶级已经不能等待了。他们的策略策些，他们的西山会议甚至逼得戴季陶也不得不退席了。话要退回去说一说。曾经有一个时期（孙中山未死的时期直到刘杨战争）民族资产阶级也在"左派"之内。我们大家记得；戴季陶曾经算做左派，汪蒋两字在廖案时期直到三月二十日政变是同写在左派的题名录之上。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左派"，这是什麽意义？这句话在现在看来，与豪绅地主阶级"参加革命"同样可怪。但是事实是如此，并且丝毫也不足怪。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帝国主义压迫之下只有这种畸形的途径。帝国主义使豪绅地主商业化，保持这一阶级在封建剥削之阶段上，加强地方市场的"发展"，经过他吸取中国农民的膏血。中国工业所以始终只有如此可怜的状态，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始终没有完全的经济上，政治上的独立作用。商业化的豪绅地主阶级与工业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如此的混淆纠缠成为"黑漆一团"的糊涂账，远在五四运动之前，商业化的豪绅地主阶级，尤其是南方广东等处的便"参加"革命了。为甚麽？因为他们虽然是封建性的阶级但同时已经很资产化的阶级。他们——地方性的商业豪绅阶级利用急遽破产失业的农民，（土匪之雇佣军队，扩

張了自己的政权；他们再不能像前清时代一样，俯首于买办大地主的商业资本的统治之下，他们要反抗北洋军阀，——纯全买办化的土绅贵族阶级；他们即使不能立刻取北京政府的美国资格而代，至少也要割据一方，要求帝国主义给与北洋军阀美国赏金的一部分，（例如列强承认北京政府，所以将关余给他，那时广州政府便说，至少我也要一分。——"请把粤海关的给我罢"）豪绅地主阶级是如此这般"革命"的，当然客观上当时广州孙大元帅政府也是负着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注意这是孙大元帅政府——北京政变后冯玉祥在内——并非国民政府。）五四到五卅时期中的"资产阶级革命"是在如此的形式之中，豪绅商业阶级在这革命政府之中，握有实际政权——军事形式的政权。当时民族资产阶级，是等于不存在，（五四之前）直到五四之后，民族资产阶级渐渐抬起头来。国民党改组是在五四之后，学生工人群众的革命运动的结果。革命势力——是民众革命势力的集合。那时资产阶级渐渐觉到自己的力量，尤其在五卅之后，民众革命运动的大爆发共产党积极的组织与发动大大南展。于是民族资产阶级更勇敢了。公开的参加革命，他同时感觉着两件"新玩意儿"以前所没有的玩意儿，一是他可以利用民众力量，反对帝国主义争取革命的领导权了。二是民众，尤其是工人阶级的独立行动和组织对于他太危险了。这是两件矛盾的玩意儿，但是这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八字"矛盾命中注定的矛盾，当民族资产阶级估计自己的力量，他是太弱了，同时把又不愿意无产阶级及群众革命力量觉醒过来。然而等到他看见已经有组织好的革命力量，可以利用来反对帝国主义，而他就更加勇敢了，敢于提出更加坚决的要求了。（参看共产党国际第五次大会上关于民族问题的演说）中国

民族資產階級到五卅前後是怎樣的勇敢起來呢！他与豪紳地主的商業階級分化已經比較明顯了。他一面妳便比較勇敢的贊成国民党改組。為什麼？因為他要取得国民党軍隊的領導权，他模糊的懂得可以利用党权"来支配軍权"。黃埔軍官学校的作用，对於民族資產階級是如此的，軍隊中的党代表和政治部制度亦是如此的。三月二十以前，自民党改組以後，江蔣国民政府時期，民族資產階級与工農小資產階級的若即若離的聯合其意义正為取得軍隊起見，要利用種々"赤化政策"与豪紳地主階級爭軍隊的領導权，同時也是与工農小資產階級爭国民党領導权的準備，民族資產階級是如此這般"參加"左派的，在這時期最明顯的表示於西山会議派的聯蔣倒汪的政策。西山会議期間（中山死後至三月廿）的形勢是：民族資產階級已經造成一部分兵力，在兩次肅清東江之後，蔣介石的地位提高起來，当時在他面前有兩个嚴重问题：一是省港罷工的轰轟大的群衆的反帝国主义運動，一是廣東已經開始的農民運動，——土地革命。民族資產階級当時对於反帝国主义是贊助的，是要利用的，对於土地革命是反对的；即使当時土地革命方在開始，形勢並不緊張，还只有農民運動，而没有直接提到土地问題，至多还只是農民与豪紳地主開始爭奪地方上的实际政权。那麼，民族資產階級对於這農民運動是"中立"的，然而提到土地问題的本身他便不能不堅决的反对了，（"江精衛于民国十四年六月沙基慘案後，在廣州对鮑罗廷十二分奉承意旨的時候，鮑罗廷叫江精衛起草一篇主張用土地革命政策的設案，……後來幸而被戴季陶先生等打銷了"——中央半月刊第十三期刘芦隐的"革命与反革命"。）而豪紳地主階級呢？对這问題的答案是不同的。——对反对帝国主义運動，实际是反对的，即使在五卅時期革命形勢汹湧，他們不敢直接反对，那麼至少

也是怠工或甲立的。——廖仲恺的被刺，至少是西山会议一类人所造成的，省港罢工时检查口岸是工人纠察队，不是国民政府的军队（他们甚至偷运、破坏罢工）至多只有蒋介石的黄埔学生军，偶然参加这种反帝国主义斗争，二对于一切农民运动，都是极端的反对。这不用详细解释，总之，广州国民政府时期，直到一九二六一月的国民党第二次大会，是民族资产阶级拿着自己的妥协政策，如"单独对英""希望日人回东方来"等口号参加反帝国主义运动，他一开始便站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他对于豪绅地主阶级已经渐次的开始变更策略，以前把曹锟加入左派，藉以反对孙大元帅的旧部——黄埔以前的革命军队，现在他有了军队，但是力量还不够，他可以并且不须用操纵挣扎的手段，利用豪绅地主阶级的势力，以巩固团结将来反革命的豪绅资产阶级联盟，他在当时固然还是动摇犹豫于两势力之间；一方面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浪潮，别一方面是豪绅地主阶级的反革命的开始，戴季陶出席西山会议，随又偷偷的逃席，这种事是当时民族资产阶级的写真，然而客观上说来，联俄容共的策略，显然是豪绅地主阶级利用民族资产阶级的薄弱，利用他不能独立克服他所顾意抑制的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势力与左倾政策。而来勾结他，奉承他，拥护他做右派与左派争国民党领导权的领袖。民族资产阶级以争军队的手段争取豪绅地主阶级式的新军阀在孙大元帅政府中之实际政权。广州国民政府的成立，应当如此说明。国民党第二次大会的"党权"将近完成这一斗争。但是民族资产阶级不独没有独立反革命力量，并也没有革命力量呵！广州国民政府的成立，实际上是革命左倾政策都在无产阶级以至农民群众斗争大发展的背景之上。这时民族资产阶级是借着工农小资产阶级群众力量提高自己的地位，打击豪绅阶级，革命的发展，使

領導权日益落到工農小資產階級方面來，民族資產階級日益感覺到：自己所利用的群衆力量及国民党的"党权"快来利用自己了。所以第二次大会，事实上已經是汪精衛領導了。——工農小資產階級及民族資產階級的革命联盟，已經到了極点了。這時候西山会議開过了，右派要求開除汪精衛，同時已对蔣介石說過：你被利用了！当然，那時帝国主义的劝告和警告也很利害了。联蔣倒汪和"優秀華人"的讚賞是同時並進的，於是民族資產階級与豪紳地主階級一度合化，一度爭奪軍权之後，意於要轉变而為联合豪紳地主階級，洗刷自己身上的赤化，而与無產階級爭領導权。確言之，便是更進一步的"取得"小資產階級而鞏固自己的領導权。三月廿日政变便在這基礎上發生了。他是如何的取得小資產階級呢？他是否"对小資產階級讓步以鞏联合战線為政策呢？不是的，他在這種问題上，並不犯着他們自己的"机会主义"他以打擊小資產階級手段去取得小資產階級啊！三月二十之後，甘乃光，陳公博等左派紛々投降蔣介石和李濟琛，汪精衛是臨陣脫逃，是被驅逐了，或者是"病"了，蔣介石雖然很久的抑制西山会議派以及戴季陶葉楚傖邵元冲張静江等的助力。民族資產階級開始革命是必須得着工農小資產階級群衆的力量，甚至於短期间聽他們的領導。（蔣介石那時曾經說：聽鮑羅廷的話，等於聽總理的話）民族資產階級開始反革命也是不缺少豪紳地主階級的助力，以至於領導。中国民族資產階級爭取革命的領導权，將他变成反革命的領導权，隨後便自然要將這領導权还給豪紳地主階級。這一过程便是三月二十直到"寧漢合作"後的中央特別委員会之过程。

西山会議的複雜背景是如此。從社会的階級的分析看來，這是現時豪紳資產階級反对工農的反革命联盟及豪紳地主與資產階級内部互相衝突，分成許多派別，相

与离合五四之抽象的发端与缩影。

这样国民党在改组之後，他开始表现工农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国民党，确言之，新的国民党在这时期的初期，是民族资产阶级要利用以争取革命政府的政权的工具。孙中山的广州政府，当初并不叫国民政府，即叫孙大元帅政府。这并不是偶然的，不好忘掉。大元帅，是名副其实大元帅呢？就是实际政权完全在豪绅地主阶级性的军阀手里的表示。孙中山说的革命向来是军政府。只有军政府才以大元帅为最高元首。孙中山并未知道党政府的。孙中山死了，党政府出现了。孙中山死在五卅之前，这一死是很象徵主义的。五卅前阶级分化尚未如此明显。表面上混沌一团的民族统一战线，革命快要完了。代表这一团混沌的革命的孙中山，也必然要死了。即使他在那时肉身不死，他在政治上也许要死在五卅之後。五卅之後，工农小资产阶级群众的革命运动，得着一个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总动员。民族资产阶级又大的勇敢起来，把从前的那一些党革命作用充其量的表现出来。他要踏在工农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头上来掌政权。於是党政府便应运而生，——广州的国民政府成立了。可是群众的头也不好踏的！当群众推进党国民左派，江精卫大唱其党权，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来统国民政府的时候，这一政府对于反帝国主义运动的确是有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作用，但是他对于豪绅地主以至资本家却是很脆弱的保障者，他不但没有权力压迫工农，他且且"放纵"工农的阶级斗争。豪绅地主反动起来。於是资产阶级也动员了，他对豪绅地主说：江精卫是来充帝国主义的走狗，我来保护你。三月二十政变及五月十五的党务整理案便出来了。民族资产阶级以"党权"抑制豪绅地主阶级的"军权"之後，（国民党第二次大会之後）他进于建立自己的"军权"（三月二十日和蒋到

自己的"党权"（五月十五）的阶段了。

可是国民党的党权是甚么呢？他不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所能创造的。他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群众所创造的。五月十五之后，客观上中国革命继续五卅运动急转直下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作用"，在他开始"反革命作用"之后却还没有完结。工农小资产阶级群众的革命力量正在发展澎湃。豪绅地主阶级在西山会议的政治发动之后，还只便宜了民族资产阶级，还在受屈而抱怨，（抱怨蒋介石太妥协，五月十五的党务整案理在他们眼光之中是已不彻底的，妥协的无效验的），——刘芦隐之（革命与反革命）西山会议不过一般而论代表豪绅地主阶级的政治意识罢了，而中国並没有一般的，概言之，就是並没有抽的整個鬼的豪绅地主阶级，他们在五月十五前後，汪精卫既去，张静江登台的时候，右派中心分散之後，進一步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权来实行侵蚀，中国豪绅地主阶级有一個特性，就是他们的地方派别，以及許多種宗法封建関係上的派别，是非常之多，他们只有為保持封建剥削的基礎。豪绅政权及土地的时候，能有一致共同的防御的联合战线，当他们要反过為攻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新政权实行侵蚀，对于工农实行攻擊的时候，他们内部立刻分散，各幹各的，甚至一面進攻工农，一面互相攻打。（三月二十到五月十五之後，蒋介石的政权便没有這種危險，所以）三月二十前，广州的国民政府对于豪绅地主阶级，客观上有動摇他们的剥削政权之危險，所以他们的西山会议有一致去汪反共的政纲，三月二十到五月十五之後，蒋介石的政府便没這種危險，所以他们又有各图私利的"闹昏"了，于是某派联蒋，某派反蒋的纵横捭闔，盛及一時。民族资产阶级的党权地位，益没有着落。工农固然反对三月二十以後的蒋介石，小资产阶级经过許多動摇，在群众的高压之

下，也是反对蒋介石。甚至资产阶级的某种部份（例如南洋煙草公司的简琴石等）也不还承認他们的領袖的策略是对的，也不滿意。豪紳地主阶級性的軍隊長官正在开始嫉妒蒋介石的地位。（当時所謂二三六及四軍的一部分）。五月十五之後不久，迎汪運動便开始。国民党左派在經过一度打擊而散乱之後，重新團聚形成起来。此後的所謂左派，当然是更明顯的与蒋对立而言的了，于是党权運動的意义為之一变。蒋介石的党权始終是穩定不来。他——民族資產阶級急于要保障他们的領導权，他不能用政綱，用党的形式取得大多数他只有假命的提高軍政权，他必須以北伐来取得總司令。此党权可到了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五廣州的国民党中央各省联席会議的時候，开始成為左派与蒋介石的軍权相对抗的東西。

北伐從七月一日宣言七月底蒋介石出發，十月十日佔領武汉，這時间「民族資產阶級，还和左派与共產党結合联合战線，因為如果沒有国民党左派及共產党之有力的贊助，便沒有繼續战的可能」（共產国际雜誌第七十一期，一九二六年十二月社論「中国革命与共產党之任務」）。民族資產阶級在這期间顯然是抱着軍事的進取政策，企圖在北伐过程当中，擴大自己的社会基礎和軍事力量，豪紳地主阶級的軍阀，在這革命偉大的進展時期，崩裂成無數部分，各自尋求自己的地盤，他们之中有些附隸到左派方面来。——北伐期中左派所以得大量的發展，是因為湘鄂贛以及江浙的工農民衆革命勢力極廣大的發動，這種初期的民衆運動，对于奪取北方軍阀地盤的豪紳地主阶級，看来是可以利用的，尤其是唐生智。

国民党左派的党权運動，曾經有一個時期，蒋介石未打上海以前，得到極大的發展。同時也是光怪陸離的發展！許多種軍事衝突及民衆勢力的澎漲，逼使各種各

派的軍隊（唐生智，譚延闓，程潛，朱培德，張発奎，甚至李宗仁），都離開蔣介石而團集在派的政府与中央之『联席会议』的週圍，至少也取徘徊猶豫的態度，蔣介石是處于孤立，或將近于孤立的地位。那時民衆運動的勢力迅速的発展，革命在急遽的前進，工農小資産階級联盟已經成為事実。当時的主要口号是『一切权力属于党——反对軍事独裁，打倒留唐老杜』。同時以国民党々权為中心的，革命発展，是在打倒帝国主义与軍閥的旗幟之下，可是這旗幟之外，还有從廣東帶出来的新"旗幟"『打倒土豪劣紳貪官汚吏』，這是革命進到土地革命的実际行動之第一步。豪紳地主階級的軍閥，唐生智等，甚至于連這種口號都还可以接受。徐謙等左派領袖，在湖北省農民協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七年一月）也敢說：多打倒一個土豪劣紳，就是多做一份国民革命的工作。為甚么如此？因為打倒土豪劣紳的口号，在『党权』之下是所謂的。一則中国革命本是以『土豪劣紳打倒土豪劣紳』開始的。二則打倒的是劣紳並非整個的土紳閥，并不是要于民衆起來根本消滅封建的士紳閥，三則進党的『正紳』可以用党权的名義保持原有的地位，或者打倒『在朝』的劣紳，四則可以利用『党权』限制農民工人的階級鬥爭。左派領袖，是可以容忍，並且想利用這些口号的，中国根本沒有民权的小資産階級但是党权的小資産階級是找得出很多的。当時工農小資産階級左派联盟，在民族資産階級公開背叛革命陰謀時候，確是在進攻蔣介石，雖然在内有許多矛盾動搖和猶豫，国民党联盟勢力的如何擴大，只要看右派至今尚如何的誣蔑毒罵切齒痛恨，便可以知道了（参看中央半月刊十三期刘蘆隱的革命与反革命第十四至十五頁）一九二七年一月初，正当漢口一三案之時，蔣介石在南昌発電給武漢中央，提出中央及政府遷都南昌的要求。這已經民

族資產階級背叛革命之起点。那時，左派領袖还保持着革命的陣線，武漢中央在二月中發出党務宣傳要点：(一)一切权力屬于党，(二)擁護中央執行委員会，統一指導机関，(三)掃除封建勢力（反对個人領袖反对英雄思想），(四)迎汪復職，(五)開第三次中央全会，(六)打倒昏庸老朽（張静江等）。三月十日五派的中央第三次全体会議便開成了。雖然事前經过多少的对蔣邀請，但是蔣介石是拒絶出席這次会議，這次会議無論是選舉了蔣介石加入政府和軍事委員会，而实际上　　反蔣是很明顯的。這次会議是国民党空前未有的左傾，共產党員加入国民党政府也在這次会議。但是空前未有的左傾，同時左傾到了頂点。這就是說：到了頂点，再過一步就要------了。

國民党武漢中央第三次全体会議，決定了「懲治和審判土豪劣紳」，議決湖南省民会議大綱，議決農民向題決議案（減租減息，管理食粮出口，鄉區自治，設土地委員会，確定永佃权……）。這些向題早已包含着左派國民党与共產党破裂的種子。最切近的向題（并非主要的向題）便是「民权」的向題。

当時武漢政府是要反对蔣介石，但是武漢政府之中的「工農小資產階级战線」外，有握有实权的豪紳地主階级的軍阀及部分的資產階级势力，内有無產階级与小資產階级領導权之爭。豪紳資產階级在武漢之下的势力（一切地方上的豪紳及商会等），天然是蔣介石埋伏的反对左派聯盟的奸细；就是主观上与蔣介石有深仇宿怨的唐生智的豪紳地主階级的軍阀，主席反蔣的第三次会議之譚延闓徐謙，客观上也是如此的傢伙，当時那些豪紳資產階级的「輿論」是「革命軍可愛，革命党可殺」。這是什么意義？——就是「党权」是工農小資產階级的，「軍权」方是我们資產階级的。

武漢在如此的情形之下，開始和蔣介石奮鬥了。最初左派聯盟还沒有内部破裂的時候，還是奮勇前進的時候，小資產階级認為自己的党权鞏固起来了，他们接受省民会議等類的要求，对於他们，這在他的党权之下是可以利用的，湖南省民会議的决定，和上海暴動之实行市民会議政权，的確是所謂工農小資產階级民权独裁制的曇花一現。上海暴動——中國無產階级在歷史上第一次独立的拿着武器来爭取自己的权利的暴動，是左派聯盟反蔣势力及其与資產階级爭領導权的鬥爭之最高發展，武漢中央的左派国民党領袖知道這一力量的可宝貴，还沒有知道一般無論省民会議市民会議的鬥爭方式，已是使党权更進一步的新方式，利於發展並完成無產階级在革命中之領導权的新方式。总之，他们那時候只覺得

這是反蔣的力量，他们在接到上海市政府名义的一小時內，便以無線電震電承認。但是民族資產階級的反動是早已預言了，他尤其聰明的見着市民会議对於自身的危險，他借着吳稚暉的口嘴首先說出這一「秘密」：「北伐軍未，自然有國民党的党政府，為什么又要什么市民会議的政府，這一定是共產党的陰謀」。於是四月十二日的屠殺出演了。一三漢口工人階级的奪回英租界，武漢政府之下的群众的直接反帝國主义行動，工人罷工鬥爭的偉大發展，土地革命实际行動的初步实現，以及民众政权的民权独裁制的發動；湘鄂各縣以民众团体聯席会議决定一般行政，纠察隊農民自衛軍的拘捕反革命派，以之游街示众，戴高帽子，以至於槍决。婦女学生等团体已充分的運用自己的政治自由，力爭自己解放……並不限於上海的市民会議，及擬定的湖南省民会議而已。凡此一切都使民族資產階级「突然的」反動，自己建立反革命的中心於南京，民族資產階级的蔣介石，他初到上海的時候並沒有十分把握。上海的小資產階级自動的提出打倒新軍閥的口号，市民会議是反对他的，二六軍佔領南京之後也是反对他的，他自己統轄的第一軍也徘徊於市民会議政权与總司令政权之间（薛岳最重等），兵士開始与上海工人纠察隊「聯欢」（братание），民族資產階级最初是有些躊躇的。——尤其上海八十萬工人的總罷工，暴動之後一切各業的工人店員全都動員起来了。這種革命势力是不可輕侮的，蔣介石是躊躇的，誰给他决心的呢？㈠帝国主义的威迫和利誘；㈡上海資產階级的經济力量；㈢小資產階级領袖的動搖；㈣無產階级政党的領導机関对於領導权的豫猶；㈤蔣介石取得沪寧後之財政与地盤，使豪紳資產階级性的軍閥白崇禧等有團聚的中心。白首先做屠殺上海工人的劊子手。這和西山会議時期大不同了，西山会議時期豪紳資產階级並沒

有完全同一的政綱，資產階級那時還沒得到他所需要的。現在資產階級要得到上海的政权，他成了反動的領導者，他和豪紳与反革命聯盟已经是歷史的必要，豪紳資產階級在此時，處到比西山会議時嚴重十倍的危險形式之下，所以他們防禦同盟的暫時一致便形成了。他們以南京政府為中心，圍集向錫山馮玉祥以至武漢之下的一切豪紳資產階級的勢力，来反对武漢的工農小資產階級聯盟之革命中心，屠殺压迫沿粵的工農勢力以及小資產階級的左派，同時用種々民族改良主义的口頭禪和裝腔做勢的「革命作態」（九月一日实行閑耕自主等類）来穩一穩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不能独立的反革命，但是他在豪紳的聯盟之中以資本統一战線漸進的進攻政策征服店東小資產階級他成了反革命的領導者，帝国主义的干涉中国革命与民族資產階級的背叛革命，形成强有力的反革命勢力。

武漢的工農小資產階級革命聯盟呢？他在决定反蔣的開始，就已经受着武漢内部豪紳資產階級勢力的威脅，武漢的豪紳資產階級在三四月間已经開始種々反革命的行動，他們以自己的勢力反对民众的民权独裁進行：各縣反動勢力不是肯輕易放棄自己的政权的，他們有力量的地方一樣的屠殺工農，他們放出許多謠言，如漢口婦女裸体遊行等々。唐生智譚延闓等豪紳階級加入武漢政府的「生力」早已暗中做這些反革命勢力的組織者。前年五月十五会議時期就罵廣東農民運動是流氓地痞情棍的領袖餘 经过一期反蔣的「革命的蒼狂」之沈默，（对於這些問題的沈默）現在又喝老調了，其实1927年一二月間豪紳資產階級的「群众」早已罵起了。蔣介石的南京政府还調動楊森等的力量来響应，他們利用上海「輿言中心」在全国大宣傳反对武漢，他們竭力的勾結武漢部下的同類（豪紳資產階級的軍事力量。）則帝國主义協同上海的資產階級的厲行極兇惡的封鎖，尤其是日本

帝国主义者故意挑衅，演成了四三残杀。帝国主义的工厂银行，完全停歇，轮船停班，武汉失业工人逐渐达到十万以上。武汉的反蒋的懦怯的领袖早就已经软化了。汪精卫从俄国回来，一到上海便授蒋介石以的条件：1.由汪负责通告陈独秀，立即制止国民政府治下之各地党员（共产），使其于南会之前停止一切活动，听候全体会议解决，（按即最早汪在上海拟议之"四次全会"）；2.中央党部西迁鄂后，因被操纵，所有命令不能有效，如有认为妨害党国前途者，于汪同志所拟召集之全体会议南会以前不接受此项命令，现在各军队各省党部团体机关，认为内有阴谋捣乱者，于会议以前在军队由各军最高级军官随时取缔，在各党部团体各机关由主要负责人随时制裁；4.凡工会等纠察队等武装团体（按当时上海纠察队还未解散）应归总司令部指挥，否则认其为政府内阴谋团体，不允存在；（刘芦隐之"革命与反革命"中央三月刊十三期）。虽然这些条件因为蒋方先行破裂，所以汪一到汉口并未公开提出，却还带着"革命的疯狂"大骂蔡元培吴稚晖是老工贼。下令讨蒋……然而顾孟馀的武汉中央日报，已经拒绝登载这些骂蒋派的"通大"的新闻和言论说是"留着将来见面的余地（只可惜顾孟馀后来未见这些大人物的面的时候，人家早已挡驾不见了），所以上述两层原因以外，还有第三层原因，就是小资产阶级领首的动摇。小资产阶级受着帝国主义豪绅资产阶级的威胁，日渐恐失措，最后落至屁滚水流。夏斗寅五月十三日的叛乱，许克祥五月二十一日长沙政变将他们打死了。"共攻中的奋斗"是汪精卫反共后的名文，其实小资产阶级早已在共攻之中了：一方面帝国主义豪绅资产阶级握有经济的枢纽，一旦实行政治的闭厂停业，金融财政对于小资产阶级已是无办法了，别方面工人店员农民运动，客观上形成"第二政

病」，对于店东小资产阶级又是异常之「威迫」。中国的小资产阶级本来有一种特性，破落户的小绅士也是小资产阶级，店东也大半只能将赚来的钱去放重利债，买田地，剥削农民，成为住在城里的土财主（土豪——Уманный），这种小资产阶级：一，是根本与封建式的土地制度有关系，二，是自身兼有豪绅性质，他们在几百年来中国式的专制政体之下，同时又在非常的军阀制度之下，他们在穿长衫马褂面绅士之中也可以列名，他可以在中国式的地方政权中，享些半贵族式的特权。因此他们在北方军阀大资本阶级统治之下，他们不反对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因为他们自己标是「正绅」，并且欢迎这种口号，等到平民众群真正起了打倒土豪劣绅了，「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被几千万群众轻轻加上一句「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注解，那就不得了了，天翻地覆了。平民群众感觉得自己的「民权」，「民意」的无论是什么人都要「惩办」，举例来说，湖南津市（澧县地方）的某军旅长，却被群众绑绑游街，挨说程潜的老婆，都被群众强迫剪发（最好看毛泽东的「湖南农民革命」）。工人店员的要求，在小资产阶级眼光之中，过大得不了。增加工资，不准开除，不准歇业……诚然，例如你听见说长沙酱业店员，工资累次增加到十六倍，你要伸长舌头不缩去吧？但是增加到十六倍之后每人每月得多少呢？十五元。这和上海工人普通所得相比也标不十分多呵！湖北蒲圻咸宁相近的某处，施存统——（现在的有理论的叛贼施存统，比任卓宣死去还魂后的叛贼更「理直气壮」些的叛贼），五月挨打夏斗寅时去那里视察过。他回来说，那地方的一切店东，差不多都歇业了，工会便将企业没收，办起合作社来，他们说这就是社会主义实行了，「你想慌谬不慌谬」。我想吗？这当然还不是社会主义已经实行了，这小资产阶级式的社会主义，但这是民权主义澈底的革

命所必須的。說社会主义是荒謬，但做得并不荒謬。農民的土地革命，尤其是在湖南已经激急的進行有些地方自己動手分了土地，有些地方「插標」預誌田地的分配，沒收地主田地的鬥爭，到處自發的实行，農民对豪紳的罰款等，也是普遍各處。農民自動的禁煙禁酒，禁止粮食出口，禁止鹽運——都是要整頓物价。以前買办经过豪紳剥削農民的搜括原料方法，再也行不通了，（国民党便說，因此经济停滞商業金融大受影响）。武漢政府的经济是在帝国主义豪紳資產階级封鎖怠工之下，沒有强有力的民权独裁政府是不能有办法的。所以最切近的问题，是民权的问题了。小資產階级左派曾经用党权与蔣介石的軍权相鬥，革命發展的结果，這党权在地方上許多下级党部实际都到了共產党之手。当为真正的国民党左派是這些共產党員（現在大半背叛共產党的党員）。国民党的地方党部便「遵照第三次中央全体会議之湖南省民会議及国共聯席会議决定之精神」当真实行起来了。「你们当真嗎？」「当真！」「果然？」「果然！」「唉！你们這些小子，真正拔着鴉毛当令箭，——我们是說着頑的，你们怎么当真来，該殺該殺！這些事說着頑是可以的，对我们有好處時，也許是必須的。但是這類事是当真做得嗎？你们這些混蛋！」——這樣，武漢国民党中央這樣教訓下级党部了，「为共党所蠱佔的」党部了。国民党的下级党部，許多民众团体，当時是將国民党「党权」当真实行起来；而這党权一实行，当然要变成民众政权——「民权」湖南許多縣党部参加並「領導」工農团体实行「公团聯席会議」的政权，一般的各级党部，只要真是与民众团体一致革命的，都实行起地方「党政府」的权力。這使動搖畏縮的左派国民党領袖不能再容忍，他们要想用「党权」来和共產党爭領導权了，（以前是拿来与蔣介石爭的，拿来在武漢政府初期抑制軍人的）。国民

党中央的党权，要来控制地方党权，因为地方党权已在共产党手裡，变成民权了。军权和党权之争，换一形式，变成党权与民权之争。如果军权与党之争的社会内容，是帝国主义与豪绅资产阶级式的南方军阀妥协与否之争了，那么党权与民权之争的社会内容便是对于土地革命问题，与真正民权问题彻底与否之争。

武汉内部的这一斗争，真是国民党左派中央的党权领导着么？真是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争领导权么？小资产阶级的领袖，当然更不能独立来革命，也不能独立反革命。他们有能力把持中央名义以"党的拜物教"来谋中央至高无上的党权，而妄想抑制群众的革命行动，但是他们也没有能力取得群众。因为他们中国小资产阶级的不良性，不能有加可那式的民权主义的领袖。他们抓住了党，由党垄断政府，这就称中国最民权主义的政权形式了！他们不敢叫民众团体选举，他们不能应用党团作用，取得革命的工农群众。一切团体，甚至商民协会也有许多是共产党所支配的。如果老实用选举方法，政权是一定属于共产党的手裡，当时武汉革命空气紧张之中的形势是如此的。他们只有一个中央，始终不能取得民众团体，甚至于地方党部。国民党左派要协定"国共两党共同指导民众运动"；并且始终不肯实行着民会议等类政权的民权，便是为此。可是他们的恐惧土地革命及民众政权，也不是独立的。他人真是"忧人之忧，乐人之乐"。他们受着豪绅资产阶级的支配来"提高党权"，"纠正共产党的错误"。那时革命形势之深入与反革命封锁压迫，(五月)已经使武汉政府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投降豪绅资产阶级，一是"第二政府"变成唯一政府。群众实现真正的民权，并不是要他；当"真正老牌德国玩具"要的。他们是要以政权保障土地革命之实现，抵制资产阶级的怠工封锁。国民党中央领袖"由上而下"是一动也不动，工农民众

就"自下而上"的大動特動。"平民式的"自動手幹，气得中央領袖汪精衛等怒髮冲冠。於是国共不得不破裂了。汪精衛等從"共產党的走狗"变成为豪紳資產階级的走狗，公開的爆發之開始，又以指出三件事：(一)漢陽六個工廠之資本家歇業(這資本家周氏兄弟向来是吳佩孚的走狗，漢口商会要人)，工会和縣党部将他沒收，组織管理委会接收，這件事正在夏斗寅叛变那幾天，汪精衛便大發雷霆，立刻要懲办工人；(二)湖南省国共联席会議决議沒收土地，許克祥立刻叛变，实行政变，汪精衛等听了，雖还假意要請唐生智懲办許克祥，然而对于"省国共联席会議"的議决案的公佈，大为懷怨；(三)許克祥政变後，黃埔縣党部及農民協会反对徵收蔣業捐的官僚土豪許，汪精衛等便立刻下令，藉口于農民協会"禁止種蔴，有碍財政"，而解散縣党部及農民協会。此後，土豪劣紳藉着這種党权的威風，到處進攻，夏斗寅魏益三等叛軍所过之地，更不用說。六月中湖北省農民協会执委擴大会議上的略統計，農民被豪紳軍隊所殺者已经有四十七百餘人。湖南自許克祥政变後，全省被豪紳軍隊所殺者不下兩万人。江西朱培德"歓送"共產党出境，工農团体及国民党部被摧殘的也非常之多。這都是汪精衛所極力庇護的"工農政策"。但是，說這些是汪精衛主動的反動，也未免太恭維他了。蔣介石領導許克祥，許克祥何健等領導汪精衛的呵！

蔣介石叛变之後，武漢政府对于北方軍閥的問題便成问題。一則武漢領袖五多只能行实現銀集中的政策，漢口將軍团等的財產尚且不敢沒收，更不敢沒收工廠，盐商業，解决失業问題，于是財政大成问題；二則东南多一敵人。這時候的正当政策是："向北發展的軍事計劃，同時無条件的加深武漢政府之下的農民革命，極力破坏蔣介石之後方与軍隊，以達到对付他們的目的，這自然

不是說，在適当時不該以直接的軍事行動進攻蔣介石"；（共產国际执委第八次全体会议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但是，土地革命的深入沒有做，則北伐虽然勝利，而革命并未前進，恰：相反。馮蔣的徐州会议，更使武漢政府領袖不得不急：洗清赤色。那時他我尋他的新主人，忙着南長江各省商民協会代表大会，忙着要改组店員工会，代表資產階級来向工人爭"營業自由"，"解雇自由"；店員群衆已经自動的跳出"打倒店东走狗"的標語；而店东却只希望南京勝利，着着注精衛始终是"共產党走狗"。

馮玉祥与蔣介石的徐州会晤，最終的確定，汪精衛的動搖，使他决然的"分共"他只是幻想着如何分共之後，以"救东南商人於蔣介石压迫之下"的旗幟，去分共反蔣。何健等更是不等命令先自動手起来。当時（七月十三日）共產党宣言退出政府。武漢的革命中心，就此消滅。

国民革命中，無產階级在工農小資產階级聯盟之內，領導着左派与豪紳資產階级爭領導权。沒有群衆基礎，以豪紳地主階级性的軍閥实权為支持力的大元帥的資產階级民权革命政府，進於国民党的党政府。這一階段裏，革命領導权虽还在資產階级手裡；但是群衆的工農的革命鬥爭方法，在革命的總路線裏日益擴大起来。從党权之中創造出民众政权来。小資產階级的領袖已经不能不退伍。然而無產階级指導机関，沒有布尔塞維克的策略，使群衆丧失当時所需要的領導他們更前進的指導。無產階级政党，隨着小資產階级的動搖而動搖。於是革命的領導权之爭，其結果，是無產階级受着一時的挫敗。而革命的国民党也隨之消滅。

革命，總是要奪取政权的，中国革命之中，政权问題，因為階级関係的複雜及具体環境的特殊，是有特殊

的方式及其变迁的歷史的。

中國革命之中，豪紳地主階级性的北軍閥实际上成為資產階级革命的軍事力量。当時資產階级，除此以外，沒有絲毫能力。那時革命鬥爭的方式，是中國的特殊的战爭式的革命——北伐式的革命。"革命"政权表現于孫大元帥的元帥府。那時孫中山"行佛"也是國民党員，但是他沒有提起所謂"党权"。他在民國十二年發明的"革命三期"等說，有軍政，有訓政，有憲政。却從沒有說起"党政"。馮玉祥政变時，孫中山在鮑羅廷及中國共產党的"压迫之下，才發表北上宣言及國民会議主張。当時他还是要搬出建國大綱（革命三期學說為中心的建國大綱）。第一次代表大会時，建国大綱並未通過的，也是因為鮑羅廷及中国共產党的"压迫"。北上時他又要提出来！真是教不会的笨孩子！他的腦筋之中，像一般上等社会一樣，是無論如何想不通的。在国会被解之後，明明看着上等人尚如此不够程度。那麼無知無識的"四万万眷君似的阿斗"，如何可以立刻使他們实行政权，選舉国民会議。必得要無產階级教給他。孫中山原来只知道"軍政"的，甚麼"党政"和"民党"，他都不知道。因為豪紳地主階级的反对北方軍閥，只有兩個革命鬥爭方式：一，是在帝国主义之前与北方軍閥爭寵，二，是將兵力去奪北方軍閥的地盤。要实行的兩個方法，只有屯行割據。既然割據，他們自己形成地方政府，不但经濟上必然代表地主剝削農民，而且他的一套"文教系統（縣知事等），就是"白色統人"的金字塔，層層压榨，他們自己是封建諸侯，如何能執行甚麼民权的土地革命，雖然孫大元帥的政府，客觀上在全国範圍内代表資產階级推翻民权革命的民主势力（照政洲話說）

所以資產階级势力伸張起来，他有時新的革命鬥爭方法，例如五四時期的抵制日貨的運動。但是，一到他

的「反帝國主义」極大限度是和列强会议談判，大改兩和平的修改条約；二則他根本不要土地革命；三則他怕民众独立的蓬展起来。如此，他和豪紳地主階级極相接近了。他的革命方法，也就是要组織政府，尤其要有自己的軍隊，去打北洋軍閥，去和帝國主义開談判。所以他無論如何想利用民众運動，利用國民党，其实，如其說他要「利用」之来革命，無寧說他要控制之以防止革命，——這祇是他比豪紳地主階级聰明的地方；——然而他始終是以軍权做本位的。他有軍权，然後可以向帝國主义要求「立憲」。固然，他，例如五卅時期的上海總商会，有了民众势力为後援，也可以向帝國主义要「立憲」（上海工部局的華董問題等）。這在蔣介石也有過一個時间（三月二十以前），但是民众蓮動起来，必然要将反帝國主义的初期鬥爭，罷工抵制等，引導到拔帝國主义的根底的土地革命，必然進於民众政权的独裁制，這太可怕了呵！事实上就是「党权」運動的蓬展，而且有控制資產階级的傾向，所以对於他，始終是軍权好。

小資產階级，在他与工農结合革命聯盟的時期，他是同意於党权的。在革命蓬展中之一定階段，國民党誠然成為一種特殊的政权形式。武漢時期的国民党，不僅是政党的組織，通常意义的政党組織，而且是政权的組織。這在中国革命各種不同的革命鬥爭方式並進，而且互相利用互相鬥爭的形勢之下，是有歷史的必要的。即時采伸資產階级性的战爭方式，資產階级性的談判方式，無產階级發民群众的民权独裁方式都同時並進。於是「党权」便成為由「軍权」過渡到「民权」的必要方式了。本来說來，革命總是民众武裝起来推翻統治階级，但是這是「下等人」的办法中国的「上等華人」革「高或優等華人」的命，要取得和「高等外人」去談判的身份，

是另有取乃的办法，中国不是有帝国主义剥削下来的破产失业的农民吗？不是有极广大的非阶级化的群众吗？他们和「摔过的柠檬」一样，满地都是。商业化的地方性的豪绅阶级（民族资本阶级的父亲）便能集合这些「游民」组织军队，建立某一区域的政府。这是一种力量。无产阶级农民群众运动生长起来，这是第二种力量。

第一种力量的「革命」方法是战争。第二种力量的革命方法是罢工抵制，一直到游击战争武装暴动。战争之中，只能产生「革命」的军权。罢工抵制等，却能产生民众团体——民众的组织力量。当「国民革命军」还在联合战线之下，这两种力量：军事动力与民众动力，自然要处於一定的关係之中，这种关係的表现，便是国民党的党权。「党权」在他的历史事实上，僅只是如此。可是无产阶级加入国民党，确有领导农民小资产阶级经过国民党而去和豪绅资产阶级争领导权的倾向，进而有征取军队的倾向。三月二十政变，中国资产阶级反动的开始，正开始於驱逐共产党的政治部人员与党代表，这不是偶然。随後的一切「反共运动」，差不多总是从政治部党代表开刀的。因为「党权」这种特殊的政权形式，自身是悬空的，民众动力与军事动力才有实际的力量。当民众力量的发展，僅仅在罢工减租等的斗争方法阶段之时，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征取军队，也只在取得政治部党代表，至多是下级军官的地位。这种时候，党权是表示工农小资产阶级从征取领导权，进而至於征取政权——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权独裁制之倾向。这种倾向的前进，必然是「党权变成民权」，後退，便是党权变成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动工具，以至豪绅地主阶级的反动工具——以及他们内部互相斗争恶斗的工具。

历史的事实是如何呢？武汉的党权运动之结果，因为：第一，工农群众争取领导权，就用国民党「党权」变做

自己的民权，（毛泽东说：湖南有一个绅士模样的人，在路上碰了一个农民，那绅士摆架子不让路，农民便情然的说：已土豪劣绅！晓得三民主义吗？）他们要进于真正的民众政权，要国民党成为完全民众的党，要把豪绅资产阶级从国民党中完全去净；但是，第二，小资产阶级看见工农民众的革命斗争方法，已经进到实际上等于武装暴动等使释下层民众的方法，甚至将国民党之部也变成这种方法的工具，实现真正群众的革命独裁——彻底的民权一样；自动手干，连土地都可以如此没收；小资产阶级便怵怕了，他们的各种领袖都退位了；第三，这种工农民众的动力没有能与军事动力合一，没有能取得兵士群众……豪绅资产阶级的势力仍旧保存着。因此种之，党权式的政权，仍旧经过汪精卫等之手，送还豪绅资产阶级。

国民党——中国革命中一定阶段的特殊政权形式，便完全崩坏。工农与上层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最后一次的分裂，便使国民党完全消灭，变成反动的旗帜。工农劳民进而采取苏维埃的口号了。

Ⅱ中國共產党之過去与前途

(一)中國共產党与機会主義

中國革命的過去，其实已经說過了。但是，革命的事实之中——还留着関於中國共產党的過去沒有說。

中國共產党决定加入國民党，是在一九二三年夏天的第三次大会。中國共產党的端端，遠在一九二〇年這顯然是從五四運動中產出来的。

五四運動，是中國第二次革命的端端。——辛亥革命之後的真正的第二次革命，是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五四運動之後，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開始自己的"革命作用"。同時，中國無產階級的鬥爭和組織也開始了。当時的形勢，顯然是在"革命快將展了"的一般的預覚之中。中國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双方都在圖集準備自己爭取革命領導权的力量。中国共產党独立組織形成，便是無產階級革命力量圖集的開始。

中國革命果真要動了，他的性質是反帝国主义的資產階級民权革命，——這從五四運動直到現在的革命事实，表現很明顯的。無產階級是如何在這"民权革命"之中取得領導权，這一革命的前途是什麽，是否中國的民权革命将達到单欧式的民权政治而告一段落，然後再来無產階級革命（所謂兩次革命的理論），当前這一革命的主要的社会内容是什麽，革命鬥爭的方式是如何運用等"问題，——都擺在無產階級及共產党的面前，共產党加入國民党的决定，客観上是对於此題的答案。但是，主観的策畧与他的戰術路綫，是模糊的籠統的，——真到中国共產党第五次大会，甚至直到中央第六次七緊急会議，共產党对於中国資產階級与農民在革命中的作用，是沒有明顯的观察的。因此，对於上列的幾个主要向題，实际都種着机会主义的種子。

第一向題，関於中國革命的前途向題。中國共產党

的加入国民党策略，客观上是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中国革命的初期——反帝国主义革命运动的初期，这一策略是必要的，是正确的。因为中国革命的前途，在国际的国内的形势之下，可以从无产阶级手得领导权决定他是举资本主义的。那时，中国共产党中央是如何观察呢？第一种意见是说：中国无资产阶级是「一时不易免除妥协的倾向——苟且偷安的」；他的发展将要使他革命起来。无意之中，这是承认资产阶级应当要领导革命，革命前是资本主义的。第二种意见是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等于零，所以革命领导权天然在无产阶级的手裡；但是国民革命要由国民党革命成功，然后再来第二次无产阶级革命，现在共产党且「准备将来之无产阶级革命」再说。这话的中间，含着很明显的矛盾，但是，同样也很明显的承认：现在之国民革命前途是资本主义的，因为将来之无产阶级革命，才能给非资本主义的前途。第三种意见是：「平民之革命民权独裁制是民权革命中最切近的目的……就是劳工阶级的方法执行国民革命；劳工阶级在国民革命的过程中，因此日益取得重要的地位，以至於领导权。——到国民革命的最高段，很可以与世界革命合流而直达社会主义」。可是，当时虽然有三种意见，第三种意见是並没有传播，甚至等於没有存在，因为第二种意见，仿佛是第一第三两种的综合，即实际上不自觉的成为党的正式意见。

第二问题，是领导权的问题。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究竟是为去争革命的领导权呢？还是去到国民党裡送领导权给资产阶级？国民党中有资产阶级的参加是无疑义的。但是中国资产阶级很弱，没有自己的政党。改组国民党是在无产阶级影响之下，方能变成革命的政党的。如此，无产阶级参加国民党，而与资产阶级争领导权是可能而必要的，然而中国共产党对於革命的前途既然没有

明确的答案，对于领导权的问题自然也没有明确的答案。参加国民党是否为争领导权的问题，始终是模糊的。当时对于如何争领导权问题，也有许多不同的意见：一说是：只要国民党能听从共产党的主张与政策，使可以说实际上的领导权在共产党之手；因此说国民党左派是有的，不过不能对他们有过分的奢望，革命口号要是他们所能接受的才提出去，如此可保领导之权；因此国民党之部长要用共产党员。共产党也不可多佔，以免惹右派反感而陷"包办"之嫌，对新右派也不必抱尽行排除的目的，因为反正国民革命是要有资产阶级参加的。（五卅后……六月间，中央和西山会议派的"退伍派"孙科、黄琪翔、邵元冲等的上海谈判，在允国民党中央中C.P.不超过三分之一等的条件）。二是：要争领导权，无产阶级的工人便不应加入国民党；不要用国民党来集合革命的势力，因此，不必排除国民党右派，因为反正国民党是各阶级混合的，无产阶级不必去争国民党的领导权；甚至说："一般小资产阶级已由本党领导到一个可以独立活动的时期"，国民党领导权可以交给这些小资产阶级的左派，但也不必"梦想国民党成为纯粹左派的政党"。三是：国民党是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政治联盟，无产阶级既然参加，便应当取得其中领导权；国民党的左派领袖实际是不存在，必须无产阶级实际征取国民党，一直到排除资产阶级的右派至于净尽，这就必须扩大国民党，使广大的群众加入形成左派，无产阶级要勇敢的领导左派。这最后一派的意见，客观上必然要发展到变国民党为纯左派的政党。这三种意见，在中国共产党过去的政策中间是极端混淆交错的：广东方面：大半是偏于第三种意见；中央是以第一种意见为骨干，而参杂第二种意见的，因为这两种意见的性质是很相同的。国民革命之中争领导权与国民党之中争领导权，事实上是很

密切的关联着。但是当時的中央政策，雖然時々的提着共產党是独立的積極行動，要批評國民党的左派（這点是上述第三種意見中所不甚明顯的缺点），然而实际上這種「独立」，並非積極去領導权，却傾向於讓國民党「左派」去領導，自己退去对于國民党的領導，做「極左派在野党」，美其名曰國民党外的「準備將来之無產階級革命」，而将当前之國民革命領導权讓給「純國民党」。

第三问題，是政权问題。——亦就是兩次革命的问題。兩次革命的意見，是這一次革命由國民党取得政权下一次革命才是共產党可以取得政权。中國共產党当時這種意見，當然是跟着革命前途與領導权问題上答案来的。所以後来参加漢武政府，事实上便不是領導革命向前発展，却是去帮助國民党「納革命於正軌」的辦法。对革命民权独裁的观念之忽視，是机会主义的根源。最早，对于這一问題有不同的意見：一。共產党不可参加國民政府，以免國民政府之太赤；二。共產党員不可参加國民政府，因恐党員的腐化；三。共產党应當力爭参加政府，以発展革命！國民党領導权的爭鬥，客观上必然要進于國民政府内的政权之爭鬥，因為國民党日漸成為一種特殊的政权形式。

事实上隨革命的発展，從資產階級的权党運動，進到小資產階級党权運動，國民政府的左傾已經是工農群众自動発展爭鬥的結果。湘鄂贛各縣民众團体，尤其是農民協会以及工会，以至于國民党々部，日益成為地方政权的权力机関。上海暴動更将政府问題直接提到中央委員会的面前。革命発展的前途，早已将政府权问題的答案指出来：「因為武漢政府統治下各省狀況之不同，則地方政权的組織，在最初時期，必然採取種々不同的形式，（在鄉村间，「農民委員会」「農民協会」政权，以

及國民党々部政权等々）。共產党人在組織地方政权時的主要任務，便是"領導廣大的勞動群众，領導千百萬工農参加組織，組織成後，参加工作"（共產国际第八次执委全体会中國革命问題决議案）。然而中國共產党，更不用說國民党了，对于國民会議，省民会議的政权问題，始終是糢糊的。群众運動的發展，必然的將自己團体权力築成地方政权，亦就是國民会議政权的基礎。一九二六年七月北伐發動的時候，中國共產党中央便有一個通告（七月中央擴大会議後的第一號通告），决定以"一切政权歸民众團体联合会議"的口號，作為北伐中的政权问題之方針。但是這一决定雖然經過過党團而通過于十月十五的國民党中央各省联席会議，終始是被一般同志所忘却，確切些說，被中央所忘却。於是，自發的群众革命的行動——擴大國民党々权成為民众的政权，事实上成為共產党員加入武漢政府之基礎的要求，與中央的指導離開了。中央对于國民政府的参加，彷彿是不經意的；对于地方政权則走到贊成武漢國民党中央限制民众團体及其地方党部的道路。

第四问題。這问題是土地革命问題——亦就是革命主要的社会内容的问題，這问題是最主要的问題，就是封建社会主義最深的禍根。中國共產党当初对于農民问題差不多沒有注意。中國革命中無產階級之主要的联盟者是農民，無產階級的領導革命，必須取得对于農民群众之領導权，這就是說必須有明確的土地革命的党綱，但是中國共產党並沒有——直到五次大会。五次大会之前，对于農民運動的意見有許多：(一)最早有說國民革命不得農民参加"也难成功"的，(二)有說，"誰能真正打倒軍阀，帮助農民反抗地主的压迫，農民便跟着誰走"的，(三)有說，"不得農民参加，革命不得成功"，但是関于土地问題，誰也不曾談起，——認真的談起。後来農民運動事

实上大大的发展。农民政权与土地问题成了事实的问题。中央才一步步『善後的』追着农民群众走。总之，当时有一个一般的倾向。便是認農民運動是日益重要起来了，無論中央主观上如何的講『鄉村联合战線』，也不能拉得住農民了；無論中央如何認为『不应當空想出地主問題来講土地問題』，也不能『劝醒』農民或鄉村中的『共產主义的实行家』了，於是对於農民運動，不得不認为他是国民革命中的主要動力，但是对於土地革命始终怀疑，中国革命只被認为『反帝国主义革命』，——五卅式的革命，不認为土地革命。一切『耕地農有』直到『不宜由農民議决实行減租』之激进的或妥协的决定之中，都没有坚决明顯的对於革命内容之認識在内。所以对於以土地問題来决定国民党左派之是否真正左派，始终是不贊成的。

第五問題，是革命鬥爭的方法问題，——亦就是民众運動力与軍事動力的関係問題。中国革命中資產階級以及豪紳地主階級，以軍事战爭为自己主要战鬥的方式——利用兵法步勤已经组織的軍隊（破產失業的農民群众）去打北洋軍閥。這種鬥爭已经是早就存在的事实。無產階級發動極偉大的群众運動，罷工抵制，示威游行，領率着一般小資產階級以及農民的鬥爭，工農学生婦女甚至小商人的群众團体迅速的發展擴大，实行反帝国主义軍閥豪紳地主資本家的鬥爭。這亦成了事实。這兩股势力之間的関係是如何呢？一是說：軍事動力絶对要不得，如果欢劝国民党不听讓国民党去胡闹好了，我們且『先宣傳後組織再暴動』；二是說：軍事動力可以用来反帝国主义，国民党会联絡，我們也可以帮助他去联絡，藉此可以民众得些自由，同時，民众的武裝要有些限制，以免衝突；三是說：革命既然全仗兵力，我们自己也可以弄些軍隊，联甲反乙，幫助民众；四是說：無產階級

農民的罷工減租等鬥爭方法，必然要轉到武裝鬥爭以至於暴動；如此，軍事動力與民众動力勢必至於由『合作』（初期的『合作』是可能而必要的）而至於衝突，弄到你死我活的地步。所以必須征取軍隊中的兵士。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中，实际上第一種意見是歸於消滅。或者在用到民众武裝鬥爭，以組織尚未完好的口实而延遲鬥爭，第四種意見只在上海暴動之中得着部分的表現。一般的情形，却是第二三兩意見的錯綜摻雜的执行，結果，雖然將大多数甚至全体的工会農民協会，一部分革命的学生会，婦女協会，商民協会以至大多数的國民党的下級党部，都在中国共産党党團影响之下，然而工農的武裝，農民自衛軍，工人糾察隊及兒童子團等々。並無战鬥的準備。武漢政府之下。民众的武裝組織之政治的認識，可以無疑的說：他們估計自己的任務只在反对『徒手的反動派』了，至多只在对付反動派的『秘密武裝了』（所謂蔣介石的好細）地方土豪劣紳雇用的打手）。至於『國民革命軍』——這些尚未公開反動的正式軍隊，就要靠中央去联絡，要靠政治部同志去遊說，要靠应付得好，可以联甲制乙的策略，可以联絡這個兇的革命部隊去打倒那個兇的反動軍隊。民众的武裝組織，甚么自衛軍糾察隊都不能和他們打的。兵士——破産失業的農民，我們对於他們是不能注意的，即使有『兵士联欢』等々運動也只是浮面的。沒有兵士提出的切身要求，沒有去宣傳兵士。沒有將工農群众與兵士群众的要求联合的。只有对軍長師長的注意联絡，只有注意政治部的点綴工作，政治部是裝飾醜惡的師長軍長反革命的鬼臉，使成梅蘭芳似的革命美貌之脂粉，『政治部是姨太太』。政治部最好的成績，只是使豪紳性的軍隊变成資産階級性的。如果群众之中，自發的計厭這些軍閥，那么往々直接表現於厭惡五八，——十五六年来

的「軍民惡感」的旧方式。兵士群衆也就很容易受軍閥的蒙蔽，听他们說工農共產党專是反对軍隊，「妨害軍食」「搗乱後方」。

總之，中国共產党对於這些主要问題的答案，客观上是違背革命的路線，其結果，根本上無形之中要走到限制階級鬥爭。共產党的加入国民党，是要力爭非資本主义的前進，事实上却变成「既然加入国民党，自然，就是承認中国革命是資本主义的前途」。加入国民党，是要力爭無產階級領導权的；事实上却变成「既然加入国民党，可見革命領導权应当是資產階級的」。加入國民党，是要創造民权的革命統戰制，事实上却变成「既然加入国民党，可見革命僅还是要国民党成功的，政权是国民党的，共產党决不可以参加或攘奪」。加入国民党，是要徹底領導民权革命到底，实行土地革命的；事实上却变成「既然加入国民党，可見革命权是反帝国主义的，不是土地革命，因為国民党中有贊成反帝国主义的左派，而决(没有)贊成土地革命的左派」。加入国民党，是要征取一般小資產階級的群衆，征取軍隊中的兵士群衆，並且發動工農的階級鬥爭以至於武裝奪取政权或保障政权的，事实上却变成「既然加入国民党，自然决不可破坏国民党的軍隊，而只能利用之造成好軍隊——資產階級的軍隊，而使民衆得些自由，以準備將來之無產階級革命」。如此，当然到了階級鬥爭日益激烈的関鍵，中央要認為「危險」——危害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線了。

中国共產党对於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題，既然有如此的模糊而不正確的观点，机会主义就隐約的(的)成為系統的思想，雖然許多忠貴同志可以有種々不同的傾向，然而沒有能逃出這个系統的。於是联合战線的革命策略，变成妥協政策的護符。中国共產党中央委員会的策略，遠從第五次大会之前，甚至於從第三次大会起，就有机会主

义的根源。机会主义策略的原则，就是「既然要联合战线，就应当自己让步」——就是留恋着与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直到不可能的时候，还要留恋；忽视农民的革命作用和土地问题豪绅政权之重要，直到农民群众自发的发动伟大的斗争，还要加以阻止；误解小资产阶级的问题，将店东小资产阶级和地主甚至于「正绅」作为联合的主要对象，而要"调停"店员手工工人及农民之阶级斗争。凡此一切，自然只是大概的说来，便是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中国革命中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机关的状况。这当然可以说：中国无产阶级，不幸有了一个小资产阶级性的革命者组织，来做自己的指导机关，中国那时没有无产阶级的布尔塞维克的政党。

这种小资产阶级性的机会主义，遇见革命群众阶级斗争剧烈发展，便跟着国民党的小资产阶级左派领袖大大的动摇起来，动摇与犹豫是党的政治路线。这是由于畏惧群众。对于中国革命之内容与性质懵懂的党，如何能不畏惧群众，以至于恐恨群众呢？自然，如此的党要想出许多法子来「管理」群众或者「帮助」群众了。所以第五次大会期间，革命到了最剧烈的战争期间，机会主义的各种「药方」都显露出来。一种是最旧的中国式「革命書生」的對党观念，就是将无产阶级民主集权制的党，变为「党的拜物教」的观念，認為一切革命，须由治国平天下的党以命令諭告来训练並指挥民众才可以革成功，如今，「不但国民党下级党部不听他中央的命令，甚至共产党的也是如此」，那就糟了，必须以党的议决及命令制止群众的某种行动，才可以保障革命。一种是中国式「革命将军」的观念，就是将无产阶级的武装斗争，想像成军阀式的政变，政变之後，或许可以保护民众的阶级斗争，政变之前且请民众等一等。一种是「革命的回忆家」，就是回忆到五卅时期的「革命密月」，

以為階級鬥爭發展得太單純了，如果現在再有五卅時的反帝國主义的高潮，「與資產階級的联合战線」，那么，未許階級鬥爭的危險不至于如此之大了。独有無產階級独立的階級鬥爭的策略，以組織群众發動工農兵士及一般貧民的小資產階級群众，堅定的領導他們往前進攻，而擴大深入革命，運用這工農小資產階級联盟，以革命發展的策略，是沒有的。列寧說：「要帮助動搖的人，先要自己不動搖」，而事实上，那中國共產党中央的格言是：「要自己退後些，免得人家跟不上」，那時不是運用工農小資產階級联盟去革命，乃是為工農小資產階級联盟所束縛而不革命。

中國共產党中央過去這種机会主义，应当要說是一九二五年至二七年革命所受三次大失敗之主要原因之一。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這並不是說絕無客观的原因，不過絕对不能藉口於客观原因，而為机会主义辯護。

中國革命所受三次失敗之客观原因，大致說来可以分為四点：第一，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雖然背叛革命，其实他的政治经济力量是很小的，雖有帝國主义政策上物質上的帮助，他不能成為中國革命之最危險的敵人，而帝國主义者，恰好處於英國礦工大罷工挫敗之後，欧美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不足以牽制他們，如同俄國十月革命時期一樣。帝國主义者握有中國经济的最高权：金融交通工業及國外貿易等等。帝國主義在革命達到長江區域之後，用極嚴厲的鎮压手段，压迫革命勢力；对于武漢，從一九二六年冬天起，便斷絕商業関係，停止銀行營業，停止兩湖貿易，関閉工廠，使武漢一鎮的失業工人——無產階級及碼頭苦力達到十二万以上，又出兵上海，許多軍艦屯駐長江，加以威嚇，他們這種逼使資產階級加速反動，鞏策小資產階級而使之加速退伍，压迫無產階級而削弱他的力量，是万分收效的。第二，中國的

客观环境，形成初期极广泛的『革命的』联合战线，从豪绅地主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直到广大的游民化的非阶级化的群众，都自觉的不自觉的『参加』革命，这种客观形势的革命，其军事力量寄託於豪绅资产阶级之手，在兵士群众未能自觉的发动而参加的条件之下是必然的。因此，虽然民众尤其工农自发的阶级鬥爭发動到广大而深入的阶段，然豪绅买资产阶级仍旧保有他的强大的实力，换言之，就是封建势力的武装力量仍旧是『文風不動』。这自然使鬥爭的陣势对於工农是加倍困难。所以放任广大的非阶级化的破产失業的农民（兵士）群众於豪绅軍阀的领導之下，無產階級沒有確定的对于他们的態度和策畧，是不容許的。但是『廣泛的联合』時期，沒有能運用应当運用的各種各式方法，去取得他们。客观上工农左派联盟，所以能得取小資產階級，正因為小資產階級覺得無產階級的鬥爭方法，民衆團体的政权（党权的『民权』化），是可以限制豪紳『革命家』的軍权的。同樣，革命發展下去，客观上不能不是無產階級联合這些半無產階級的兵士，而進于最劇烈的武裝鬥爭，這時，小資產階級，尤其是店東等上層小資產階級必然要離開革命。因為中國兵隊问題十七年来政局中最顯明的问題；這些兵士要求解決他们的生活问題，他们数量之多，使革命前革命後一切政府的財政问題都要困难。革命發展到一定階段，無產階級面前的问題就要是：或者联合兵士貧民的『游民無產階級』，或者联合市儈的小資產階級，不能兩全的。当革命發展到長江流域：『一方面……必須鞏固國民革命軍及國民党……别方面階級矛盾日益成熟，……必須既不動摇联合战線，又要变更國民党國民政府及其軍隊中之階級結合，』（『中國革命與共產党之任務』——共產國際雜誌第七十一期社論）。這確是非常之困难的任務。变更軍隊的階級結合，這就是

共產黨右派取得軍隊，這就是進一步必須勇敢的實行某種社會政策，足以解決兵士貧民廣大群衆的生活問題的。這就是說，不但要侵犯資產階級並且要侵犯市儈的小資產階級。第三，中國經濟之中較大的工業很少，全國佈滿着小資產階級的商業和地方性質的市場，這些地方性質的市場之上，帝國主義的鉅大資本是站在發号施令的地位。小手工業的手工工人和店員，佔着中國勞動階級內的巨大成份。苦力更有三四千万以上，手工工人和店員的階級鬥爭，使這類店東資產階級的經濟限于夾攻的地位；一才是帝國主義的封鎖，一方是工人要求增加工資。他們自然要歇業。這当然影响到全部經濟生活。這要求革命政府以果斷的独裁手腕，对付一切怠工閉廠破坏經濟生活的革命之敵人，『用政府机関和無產階級組織的帮助，經營這些企業』（第八次國际執委全会議案）。這对于帝國主義的資本家及大資產階級固然必須要用，但是对于一部分普通商店，也要弄得不能不用。对于武漢政府，這種任務要求極大限度的組織力量，組織經濟生活的力量，但是在武漢區域之內找不出，找出的也不够；湖南農民協会有能力整理米粮，武漢的工会有力量支配現金集中後的兌發銅元，可是整個兒的經濟政策沒有！第四，國因為工業不發達的緣故，同時無產階級的年齡也就小，数量也就少，廣大的勞動民众，手工工人店員貧農苦力雇農等，客观上都是帶有小資產階級的傾向，組織能力自然沒有工業無產階級的大。加之中國的智識小資產階級，也絕少受過對工業訓練的，他們之中就是最革命的份子，也很多傾向于浪漫的小孩子氣的『革命行動』。武漢時期，因此發露許多『小資產階級的社会會主義理論』。手工工人店員的工会運動，便認為是社会主义已經实行了。何時『共產』成為一般社会的街談巷議。這種『共產』的意義，便是『均分財產』——

实行均無貧。于工人店員的要求，固然并非過火，他们实在是無火可過。但是的確有許多行会性質和小團体利益的傾向。這是因為他们的目的，实际不是实行社会主義，不是要实行將生產資料归公，他们可以不问工農政权之取得的任務，（就标是民权主義的政治任務），他们只想要達到同他们店員東同樣富裕的地位，或者達到豪富的地位更好。這在自發的小資產階級性的鬥爭，講平產或"均無貧"是無足奇的。這在無產階級的革命的領導之下，不但不足怕，而且是革命高潮的势力所在。只是事实上無產階級的政党在此客觀的歷史条件之下，非常之弱，有些傾向『甲種』的小資產階級主義，就是主張調節妥協些。有些又傾向『乙種』的小資產階級主義，主張已經是『十月革命』了，已經是社会主義了，必須準備起自己的『槍桿子』（軍隊），实行退出國民党，然後才能继續革命。一些浪漫的小資產階級革命家，他们不去注意如何取得政权，如何实行土地革命，他们是去用强迫手段劈去農村人家的祖宗牌位，用强迫手段去剪掉老太婆的頭髮，用强迫手段去放掉纏足婦女的纏脚----他们是何等澈底的勇敢的文化革命家呵。凡此一切，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馬克思說，在革命之中，蠢事不見得少做些，有時还特別多做些呢。但是總起来說，這時期，真正無產階級領導之不堅定不明顯，從這方面可以看得出来。這对于革命便是無組織性与散乱性的弱点，便是革命力量不集中，不能向組織有系統的進攻。革命的『頭腦部』（中國共產党中央）拒絕指導群众的自發鬥爭，革命便成『無頭』的狀態。

中國革命的最劇烈最殘酷最複雜的鬥爭時期——革命战爭發展到長江流域的時期，是站在上述那些主觀与客觀的条件之中。雖然前幾年的革命發展時期，國民党改組後及五卅以来的革命時期，已經怀孕着許多机會

主义的理論與方法，雖然共產党的組織在這個期間已帶着這種机会主义傾向，自然也就帶着許多宗法社会的習性，指導机関之中不能推出工人同志的領導者，甚至工会之中也都是智識分子的『职業革命家』……虽然如此，客观上勞動群众的鬥爭已经發展到極大的規模。赤色的工会運動發展到將近三百万会員，吸收極大多的店員手工工人参加；農民協会，以湘鄂贛粵計标，發展到將近一千万会員，國民党左派運動有極大的發展，軍隊之中如葉挺等的部隊也有一部分的力量。這些發展大半屬于自發的。可是前一階段中共產國际的加入國民党政策，以及客观上革命势力的發展，使『取得國民党取得國民党革命軍取得一般小資產階級』的策畧事实上已部分的实現，而形成部分的革命势力——共產党以工農團体中的領導之取得而成為革命的先鋒与主幹。当時的任務，就在一面認清五卅以来『中國無產階級暫時还沒有革命中之領導权』，(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共產國际杂誌的社論)一面堅决的進一步而取得政权与軍隊的領導权。這是革命發展到長江流域時的形势。中國共產党中央便放這種形势之前。

那時，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底共產國际执委第七次擴大会議，便决議中國问題的議决案，指出当時的行動政綱，指出非資本主義的前途，須以爭得革命領導权来達到，須以工農小資產階級的联盟来对付，必然要背叛的民族資產階級，指出中國革命的主要的内容是土地革命，必須勇敢的領導農民之自發的鬥爭，指出無階產級及手工工人的階級鬥爭之劇烈，須要勇敢去領導，以成為征取整個革命領導权的力量，須要加入國民党以擴大并贊助工農的鬥爭，建立工農小資產的民权独裁。

時勢是日益嚴重起来，蔣介石叛变後，共產党的政策雖然在第五次大会有許多决議，实际上最高政策是在另一条路上進行，是在第五次大会背後進行，何况第五次大会决議本身，只是蔣介石叛变之前的性質。将他和國际第八次执委会議决議相比，是有許多不同的。

最高政策是誰在执行？一是國民政府 向鮑羅廷——他是共產党在國民党中央及政府裡的党團之实际領導者，一是國际代表魯易，一是中國共產党中央委員会内的政治局（独秀，和森，兆徵，秋白，平山，維漢，恩来 ----）三个領導之中鮑羅廷是有一定的路線——退却的路線和緩土地革命，魯易亦有一定路線——務必同着小資產階級進攻中國共產党政治局实际上是沒有一定路線，因為他已不能指揮群衆，這又因為把動摇於鮑魯之间，這因為他内部有許多糢糊的不同的傾向，而不能一致，但实际上是傾向更右于鮑羅廷的佔優勢。

汪精衛在"武漢分共経過"一篇中說，他的分共是経過三个階段；第一，是四月下旬至五月中旬。國民党中央决議組織湘鄂贛各省特別委員会以裁制違反本党主义政策之言論行為，第二，是五月廿一日長沙政変至七月十五日的國民党分共会議，算是"和平分共"，第三，是"因為"中國共產党中央委員会議决退出政府"对于國民党厚誣醜詆"及葉賀舉兵，便实行嚴厲反共。不論汪精衛的"供詞"如何矯揉做作，說得"仁至又盡"但是；這句話之中有一个真理：就是武漢下令"討蔣"，一方便已下令"討共"討蔣和查办湘鄂贛各省過激言論行動之特別委員会組織的决議差不多是同時日的．(四月十九日下令討蔣，四月下旬即組織特委)，這是共產党正在开大会的時候呵！第五次大会以前，顯然的已経是武漢小資產階級見着上海暴動之無產階級力量"不足恃"而帝國主义及資產階級的勢力之可畏可羡，就将一切反動派毒駡

工農之"過火"宣傳差不多完全接受。資產階級欲使無產階級（共產党）孤立之政策，已经得到一度的成効。這時共產党的政策是如何第五次大会不但沒有答覆，并且沒有提及過這一问題，這一问題是在第五次大会背後討論着。

國际第八次执委会議說：蔣介石叛变是革命的部分的失敗，無庸諱言，我们的任務是："向着群众"革命战線先了一个資產階級，但是，得到更高的發展階段，得着農民土地革命，要在工農羣众中去找力量，預防種々政客及将軍之新的政变，当如此去鞏固加强工農小資產階級的群众之革命联盟而領導革命前進，战勝那些新發生的困难和反革命的勢力。

但是同時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中國共產党中央的漢口会議則認為"國民政府有右傾的危險，民众運動又過于左傾。沒有提起土地革命沒有準備与民族資產階級破裂之决心。那時便已有隱約退却的陣勢之开始

事实上一九二六年十月至一九二七年三月底即時農左派联盟的"極盛時期"。如果将当時的客观形勢与國际第七次执委的中國问題决議案相对比，人人都可以看出國际决議案是非常正確，可是中國共產党的中央委員会，一則覺得武漢之下工人運動過左了，二則覺得土地革命未必如此利害。（有一中央委員当時对鄧演達說他不覺得國民革命是土地革命的）三則对于反蔣以反对資產階級領導权正在猶豫不决。中國共產党的一切"原則"都在動摇之中。

漢口会議之後，漢口工人鬥爭来了，上海的總罷工来了。武漢國民党第三次中央全体会議来了。這些事实更証明國际决議案所指示的道路之正確，上海工人階級九十万人的總罷工，一直發展到空前的群众暴動。当時湘鄂贛的群众運動是什么情形，只要看毛澤東著的"湖

南農民革命"便可知道。上海是什么情形！廣東是什么情形！總之工農的爭鬥勢力已經接近到民权独裁的創造，小資產階級是在左傾。——誰也不敢公開的反对"階級鬥爭"，民族資產階級是在踌躇而動搖。土地革命尤其在湖南已經由群众自動手的實行——但是中央的政策是如彼！

蔣介石四月十二的政变爆発了，中國革命遭了部分的失敗，其時反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帝國主義，而形式上以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蔣介石）為中心，團集一切豪紳地主及右派的軍事力量於江浙閩粵各省。而在武漢境內以及一切代表這些階級的軍隊做助力。他的目的当然首先便是摧滅武漢的革命中心。武漢的革命勢力，客觀上是要以無產階級做中心。團集極廣大的当然是小資產階級的，可是最澈底的民权革命的群众勢力之農民以及一般貧民手工工人于自己的周圍。他在上海有久經鬥爭的無產階級之力量。在廣東有鬥爭最久的農民群众，但是他有很大的弱点。就是有許多所謂"中等階級"之"同盟者"，這些是前一期的革命同盟者，但是到這新時期是必然要大大動搖起来，必然要退縮要恐慌。固然豪紳資產階級內部的衝突还不在生長，許多"革命军人"与蔣介石之間以及他們內部还在衝突，但是他們已經有一致的反攻工農的陣勢，這時革命之中的確発生很大的困难。

這時候，一九二七年五月十八，共產國際執委開第八次全体会議，并決議關于中國革命問題的決議案，這一決議指明：(1)為战勝困难必須廣大勞動群众加入爭鬥，造成一種政权，打退內部的反革命及帝國主义的干涉，消滅封建制度残餘，完成資產階級革命——(二)就要在鄉村中実現"平民式"的土地革命，同時，須要在政府之中努力，使政府促進土地革命之爆発擴大，(三)在城市中滿足工人階級要求——經濟的政治的，実行八小時工作制，增加工資等々。(四)只有這樣才能使政府成為実際

上工農之革命組織的政治中心，成為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权独裁机关；(五)共產党要独立的發動，对于革命小資產階級民权派的動搖不定无論不能放棄批評的权利。(六)擴大國民党以工農兵士手工業者整个的組織加入國民党，國民党的地方及中央指導机关，要勵行選舉，加以改造，嚴厲的裁制一切勾結帝國主義和蔣介石之反革命陰謀。(新的叛变可是能而且不可免的)(七)共產党留在國民党政府之内必須将所有的权力，自上而下加强土地革命，及工人運動，不如是去造成武漢政府与群众之最密切关係則勝利之完成是不可得的，要努力建立地方上的群众政府权(蘇維埃的口号还是太早)(八)对帝國主义如無条件的没收外國企業还是不能，容許若干"縱横捭闔"(应付)的策畧，但对故意总工破壞紊乱經濟的外國企業及中國反革命的資產階級，便要以没收的嚴厲政策对待。(九)一面繼續北伐，一面破坏南京政府的後防，就是以群力量鎮压(摇)摆粤的反動势力之統治，同時說明暴動是玩不得的。(从上海工人如果在蔣介石政变時，沒有当勝利的希望存在，就發起廣大的武裝行動，則必被蔣介石帝國主义联合之武力讀滅")(十)加强工農小資產階級之战線，除以全力擴大農民革命外，必須同時保障小資產階級之勞動財產不受犯侵，并助其反抗高利資本等之鬥爭。這就是共產國際当蔣介石叛变後之政策。

中國共產党？因在此時，而且時间更早些，(一九二七年四月廿七日第五次大会開会)；而且在中國的武漢中國共產党的决定如何呢？這時在蔣介石叛变之後，中國共產党正開始第五次大会。第五次大会積極意義固然在大会上决議关于中國革命根本的原則的问题：革命前途，領導权及土地革命的意義，固然這些原則问题，到此時若不再解决是一步也不能前進的。可是事实上連這些原則也不過是形式上的接受吧了。对于蔣介

石叛变後新形势，并無明顯的具体的決定。第一对于原則問題，國际代表魯易正式向大会伸明"中國的勞働群众是英勇的鬥爭，因此，中國不会有孟塞維克主义"再則他說関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的上海談判及為对力爭國民党的純生派化的政見之錯誤与否，是不能討論的。于是第五次大会除形式上　　接受國际第七次擴大会議决設以外，只落得模々糊々的一種概念，以前彷彿也並沒有什么托会主义，孟塞維克主义存在以後也彷彿并不是需要一種党的思想上政策上新的改变。然而國际八次执委会议却說得很明白："大規模的說明中國共產党内有上述的錯誤和動搖，是必要的；不然則中國革命的根本问題中当相的動搖之危險更加高了"，第二，当時蔣介石叛变了，魯易同志的政治意見是：左派以至小資產階級除跟着我們走以外，沒有别的出路，并沒有指出新的叛变的可能及共產党对這些新的叛变複様的具体的任務。於是第五次大会的空氣是"共產主义与三民主义合作到底萬歲"這是在嚴重的鬥爭之前于的消閑態度。這当然是說一般同志浮面的　態度。第五次大会的時其实在一般同志内心中都有"不安"的預覺，那表面的消閑態度，不過是"無辦法"的自欺的安慰。

中國共產党方面呢？對於此问題的答覆，一向始便不一致，因為連问題何在也不知道。至今还有人事後来說：當時的中心问題是軍事问題；如果我们自己調兵力打个勝仗，"結果，也許所謂左派由動摇而穩定，由離心而向心，……也許中断其反革命的傾向"（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问題当然不是如此简单。总之，當時对於蔣介石叛变後武漢之新形勢的问題，党内没有一致的意見，當時的意見有：

(一)鮑羅廷的——(1)对帝國主义用應付政策，(2)對"小資產階級"(所謂工商業者)讓步，(3)對地主豪紳也讓步，(4)驅使"將軍"去北伐——联馮以制蔣；以此種政策領導左派領袖反对武漢南京之右派反動勢力。

(二)魯易的——(1)對帝國主义贊成应付政策，(2)對"中等階級"(所謂工商業者)相当的讓步；(3)對地主豪紳不讓步，仅对小地主"革命軍人"讓些步，(4)對"將軍"則主張改組其軍隊，故不可北伐；以此種政策領導左派去進攻"深入革命"。

(三)中央的——(1)對帝國主义贊成用应付政策，(2)對"小資產階級"(所謂工商業者)完完全全的讓步；(3)對地主豪紳也完全讓步，認為土地革命尚須经相当時期，不能立刻实行；(4)"革命軍人"則联甲倒乙，联乙制甲，——结果还是北伐最好；最好是讓左派去領導，自己讓開些，使革命不至於太"超過時代"。

来来，共產党與國民党合作，可以說是"以越飛與孫中山的宣言始，以"汪陳宣言"终"。括意是中國革命不可有無產階級独裁，則必須資產階級參加革命政权。上海無產階級英勇的三月暴動時，中央和江苏省委的政策是必須保障資產階級派參加市民会议政府，而且要宣言"决没有無產階級專政"，以安人心。那么，武漢如今到了一般社会認為因共產党之參加國民政府而有無產階

級独裁的傾向，自然最好避開這種嫌疑，而使左派《容易》應付反動派。

當然，這三種傾向只是大概来說，當時政治局委員之中，个々都是動揺無主的，即使有若干不同的傾向，也無什么作用，对各人自己都無作用，不能說对群衆及"大政方針"了。上述三種傾向之中，魯易的政策顯然不是机会主义。魯易的政策有一根本的缺点，便是要進攻而不知道如何進攻的方法，他的《深入論》是集国际議案的"同時北伐說"不同的；他客观上是回憶着孫中山時代的廣東政府，可以扶持汪精衛（孫中山）以改組将軍们的軍隊（如黃埔軍官学校初办的時期）；他的对《中等階級解釋》之策畧，是根源於不明瞭當時的階級関係，的確不免要"附帶的"侵犯到這些中等階級方能深入革命了；他不明瞭：不僅要發動工農群衆，而且要發動兵士群衆，方能"改組"軍隊了。魯易对於汪精衛的幻想，也就基于此点。最後，他延将国际電令（說㈠土地革命可不要国民政府下令，而先努力領導自發的没收土地運動，㈡《革命軍人》的土地不没收，㈢改組国民党中央，㈣武裝工農及同志共七萬人，㈤ 罵懲办反革命派，使国民党左派自己来做裁判官。）送給汪精衛去看。他是想"用誠佈公不外交的"與左派領袖聯合战線，而不是像国际所指示的要求召集国民党第三次大会之與群衆聯合战綫，不是实行各縣以至各省民衆團体政权（如農協政权等）之群衆聯合战綫。《領袖聯合》并非原則上絶不可以，然而是當時的具体客观形勢已経要求"向着群衆"了！魯易的政策，实际上是并未实行，可以不必多說他。

事实上，鮑罗廷與中央兩種傾向混合進行，便形成總的革命勢力潰敗之形勢。當時事实上的政策是：㈠為战勝蔣介石叛変後的困难，必須讓步；㈡土地革命停止進行——甚至自己承認農運《幼稚》，过火，命令許甫

記者党團在武漢民国日報作文批評農運，農政部出佈告，中央宣傳部出宣傳大綱，糾正自由行動的没收土地等的过火，贊成解散黄崗農民協会……(三)工人店員運動則制止过火，禁止漢陽工人没收工場之行動，第四次劳動大会只以「鞏固工農小資産階級联合」口号為中心口号……(四)決定共産党々員在国民党々部及报館須聽国民党命令，不得有独立主張，須服從国民党之指導……贊成解散「过左派」的(共産党員主持的)国民党下級党部(如黄崗縣党部)；(五)共産党員退出省政府(湖北)主張各地々方政权須尊重国民政府之最高权；(六)討論到是否共産党應退出国民党，其実在此之前，已経贊成国民党中央組織特委員会查办，已経絶对禁教動群衆以改造国民党指導机関的意思相反，所以退出国民党便成後来自然的結論；(七)應當自動退出国民政府，使左派容易对付些，譚部長請病假，要限制工農会及其糾察隊童子團等之行使执　权；(八)对帝国主义則在武漢應用應付政策，在滬粵应挑起民衆鬥爭以掩護階級鬥爭；(九)北伐或東征以移轉武人之視綫，使不專注意於階級鬥爭之劇烈。——对蔣介石則希望東征或南伐去推翻他；至於廣東鉄路工人與各縣如海陸丰農民的暴動，則絶無絲毫指導，反而对上海決定工人加入工統会；(十)对小資産階級，則事々聽從之，像他们聽資産階級一樣，以「鞏固工農小資産階級的联合战線」。這和共産国际第八次执委全会議决，是完々全々相反的。

當時，中央反对国际的電令，是當然的事，因為全个方針是相互的。——再要否認孟塞維克主义是不可能的。彭述之在這時候著了一部書，名為中国革命之根本问題，他說：根本问題在現在是「鞏固並發展工農小資産階級联合战線」，為此，必須有三个必要的条件：「第一，在共同利益中，應該顧到各个階級的本身利益，

另一方面，工農小資產階級应有一種互相讓步和了解的精神。特别是店員——一方 須作可能的改善"帮手"和店員生活条件，同時，亦須顧到手工業主和店東之营業的存在以及發展条件。第二，在幾个階級联合战线当中，应該承認革命的先鋒勢力，承認最有經驗之領袖階級（無產階級）。第三，與世界的革命勢力發生密切関係，誠意接受其帮助。這可備来做当時事实上的政策之總論。

蔣介石叛变後武汉時局大致有幾期迅雷闪電似的急轉：第一是四月中旬至五月二十一日；第二是五月二十一日到七月四日；第三是七月四日至七月三十日。

第一期，是國民党中央的土地委員会，工商联席会議與北伐问題，佔領了中央政治局的注意，第二期是局变问題（及湘鄂贛反動勢力高漲；）第三期，是退出國民政府问題。第一期中，北伐问題是依照"國民党之指導"而决定。土地问題在我们本来是"一無定見"，對於没收地主土地已经由農民自發的实行了，農民政权更是現在的问題。國民党左派與共产党同被事实所迫，不得不解答這一问題。當時左派雖然看見共產党内的不一致，（土地委員会裡C.P.党團之中就有四種不同的主張），但是，还没有把握認清共產党是必然退讓的，他们仍舊不敢完全的取消這一问題，汪精衛都被迫而承認"没收肥田五十畝瘠田百畝以上之地主"的主張。但是共產党方面着重這一議决案可不必佈。再則第五次大会在鲁易指導之下，拒絕討論土地党綱（國有土地）的问題，只决定土地政綱（案畧），而且决定小地主等不没收，須以已没收土地之耕種者所繳進稅爲標準，去实行对永没收土地之減租。這一"高等代數学"在農民群众中是無從宣傳，是不能了解的。工商联席会議，决定了許多对"中等階級"讓步的办法，商人仍是没有感覺「營業自由」

……第二時期是夏斗寅，許克祥公開叛變的時期，中央对夏斗寅事变發一宣言，向「中等階級」解释並号召工農起来作战。武汉有些失的工人应募加入葉挺軍隊及中央軍校独立師去打夏斗寅。那時群众的情绪已经觉得國民党固然不能保護他们，共產党也不領他们切实鬥爭，要他们去拼死打危害國民政府的夏斗寅，似乎不值得呵！許克祥事变發生，——唐生智在前敵还假意擁護三大政策。然而後方的左派，在反動势力最重压迫之下，共產党又節节退讓，他们的反動「勇氣」是高漲了。他们明顯的表示不願意鎮压反動。最初，共產党中央只在猜测許克祥是誰指使的，可以利用那一「革命軍人」去打他，可不可以將延未执行的湖南省特别委員会查办的手段实行起来，以和緩反動（所以有鮑罗廷譚平山之赴湖南被擒駕回汉的事）。猜测又猜测，始终不能决断，因此，就算利用唐生智表面左傾之弱点而急剧進攻許克祥」之妥協政策也不能定。最初是「靜候解决」的宣傳，隨後，方才不得已而决定進攻。當時湖南在馬变以前，表面上工農势力尚未明顯的退讓之時，左派甚至还在国共联席会议上通过没收百畝以上大地主的议案。（湖南的国民党左派在馬变之後，还在等着C.P.工農得勝，好恢復他们的政权，有些直等到「八七」会议之後呢。）夏斗寅發動於湖北，同時，許克祥發動於湖南，这是說豪紳地主階级進攻了。湖南省委经馬变的打擊，事前雖然畧有準備「武裝爭鬥」，事券觉是「一哄而散」，餘下的臨委仍令調集中的全省農軍攻長沙城，而駐湘中央委員因為这样「靜候解决」之政策相反，故加以糾正。武汉方面呢，中央到此時才决定「進攻」。事实上湖南農民已经一次内部涣散與挫折，同時因夏斗寅尚未肅清，武長交通隔絶，所謂進攻，只是在委員会中開会，派人，找錢。何况那時中央說「這種政策太危險了」。

单调的武装工农没收土地，高叫非资本主义前途等口号……反帝国主义运动反消沉下去"。这是当时中央给上海的信，要提高反帝运动，发动"民众斗争"的信。这论调和所谓进攻的论调是同时的同一机关（中央秘书处）发出的。这是什么进攻呢？所以不久江西朱培德也"勾结"共产党员及左派国民党了。中央最后一点"进攻"勇气也完全消失了。反抗许克祥的屠杀的示威运动也变成欢迎唐生智张发奎班师了。随着，何健反共准备的传言，一天天盛起来。于是有所谓东征问题。东征问题的本身，其实不是什么问题，而是如何骗那些"革命军人"先反蒋后反共不难呵。这也算是"缓兵之计"。（当鲁易反对东征，主张南伐，他自己亲向汪精卫提议：教他联络张发奎，离开唐生智，而以摧毁共产党兵力为条件"，这是他最后的不作降将的勇气。但是，这仅仅是帮助汪精卫）。于是讨论东征问题的政纲问题。因为当所谓第三派军人反蒋亦反共的政纲；何键等更是声明"不过为共产党打蒋"所以中央的政策是"无论如何要发表一宣言共政纲，总意仅仅是声明必须实行三大政策，所以国民党必须反蒋而联共。可是当时中央政治局内部的意见纷乱不堪，独秀，秋白，国涛，和森四人各起草一篇宣言，都不能通过。政纲呢？汪精卫所需要的是资产阶级的政纲，可以拿来共蒋介石争夺东南资产阶级的政纲同情。共产党要他们东征，他们就要共产党"服从那个""服从这个"。于是有名的武昌会议（七月一日）的中央会议便开了。这会议是要议定东征政纲的。其实政纲已在实行！六月二十一日(?)中央开会，决定十一条国共两党关系的政纲；当晚便执行自动解散汉口的工人纠察队，谭平山已请假了，湖北省政府的"共党份子"也早已退出了。——中央秘书所也在这几天内慌慌张张的逃过武昌去。不问当时主张"迁都"武昌的主观何如？客观上的

形式是：避嫌与逃命。现在说起好听：那时国民党左派已经无希望，我们去独干吧。（群众呢？谁也没有管群众，各工会各国体各机关的负责同志，都嚣张得不堪。谁也不能说，他是逃往武昌去发动群众的！）其实呢，是让用他们说：「国民党左派呵！你们独自去领导罢，我们告诉你你，我们忠告：你们不要在民众看了，只有无产阶级是三民主义三大政策的忠实继承者！——这是救国救民救党的唯一政策，联合战线的政策。你们不信，我们可以走了，让你们吃了亏，回头来想老人之言呵！」或者说：「反蒋本来不是抵抗或附和于无产阶级，只是实现工农中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我们这样劝你们不听，我们只好走开了，只怪你们太多疑了！我们的走是可以证明并无夺取革命领导权的野心」这样的临别赠言。——这十一条政纲是与国民党左派合作的最后尝试，更后的拉撒，一面逃与避，一面拉与撒。武昌会议开会决定了一个议决案，一个政纲，这两件东西是十分符合的。议决案上说：我们要领导左派，要批评左派，要单独进攻反动派。要准备着这些小资产阶级左派始终离开时，我们能号召群众（以及国民党群众）与地方，反对现在的中央与政府。（其中引用国际第八次执委决议之一节）政纲上却说：革命的领导地位是国民党的，群众不得批评，不得自由行动。中央的不一致，在这会上明白的表现出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卿时要求发表其土地革命的主张，而被禁止，他们对决议案勉强可以接受，对政纲是反对的，结果冲突而散会。这会一开始，便亦是从冲突而起的，代英同志说：「现在中央很奇怪，我听说秋白同志到汉报告是『进攻』，中央又是决定要『退让』，『退让』，中央内部是否有不一致？」独秀同志说：「正因为不一致，所以要开会呵！」。第三期，七月四日——徐谦，顾孟馀，冯玉祥先后几个电报来，报告蒋冯

的徐州会议，他们是公开的说：去鲍驱共，武汉领袖也要引咎辞职，随後，冯玉祥委何健为「第八路总指挥」的消息也到了。唐生智到湖南去是清乡的消息也証实了。武汉每天都可以有政变的传言。汪精卫的態度，表面上还是摇動，还骂徐谦，还未到国共联席会议討論店员问题。（國共联席会议從汪精衛到汉開起，一直開到七月七日(?)向来是沒有党國的。）实际上，汪精卫此時已不是動摇于共產党與反動派之间，而是動摇於張発奎與唐生智之间——張発奎部下C.P.众多而無出路，还帶着許多幻想：是否共產党可以在政策上讓些步，他来與之合作而得些錢與械以南征廣東呢？汪精卫的幻想却有另一方面：是否不一定完全靠張發奎，还可站在武汉之譚唐朱與南京之桂系的所謂第三派軍人之上，反共反蔣，而從武汉之「領袖」变成全国之領袖？共產党中央却亦因張発奎的動摇，而為最後的動摇。退出國民政府是不成问题了。但是，如何退出，是否同時退出國民党，如何繼續與張発奎合作，还成问题。这時候，真正不能說有中央了。独秀的傾向與鮑羅廷的傾向，一直維持合作至今也不能不露裂痕了。邓演達是左派中最後所剩的一个，孫夫人也反对分共，鮑羅廷这時的主張是：不退出國民党，領導这一部分左派裂出国民政府，反对汪精卫——这是他在二十一条政綱後幾天（七月某日）新变更的態度。他在十一条政綱之中，関於退出国民政府是反对独秀的主張的，是反对陳謙式的退出國民政府的。独秀的主張是：是否為保住退出國民党，「為图減大政局之糾紛」而退出国民政府，並非反对汪精卫的示威式的退出国民政府。譚平山呢，他这時早已請假，並登啟事对国民党及豪紳地主抱歉，說「不能夠農運於正軌」，理应引咎辞职。独秀也反对他自由行動。総之，中国共產党

中央已经实际瓦解了。」为减少政局纠纷起见，共产党亦可以应允退出国民党，只要国民党此後还能继续革命而且给共产党及工农以自由。」这一犹豫不决的思想斗谈判，便是五次大会之政治局最後向国民党斗世界告别的政见，便是中央重新从武昌迁回汉口的幾天之内的最後「奋斗」，鲍罗廷是反对这一意见的。十一条政纲是集机会主义之大成，亦是机会主义之顶点。过此一往，机会主义自身已崩溃而粉碎，中央政治局也是不能不散夥了。

于是七月十三日中国共产党令其党员退出國民政府的宣言發出了。那時政治局已经最後决定缩小，付斗其职权于推定之五人的临時政治局（國濤，维漢，立三，恩来，太雷）。

共产党遵国际电令退出政府，同时国民党七月十五日的分共会议也开了。武汉的反动已经开始，何键等已经动手拿共产党，他们的兵士"示威游行"。群众是丧失"头脑"，他们的"头脑"是自己渐渐的掉下。共产党中最後的宣言，只是从掉下来的头裡所发出的惊人的呼喊，但僅仅只是呼喊。王荷波同志說："我们工人看了這宣言，虽然还未揚眉，但觉吐了一口气——晦气"。

比後，中央经过一个散乱的状態，轉到反机会主义斗爭的八七会议。（這期间的詳情我不知道，因為我不在漢口）。八七会议，真所謂接受的遺產太坏了，八七会议之前夜，中央经过一時的猶豫，决定要招集緊急的中央全党会议。但是，因為当時交通困難，時日迫促，所到不足人数，只有湖南代表及尚未赴滬的新書記鄧中夏同志前来。這会议是有国际电令及新国际代表的指導而招集的。虽然人数不足（中央委員十二人候補三人，青年团中央委員五人，地方代表二人）不能作為正式全党会议，但是因為反机会主义的斗爭之緊迫及改变党的路線之重要，决定宣佈開会，作為中央緊急会议，（並非什么"改組会议"）並預定改選中央政治局，作為時臨政治局。八七会议之前，中央即：（一）决定湘鄂贛粵四省秋收暴動計劃，（二），决定葉賀南昌暴動之举行，（三）發佈中国共产党告国民党同志書（七月廿九日）這已经是新的路線，主要的意义是發動湘鄂　的群众暴動，重新团聚已受很大損失而散乱的革命力量，發動共产党员軍官之下軍隊独立奮起与国民党左派軍隊（葉賀）共同反对国民党的武漢中央及蔣介石李濟琛的"統"以革命的政綱号召在派国民党群众起来共同奮鬥。這"八七会议之前夜。

（二）八七會議

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歷史上反机会主义斗爭的新

纪元，新的策略路线，方才正确规定出来。但是有两个缺点：（一）因为土地问题政纲始终没有确定，始终没有明晰的对于中国封建的亚洲式的生产之土地的特殊制度的观念，所以关于"没收大中地主，对小地主则减租"的策略是模糊的，使地方党部往往仍旧继续对于土地革命的旧观点，认为农民自动的没收小地主时，党的任务仍应当加以阻止，要则八七会议对于这一点是很明显的规定出来。（二）对于国民党左派群众，号召且反对蒋汪反动中央，在当时固然是必需的（南昌暴动发难所向），然而这种行动政纲过于伸张，因而根据之决定暴动时的政权形式问题，仍认为"革命的国民党的这种组织，可以使将来革命发展到更高的阶段时，且政权形式将要进于工农兵代表苏维埃——那时的过渡更容易些，更没有流弊些"，这就错了。可是，八七会议始终有极重大的意义"当时共产党简直是在溃散的状态之中，他却党将救了出来，他只是洗刷旧的机会主义建立新的布尔什维克路线的第一步。没有他——共产党简直是要"亡党"的。八七会议改选了五次大会的中央政治局，发出告全党同志书，将机会主义的错误都明显的无所隐藏的指摘批评出来，这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的——政治律纪的执行是极严厉的，他要求旧的中央政治局承认这种严重的错误。这次会议开辟了共产党的新生命。会议决定对于农民土地革命及职工运动的新路线，决定党的组织问题的新方针，批评了七月廿九日告国民党革命同志书的政纲（会议后即由临时政治局根据之而决定政治任务案）。这些不但是纠正旧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并且是通向新的秘密环境——党自七月十五以后逐公开的变成绝对秘密的新环境，对于这一点，他是不能忽视的。

八七会议之后，中央之工作：第一便是领导武汉工人以总同盟罢工反抗汪精卫的反动政府"改组"工会及

民众团体（七月三十一日军警枪杀汉口市夫，八月三日宣佈戡罷工），第二，便是指導軍隊的南昌暴動，八七会議之後，南昌軍隊日漸前進到江西边境，交通与中央隔絕。中央的指導只能經过广東的南方局。而則当時中央在全党散乱之际，又遭着嚴重的白色恐怖，許多小資產階級份子脫党叛變，对於全国需要重新的大整頓，組織工作極其艰难而重要，中央儘自己的力量派許多新的同志到各地去指導，傳達八七会议的新决議。同時决定暫离武漢指導两湖的秋收暴動。

八七会議之後，不久，武漢国民政府之"東征"变成了"寧漢妥協"。中央就发佈告民众書，号召工農兵士民众以及国民党左派群众，起来反对這些反動的国民党中央，從這時候起，到葉賀汕頭失敗，是一个時期，這一時期之中，中央繼續的对党内实行反机会主义的斗爭。机会主义是有很大歷史性而且普遍於全国各省部。不去掉這許多餘毒党的新策畧是不能切实的执行。這期间，第一是葉賀南征的问題。葉賀南征是在八七会议以前很久就决定的。当時，已經决定取消葉賀軍中的"国民党中央裡的共產党党團書記"譚平山之責，使他不能以此名义而為軍中的最高指導者，另行指定前敵委員会，以恩来為書記，平山不加入，並在七月底派張国燾同志為中央代表，去軍中督促举事。然而葉賀南征之中，曾经有許多机会主义的餘毒爆发。最先是国燾同志，為連絡張發奎向題而時時動摇。可是前敵委員会始終决定了举事。葉賀南昌暴動，在歷史上是有意义的，因為他是代表共產党及国民党左派群众，共同反对陸續背叛国民革命的寧漢中央之最後的奮鬥，因為這是正直的奮鬥。但是我党在軍中的指導机関与中央的指導隔离，仍旧餘留着"国民党義主"的毒。這也是他失敗主要原因之一。軍隊到汕頭之后，工農群众便說！這是蔣介石第三的軍隊！

这还是要"耕者无其田"。为什么？因为一则军队中，苦于勇敢的去镇压"摸杀豪绅盗贼"，叶贺南征之中，敢策其豪绅上的倾向，是继承国民党革命的方法：(一)纯粹想靠组织好的军队力量，去取得地盘和政权，(二)以"王者之师"来解放民众，实际上是仁以君易暴君的办法，所以对于"安宁秩序"，只是保护豪绅统治的旧秩序，(三)是偏重于联络杂色军阀——某种军队或武力，勾结敌军军官倒戈（并非鼓动兵士）之投机办法，总之，是不发动群众，不信任群众。中央对于这些错误的指正，因为交通的阻隔，一直到叶贺差不多完全失败之时，方才达到，一直到失败之后，才得到前方报告，详细报告全党。但是，中央八七会议之后，便早已对于其他各省有类似的指示，例如江苏及湖南，等二问题，便是湖南秋收暴动的问题。湖南省委在秋收暴动命令达到之后，虽然高谈着中国革命是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无产阶级革命）虽然说土地问题上连没收自耕农土地也要提出来，虽然说已经要提出苏维埃口号而不要国民党，但是，实际上省委是在想着如何由党夺取政权后，实行法律的没收土地，安抚老弱"以安人心"，并不实行派遣同志到乡村中去发动农民群众，去鼓动长沙工人，领导他们起来斗争而暴动，却只要中央调动某几团国兵力于八月廿一日去打长沙，此之谓"暴动"。这显然是某种机会主义的遗毒。仍旧脱不了国民党式的军力主义与仁君主义。当时湖南是直接在马废之后，农民协会的政权时间，还活跃于群众回忆之中，唐生智军队大半在皖鄂。豪绅自马废以来，时刻在受农民协会袭击的危险之中，所以中央八七会议决定以"农协政权"的口号特别号召两湖的秋收暴动是切于实际的政策。中央所以坚决的指正湖南省委，而另规定两湖秋收暴动计划，而湖南省委忽然勇气消散，在鲁德林

叫等处暴动起来之後，反又取消长沙的九月十六日暴动。中央曾经两次严厉的批评，並召集湖南省委紧急会议，改组省委。第三是鄂北暴动问题。湖北秋收暴动期间，鄂南等处确能发动群众的斗争，直到截断武长铁路半月之久，（虽然当时的发动方法，多偏于游击式的）鄂北却成了问题。鄂北有共产党员张北平的军队将到，中央在八七会议时便派特委去指导準备暴动。但是特委没有去認真发动群众，不去领导当地群众反对捐税及樊钟秀的统治，仿佛認为农民还未抗粗並无土地之爭，即不能动。一面又令张北平去联络樊钟秀反对方振武的军事投机的計劃。中央亦屡次指示这种机会主义的国民党式的錯誤。第四是江苏蒋介石下野时期内，『暴动』问题。那时寧汉勾结，蒋介石下野，上海政权在吏迭反动人物之际。自然反动统治因为内部纠纷，乱混，江苏省委便决定夺取上海旧会所，而称之为暴动。这显然是不顧群众力量的冒险主义。当时国际代表便加以制止。同时，江苏省委那时还决定联络周凤岐以打击蒋介石的势力。中央立即为以纠正。——因为这更是机会主义的表现，很危险的机会主义。幸而那时江苏省委在国际代表指导之下，即时改变决定，取消已发出的行动大纲。再则，蒋下野时汪精衛东下，江苏省委之国民党左派党团书記王若飛，竟在中央反对寧汉合作之际，指导『国民党革命同志会』去欢迎汪精衛，这也是旧时取巧主义的机会主义的餘毒——国民党的『联段』『反奉』『联奉反吳』的策略，也是这样使他们党员取巧的而在奉段之下，得因捧奉段而偷生。我们在国民党时期不幸也染着这种陋習，而其餘波直到八七会议之後！第五问题是东南暴动的问题。叶贺南征期间，东的秋收暴动与两湖江西的不同。江西是向来农运較弱，而八一南昌暴动之後，党在一期散乱的状态之中。两湖是城市心新受武汉反动

势力的摧残，及党内机会主义政策影响最直接的地方，工人群众的行动被机会主义所麻痹得最利害的地方，武汉虽是在党内机会主义份子大批反动的状态之中，而两湖的秋收暴动，差不多纯全以工农自己的武装力量来战胜豪绅资产阶级。广东就不然。叶贺的南征，以汕头以广州为目的的夺取全省政权的目标最为切近。然而正因为南叶贺南征，使广东继承旧有的等待主义（抑置农民暴动的方法，很像湖南省委无潭东的会师主义——就是死板的预计军队攻守的地域与时间，以规定工农发动的程序。）同民党时期，各地总有些『等待北伐』『等待东征』的心理，去做工农群众中的工作。现在广东便是『等待胜利』。再则暴动政纲上拘泥的规定小地主减租至百分之三十，而农民暴动的指导，也差不多仅只是农军行动，与湖南的方向相同。

第六问题是『大暴动』的问题。——北方奉晋战争发生，北方局就立刻决定六省的『大暴动』（三特区，南口，京津，唐山，京东，）；一听到张作霖失败消息的传闻，立刻下令（十月十日！）叫天津唐山暴动起来；原定暴动计划纯粹是军事的，并准备天津伯不住退往热河与国外蒙联络，这当然不是发动群众的政策。这显然是国民党式的军力主义。而显明的目的，不是建立工农民众的政权，而是想造成第三个五卅似的，以『大暴动』来发展工农会与党的组织，及建立我们的军事势力和根据地。同时，五四暴动之中，第一次是见着群众而指导者先退。反去解散群众，第二次又转动军纪离开群众的来武装攻城。

八七会议之后的第一时期，可以说布尔塞维克主义的难产时期。机会主义的残毒余孽的缠缚着党。中央的临时政治局以极艰苦的力量，领导全党同志开始反机会主义的斗争。『国民党时期』的旧习惯旧方法，还很

久的力争他自己的存在权，上述的几个例子，不过是最显著的。其余陕西河南福建浙江云南江西安徽，差不多没有一省不过经这种斗争。党内方才开始断的萌芽新的布尔塞维克的精神。国民党式的"革命方法"军力主义，仁君主义，投机取巧的主义，表现在我党"党员的政治观念之中。机会主义不在于我党"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策，而在我党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性。国民党的真正右派，也只会主张以投机取巧的方法，仰仗军力来做仁君的革命。他们总标是的确要革命的。但是他们只会如此的革法。共产党要刷除这种机会主义的侵蚀，当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是要经过思想上政策上组织上长期的剧烈斗争的。自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国民党时期的遗产，在八七会议后，还很久的保存在偏僻的省份。例如国民党"部在同志指导之下的，还有安徽福建浙江云南等省，从八七会议之后直到现在，先后陆续的来"请示"是否还保存这些机关，以作"反色运动"之用呢？当然中央回复是不要保存，因为国民党的旗帜已经是白色恐怖的旗帜，即使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也已经不能在他的旗帜之下来反对他的中央和执政者了。那只是替他文饰一下，模糊民众的革命意识。现在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者也必须起来反对国民党，退出国民党，才有真正的革命意义。这是一种遗产。其次，便是国民党军队中还有共产党"员的军官或其他职员（政治部等），如河南陕西安徽以及云南，至今还有小小的力量保存。他们也是常"想着怎样偷生在里面：亦许可以利用自己的"地位"来慢"准备军力，或保护工农吧？中央亦指使他们采取果断的行动，指使当地党部充分的利用可能并以实行兵士运动，直到现在！直到一九二八年四月，国民党的遗产真是久远而经用呵。

然而国民党时期的遗产，并不是全是如此之坏的，

物，国民党時期的遺産之中，还直接包含着新時期的宝貝——苏维埃革命。在此苏维埃暴動只是最顯著的例子罷了。但是這还可以等一等再說。至於那些廢物呢？中央在八七会議時便已断然的拋棄。南昌暴動後，江西湖北許多左派領袖，以及中央的于右任，经亨頤等都紛紛宣告自己是沒有參加南昌暴動的"大大小小的"自己真正三民主义三大政策信徒"都避之恐不及，自告奮勇去打C.P.殺C.P.以表清白。我们的八七会議是錯了這一着。群众先我们而見青天白日的旗幟变成白色恐怖旗幟之下。国民党左派已经是绝無生存的餘地了。所以中央政治局会議，於九月十九日，便議決"暴動無論如何說不上再在国民党旗幟之下進行暴動"。国民党是已经死滅了，已经整个兒被豪紳資産階级霸佔去了。自然，零星散乱的一个兩个的"国民党左派"还是会有的。普通反对国民党的小資産階级的革命者，还是会有的。然而我党的責任，从此之後，便是舉起苏维埃的红旗為中国革命唯一旗幟。一切革命分子，不論是共産党与否，除非他不革命，否則都应当团結在苏维埃旗幟之下。

三，十一月中央擴大会議

葉賀失敗之後，中央即召集臨時政治局的擴大会議（十一月九日）因為白色恐怖的関係，没有可能召集五次大会的中央全体会議。擴大会後合八七会議後反机会主义的鬥爭。將上述許多問題加以確切的原則上的肯定，通过政治组織等问题的决議案。起草了土地问题的党的草案。以便第六次大会的討論决定。通过政治紀律案。明显的將机会主义的毒素指出来。擴大会議还有三項特别的新的决定：（一）一切政权归工農兵士貧民代表会議（苏维埃）的口号，成為暴動的主要口号。而且大城市中鬥爭劇烈時，即在工農兵等群众鬥爭的代表机関，就是组織苏维埃，以為暴動的指揮机関；（二）"没

收一切土地，由农民代表会议自己支配给贫农耕种』；乡村之中也实行苏维埃的口号，取消对小地主的策略口号，及一切政权归农民协会的口号。这在四省秋收暴动失败之后，直接响应武汉时代之『农民协会暴动』，经过转变而到新的阶段时是当然的，（三）组织问题上，有更明显确切的改造党的方针，——八七会议后的经验，证明各地党部都缺乏和群众的联结，（只有店东较好）组织上的机会主义，——非民权的集中制，工人车部的缺乏，和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份子的充满党部机关，实有坚决的大改造之必要。关于发动群众的策略，特别的指明。对于职工运动有特设的委员会討論，而决定新的决议案。指明八七会议之后，各地大致都有忽视职工运动的倾向，最重的指出反对反动工会及取得群众的任务，要从日常经济政治斗争引导工人群众到苏维埃暴动意义的認識，以及工会的武装準備等工作之重要。

八七会议时的职工运动议决案，各地很少实行，实际上反动派改组工会等的高压政策，和白色恐怖在群众之中引起极大的愤怒及自发的反抗。所以拆大会特别指出『工人自己选举工会，反对任何机关委派工会』的口号，指出失业工人运动的进行方法及其重要。拆大会议对於一般的政治任务，则主要的指出军阀混战，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能稳定。叶贺失败之後，中国革命不但不低落，而且正在高涨而进於新的阶段。拆大会议对於中国共产党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他继续八七会议，而成为布尔塞维克的党之创造机关。

八七会议後之第二期，要說是从十月十日到广州十二月暴动。叶贺失败是在十月初。这时候国民党的混战开始：正在十月初南京政府宣言继续北伐，北方有晋奉战争；叶贺失败，而张黄回粤，张黄和李黄的残兵来战粤，迫於眉睫；同时，唐生智仍着安徽，南京方面正在

开始反革的西征战争。中国共产党中央在辛亥革命纪念日就发布告民众书：提出反对军阀战争，反军阀战争为民众反军阀的战争」之口号。十月二十三日，即时宁汉战争开始，中央又发表反对军阀战争的宣言；对于农民来，便是直接指示：当地工农斗争勃兴，海陆丰已经暴动起来，潮汕亦是如此，省港罢工工人，海员工会，各地工代会的斗争都在发动，同时指出「双方削弱，应当确定的准备暴动而夺取全省政权。这时，党的政策是发动群众反对混战的南北军阀，以推翻反动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为目标（依各地情形而确定其切近的程度），尽量领导自发的斗争以取得群众，尤其是自发的农民暴动，至少可以以游击的战术扰动军阀的统治和军队，号召兵士到工农革命方面来。扩大会议上肯定这一政策，而加以明确的规定：（一）增加群众自发斗争的组织性，（二），联合散乱的农民暴动以成大规模的农民总暴动，（三），保证工农革命势力——城市与乡村联合。

中央的这个政策，二有点来的实行是切实的，且除九个「混战之中」当地党部都做出些错误来，反动派互斗和混战之中，工农应当来积起来征取革命的阵地。同时应当在他们斗争之中，更明显的指出苏维埃政权的目标，这是无疑义的。然而「征取革命的阵地」是怎样意义？可以是工人日常经济斗争政治的发动，可以是农抗税抗租的斗争，可以是工农与兵士群众联络，可以夺取反动派武装，扰乱一方对军阀的后防（失败主义），可以是发动群众的游击战争，可以是乡村的农民割据，可以是一县或几县的农民割据，可以是推翻当地军阀而争取省政权的总暴动，程度是有不同。总暴动的意义，是暴动的大城市成为农民暴动的中心和指导者。而大城市中的暴动必须是具有一定的条件，方能发动。「暴动是玩不得

A404

的"。這些暴動條件特別在擴大会議中定出。再則国民党時期，共產党是和国民党合作，那時的革命，客观上是国民党軍隊与反動軍隊战爭的事实。然而這些事实之中，过去我党運用這種特殊的利用敵人内部衝突的策畧，是机会主义化了；或国民党化了。中央在擴大会議之前，因此特別决定葉賀軍中的"革命委員会"取消，以後無論任何暴動，不要先立一个什么孫大元帥府似的机関，絶对不用此法去做那種勾结軍官土匪頭兒的勾当，而要發動群众暴動。這问題似乎不成问題了。然而还可以發生一个问題：是否每次軍阀混战之时可以举行"羣衆的"总暴動呢？对於這一問題的答案，有許多同志是偏向於"是的"。這表面上是很左的，而实际上是变相的国民党式的答案。於是不管暴動的条件如何，不管党的主观力量如何，不管群众的情形是如何，想单靠"党人"的軍事陰謀来暴動，要过早的暴動，玩弄暴動。成天的想分析軍阀某派和某派如何衝突，所謂"鄂軍"的支章，要求所謂"政治消息"是等一等的问題，這是一種。要求"只要给槍械来"，用不着做什么日常斗爭，"暴動便已经实"在"的到来了"，這又是一種。

因此，在八月会議之後，除旧有的那些机会主义餘毒还時"发見外，到了這第二期，便又發生了新的危險傾向——盲動主义。第一，是上海暴動问題。十一月初江苏宜興無錫的農民都相继暴動起来，当地指導者也犯着那些机会主义的傾向——"農軍"的軍力主义。同時却起来了上海暴動问題，以上海响应無錫的傾向在省委中発現出来，省委也認為"暴動实"在"已经到来了"於是発動上海群众暴動的特别方法就来了：先用九个武裝的紅色恐怖隊去一敲一敲的威嚇工人罷工，等到如此弄成总罷工，暴動就可以起来而成功！第二是湖北问題，上海问題是在寧漢战爭之中，湖北问題也是在寧漢战爭

之中。当然，拿着军阀的部衝突，希冀他的崩溃，我们自己趁火打劫"是不对的，因为这是不以群众为主体的。然而对于政治分析的本领差了些，着着唐生智在那时还有几月寿命，也就錯了。长江局当时在鄂，便做了这一錯，把又觉得收收暴動失敗以後，唐生智不会就倒，於是下一句断語說："目前绝非总退却的暴動的時期"。这当然又是一錯。当然当時湖北省委的政見和工作，時而立即暴動，下令总罷工而罷不成。時而绝非总暴動時期"，甚至有人說革命潮流从此低落了，更是錯誤。但是反机会主义的斗爭是在进行着，"机会主义"成为時髦名詞。当時有人主張武漢那時立即暴動，"即使组織一兩天苏維埃也是好的——就称暴動没有相当勝利的希望"。於是這種主張的党員，（大半是C.Y.湖北省委）便說長江局和湖北省委是机会主义的。湖北省委正因为"避机会主义之嫌"，所以下总同盟罷工令，下暴動令。实际上群众情形是还不能暴動唐生智下野時，武

許多党員在這"假暴動"之下露出臨陣脫逃的也有，慌張失措的也有，這都是机会主义的暴露。但是並不因此而"暴動命令"就不是盲動主义的。至於奉軍与閻錫山战爭中的北方局的盲動主义和机会主义，上面已經說过了。

总之，八七之後，党是在生長到布尔塞維克的道路上去。這个生長是自然非常痛苦的。他淘汰軟弱動摇的份子，鍛鍊堅强的份子。由朗克主义、机会主义的另一方面，也在反抗机会主义斗爭之中暴露出来，党更加要有無產階级的革命主义，更堅强的集中力量，来战勝一般的机会主义。

（四）廣州十二月暴動

一九二七年的中国，經过兩次無產階级英勇的暴動：一是四月的上海暴動，一是十二月的廣州暴動。上海暴

動还在国民党的時期，而且在党内机会主义将近崩溃的時期；他一方面暴露出旧的机会主义的根源，别方面产出机会主义斗爭的萌芽。十二月的庐州暴動，却開始了中国革命新階段——苏维埃革命的階段，他正在反机会主义斗爭已经有了穩定的陣脚的時候。庐州暴動是十一月拡大会議决議精神的直接表現。他已经是脫离机会主义的第一次中国共産党之偉大的斗爭。中央在拡大会议之後几天便由庐東西書記太雷同志討論這一问题，决定庐東总暴動的計劃（十一月十七日）。果然，庐東的張黨改変後，庐東的政治情形是一天天的接近暴動，庐州工人群众的斗爭情緒達到最高度。而庐州暴動便在十二月十一日爆發了。関於庐州暴動，中央有一議决案，指出党的一般任務。

從庐州暴動失敗起，可以标是党在八七会议之後進到了第三期。這一期的特性，在於：一方面中国革命最終过渡到苏维埃革命的段階，别方面，党開始实現改造的現实。对於中国革命的新階段，党発表宣言宣佈国民党是中国民众的敵人，並要决定領導革命的計劃，所以中央决議各省工作方針。——庐州暴動决議案更顯明的確定党的任務，関於農民苏维埃的更有新决定，農民暴動之中就組織農民代表会议（苏维埃）而暴動指導机関隨後中央更陸續有对於苏维埃組織方法及土地问题的更進一步更詳細規定，以指導各地。這是因為当時不但海陸丰，而且有西江萬安，庐東的崖，北江，南路，以及湖南醴陵，湖北黄安等処農民割拠的形成。这各省工作方針的决議》（一九二八年一月），便是綜観此全国的革命高漲之特殊形勢：一省或几省或爭取政权之可能，而規定全党的工作方針。同時，庐州暴動期间正是盲動主义底没的表現於許多省内的時候，即便不是盲動主义，也有一般的感覚着党内总左傾》空氣很高的形勢（如

湖南长沙十二月十日暴动，河南郑州C.Y.的计划，江西C.Y.之总暴动计画的学说，浙江奉化的《暴动》等），至今还可以提到这类的省委报告和暴动计划（如满洲）：《客观条件完全不成问题，只缺主观的力量》当时邦省也"定暴动期"这前四《剧分暴动区》。这是党改造后新气象，虽然是不正确的倾向。所以各省工作方针决议》特别指明这一点，指出一方面要继续更严厉扫除机会主义的余毒，别方面也要更加了解广州暴动后党的严重使命："当着阶级的一般的削弱而工农革命潮流的深入和普遍情形之下……要认真的建立党的群众基础，认真的去领导群众日常的斗争，发动领导汇合群众的斗争，增高并确定其革命意识，更创造革命的高潮，造成群众力争政权的决心，而勇敢的领导他们到决定胜负暴动之发动。如果《只凭少数共产主义者的勇敢，施行个人的暗杀，或是向群众脱离的游击式的杀人放火，或不向直接暴动的形势与条件具备与否，举行《号召立刻在大城市中暴动起来，轻易脱离群众实行少数党员的暴动，如此不顾群众不要群众的倾向——就是盲动主义。这种玩弄暴动的盲动主义……亦是对于革命的罪恶》。（中央为此特别发出"论武装暴动"的通告。）

但是，广州暴动之后，一则反动派觉着自己的生死关头日益接近，他们在广州大施屠杀，在湖南湖北的党部也遭着极大的破坏，省委全体被捕两次以上，其他各省四到处破坏（将来，江苏省委也被破坏一部分），党的工作受着影响，二则改造过程中旧的工作方法束缚着党，有些党部（如上海）日益与群众的需要不能适应，于是，产生《没有出路》的感觉，而倾向于革命低落的观念。灰心失望烦闷的状态，对于艰苦而猛烈的斗争中，受不起锻炼的人，是无足怪的。谭平山恰好在这时候登场。说党的政策超过时代，列举说：《马克思主义者

绝是最後一个放下直接革命斗争方法，——直到用完了一切可能，方才放下这些斗争方法，直到没有点绿毫比较速成的希望的影子。直到号召群众罢工暴动等的方法明白的是失了基础，然後再肯放下这些方法。所以对於那些无数的革命叛徒，他们是在叫着：我们比你们为进步些，我们比你们早放弃革命些，——对於这些人，马克思主义只有加以白眼。

中国革命在京州暴动後，革命高涨的形势是很明显的。中央所以决定工作方针指出各区域的革命形势，无非是在东及湘鄂赣豫南两区，豪绅统治确在动摇而动摇，应当肯定夺取为政权的目标。广东是要求北伐路农民暴动进而夺取城市区域。湘鄂赣是要以湘南湘东两区农民暴动的联络为布置暴动的中心。这些计划是各省工作方针议决案所规定的，並且再四说明城市工人中日常斗争的重要。这时候，一般的反帝国主义运动（福州厦门新大陆案等）不久也便稍稍的昂起头来，连小资产阶级都日益表示不满於国民党的卖国统治。同时证明能把守各省工商业中心大城市的反动势力，将完全的困敝之网。——白色恐怖极残酷的施行，反共的雷厉风行不可一世。争城市的斗争，对於无产阶级政党更是重要起来，革命潮势虽然屈折，胜负更迭的在海陆丰之失守方兴之未艾表现出来。然而总的趋势始终是高涨的，是上升的。因此，中央有第三十次号通告的决定，尤其是对於兵士运动，不厌重复的再指出一次。这是京州暴动後更应特殊注意的任务。

京州暴动之後，到现在，党内生活之中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改造党的成绩，在重要的区域来说。上海经过很久很久的停滞，徘徊四面新的工作方法之间，直到现在才开始有新的气象和改进的工作。湖北湖南，却好是在大会议以後，就是中央决定实行改造党之後，连续

不断的遗着极严重的摧残。（武汉在破获前党的工会已有相当成绩）。此外，第一问题，就是顺直问题。顺直和山东都已经初步的改组造。工人同志已经有许多实行党的指导工作。新的精神开始走到群众中去。以前因为机会主义而丧失的党的信仰，渐渐恢复起来，这是很好的现象。但是同时也发生两的倾向。顺直的改组会议，因为指导不当，虽然对顺直的党有极大的意义，可是发见许多不好的倾向：（一）对农民斗争不指出武装斗争，要从游击的群众斗争进于革命区域之创立，而进取城市，却想发动势力不敢入乡村之际，实行乡村中的借贷合作社等的建设政策，——所谓"共产主义"，（二），对于北方自发的原始农民暴动，反抗捐税的一般的农民斗争，（如天门等）只能指出他的有被豪绅领导的危险，而想用土地问题去和他们对立，以阶级斗争与农民斗争相对抗，这标是争领导权；（三），党的组织上因为反对组织上的旧机会主义，又走到一个极端，说下级群众所不满的策略，就要定要修正，斗争完全反对集中主义，而要实行联络主义，或者是跟着群众跑的尾巴主义。顺直改组的过程中，曾经有党部要求党的代表大会（全省的）农民同志可以五十人选一代表，工人则须一百人方能选一代表。再则，顺直改组中揭发许多旧时机会主义的缺点，工人群众的不满等。使党有纠正的可能，这是很好的。例如工人同志不满群众意于募责机关的浪费，被难同志救济的不到，也是一例。然而同时也发见：同志们都认为是政府，向党要求保障并救济失业，否则便是"党叫我们罢工失了业你们也不管，下了狱你们又不管，这是党害了工人"。或者是：同志要求大家事事如何以负责人还比工人住得好穿得好。（湖北及其他党部也都发生这类问题）这些倾向当然是非无产阶级的。或者以为群众是群众自动的要求方是革命的，凡是上级机关命

为做甚么或不做什么，都是《反民权主义》——是机会主义了。列宁曾经说：《那些武断派要想激起》群众《对付领袖》，激起群众之种种恶意的虚荣的本能，要想如此来破坏工人运动内部的团结和稳定，用挑拨群众的方法，破坏领导机关之信仰》……现在这种时期（一九〇二年的俄国），俄国社会民主运动（共产主义）的整个危机，正因为自发的觉悟的群众没有能力充足经验富有的指导者，而那些大好老却像煞有介事的说：《运动不是从下面发动，不好呵！》其二是广东问题。广东省委，在广州暴动之后，开了一个会议，更比有直接的更正确的开始改造省委及各县《委。这是党中以来最有成绩的地方。广州暴动之前，广东党部已经是全国之冠。这当然是比较的，自然还有很大的缺点。广州暴动之后，广东工人阶级经此失败，自然更进一步的要求指导机关的改良。这是非常之有意义的，但是广东这次省委的会议，也有些重大的缺憾：（一）对于广州暴动的估量，完全不提及失败的客观原因，完全将失败责任归之于指导机关。甚至说白色恐怖下死的几千人，是省委间接害杀的，说广州暴动完全是军事投机，而抹杀了广州暴动的重大意义。这在客观上：就不是号召群众继续广州暴动的英勇斗争，向在迫工农的反动恐怖奋斗，却是替李济琛辩护他的屠杀——仿佛完全是共产党指导不好，将工人去送死。中央的决议案是指明主观上发动群众尚未充分，然而广州暴动的失败是有客观上的原因。绝非军事投机，亦不是军事投机的方法。（至于中央议决案中也确有些事实不尽符合，或者有规画而未做到的，亦即修改。失败退却时，指导机关办理不周，无有计划的提议，而未能《很有组织的退却）。（二），广东改造党的方针，最初几乎成了《凡有智识分子的党部机关，必是机会主义的，凡没有智识分子的党部机关，便必定不是机会主

义的"。這当然不对的：廣東省委不久便能遵照中央指導糾正這些缺点。順直也是如此。

大致而論，党的改造工作，已经推動了，而全党的成績还沒有多少。布尔塞維克主义正是难産呵。

一般的来說，反机会主义的鬥爭是異常之艱巨的，資産階级的各種傾向，都是党的魔障。旧的去了，新的又会發生。從這一極端可以走到那一極端，現在还存在的種々不好的傾向，应当指出来。

從前的机会主义是忽視農民，現在又有忽視工人運動的傾向。从前可以專注意重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鬥爭，後来又可以有民族鬥爭現在已经无工農無産的傾向。從前專注重於英協联絡的取巧主义，現在可以極避疑的不肯去運用工人中的統一战線，对于一切派别的，甚至普通党外群众，都不肯去接近的宗派主义的傾向。从前初譜暴動，有国民党式的軍力主义及投机主义（联絡土匪等），現在可以有定須統率群众做起方标榜動群众的統率主义或是連自發的原始農民暴動也不去联合而求取得領導的独斷主义。從前是不領導群众，現在可以專受群众領導——跟着群众屁已跑。從前是極端的中央集权，現在可以是極端的民权主义。可是這並不是說前者完全消滅，而只有後者形成有系統的傾向。並不如此，而是後来的發展出来，旧有的还有許多保存着。机会主义本是有兩个輪子呵。不过上述這些傾向事实上还沒有甚么大的表現，和革命低落說一樣，只是在萌芽狀態，或者已在漸演过程之中。

但是有几種傾向是很重要的问題。一，从前是說忽視土地，現在，已经說到沒收一切土地了，甚至分配土地給貧民了，那么亦許从前是民权革命，現在已经社会革命了。平均地权的平産主义，还不是社会主义的運動么？——許多同志這樣自己向自己。着着農民的土地

革命本身是社会主义运动，而不明白他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性质，这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者"最会"左倾"而忽视自耕农抗捐抗税的民权两举二，当农大会议时，就有人提议：农民可以分到土地了，工人只得八小时工作制是不够的，不能引起他们暴动的热心的，最好说：洋车夫没收洋车，工人店员没收工厂商店，各人有所得才好。广东省第一次省委农大会时，亦有许多人提议：没收一切资本家的钱财。这样想法其实不是社会主义。这个出发点是：农民得田地可以成小资产阶级，工人也应当分得些钱财，成为小有产者。这亦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三，各处的农民运动杀戮豪绅之外，必须"加以烧屋的工作，有些地方，如湖北汉川农民运动的指导者，要烧去整个兄的城市，湖北许多整个兄的村庄都烧盖，湖南某地指导者，主张烧尖恩城，只取出暴动农民所需要的东西（如油印机等），主张杀一切人，除去跟着来革命的（江苏省委的"暴动须知"也说："必须挨家按户告以暴动口号，号召……起来参加，不来者以反革命论律制裁"——我，这标是发动群）。关于这点中央对于海陆丰等处及各处都曾指正过（海丰限定陆丰每村必须杀若干人——是人就够了，更不问反动与否）。这种倾向，和农民初起暴动时，提着豪绅杀不手下，是同样的小资产阶级倾向。这杀人放火的倾向，何等的有"破坏精神"，真是"破坏式的精神"呵！甚至广东工人也在省委会议时说："为什么暴动失败时，我们没有决定将广东烧尽他，使李济深得个空城。"这不是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是农民领导无产阶级了。以前是小资产阶级的仁慈主义，现在又可以是农民原始暴动的烧杀主义。四，从前各地工农运动，往往只有党员个人领袖的英雄主义，没有党团的作用。现在"党权运动"高涨，变成了党的政权，而不是苏维埃政权。

陆丰尚且是如此。暴动胜利之後，仍旧不是群众政权。党部完全代替苏维埃，没有无党群众的庶大参加政权。这是新国民党的遗产呵。农民群众的尾巴主义之下，甚至可以产生共产党的"军权主义"：一例如醴陵农军的军官竟会作威作福，"有枪把子在手，便有政权"了。凡此一切，都是新的危险倾向：农民式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只靠党不要群众的白朗吉主义（Blanquism）

A404

廣大的小資產階級国家之中，中国幼稚的無產階級政党，已經々过好幾年的机会主义的侵蝕。如今，他經过最可耻的失敗之後，在堅决的鬥爭之中產生自己布尔塞維克主义。他还只是開步走，还要經过很苦的鬥爭，不斷的鬥爭，極長期的鬥爭。他在国际無產階級指導之下，始終已經成為世界革命的隊伍。党的前途，党的改造已經放出光明之路。他必定能战勝這些小資產階級的潮流，而領導革命到最終的勝利。

党以前的机会主义的結果：是四月十五之後，各地群衆在艱苦鬥爭之中对党失望而離開。尤其是湘鄂贛的民衆運動經过一期的涣散狀態，小資產階級之中共產党的影响甚至完全消失。如今，自從党改正路綫而独立的勇猛鬥爭之後，党在群衆工農之中，威信一天天的擴大。但是在組織上方法上舊的机会主义还是存在着。最主要的就是：一切工会運動等々從前只有机関，從党部机関派人去當工会委員長等々办法，党也是自上而下的建築。於是工人群衆依賴党，着着党是工人階級之外的英雄好漢，可以救他们的，可以用不着他们自己鬥爭的。這尤其在上海的積習最深。上海工人，自從蔣介石反動之後，希望党而党再也沒有政治力量可援引了，再也不能在群衆鬥爭之外来帮助工人了。於是工人又只想望党派『紅色恐怖隊』替他们打工賊走狗。這種情形，很久的障碍着群衆工会的形成，因為工人对工会的関係也是如此的，工総也不是工人自己的。這種工作方法必須改变，党和工会必須是有切实的群衆基礎。其他反帝運動，兵士運動等也都要换新的方法。這種工作已經開始在各地做起来。改造党的任務是必須要执行，不但是思想上政策上布尔塞維克化，在組織上方法上也要如此。

中国共產党的过去是如此的艰苦困难，收拾着小資產階級中最革命的份子和群衆的工人運動而造成。他的

机会主义，是集体的無意之中的。八七会议到如今，反机会主义斗爭沒有遇見任何一次公開的理論的有系統的反抗，便是明証。今後的反机会主义斗爭，更加有光明的道路。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将要更加偉大了。

Ⅲ 中國革命當前的問題

（一）誰得着革命領導權？

列寧說：『革命的群衆斗爭教会了無產階級。革命証明了：只有他（革命）能夠引導農民群衆起来为爭民權（Демократия）。革命将執粹無產階級的政党團結得更加緊，将其中的小資產階級份子剔除出去。又革命更教訓了小資產階級民權派，他們知道到自由派主义（Либерализм）中去尋找自己的領袖和同盟者之企圖都是枉然的，——自由派的怕群衆斗爭，比怕沙皇还利害。我們，依据這些時句中的教訓，可以勇敢的向民賊的地主政府說：你們這些新託洛茨基分子，你們管繼續着様這做去罢！你們播的種，我們来收獲！（列寧全集卷八。革命與反革命』）。

中国革命（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过程亦是如此的教会了無產階級。革命自己創造他的領導者和前途。中国革命歷次所遭的失敗，並不是因為『走得太遠了』，並不是『群衆过於左傾了』，而是因為走得太不遠，而是因為領導机関右傾了。蔣介石的反動是中国革命部份的失敗，武漢的反動自然更是革命一次失敗。但是，這些失敗是否由於共產党过於『左傾』呢？當然不是的。老賊吳稚暉在一九二七年的三月初便驚告着共產党：如果共產党被人着作贅疣竟然排出，乃一定是時世不到，急色兒要勉强猛進，欲速則不達，反添了進步的曲折』。是的，国民党在上海还沒打下時，已在準備着殺人。然而他（吳稚暉）那時还辦白張継不会教唆李宝章

杖工人，他自己还『忽然作色』的说着：『大约李把工人当共产党杀了，想做投降的条件么？』他的忽然作色，现在看来，並不是象忽军阀杀人，而是象忽着：『这些人是要等我们国民党来杀的，李宝章如何能抢着杀了』。国民党领袖的如何阴险诡诈残酷的说计多端没有政治道德……都在吴稚晖这几句话裏表现出，而他们现在还着嚷：列寧党是如何阴谋党，是如何『只有策略没有主义』。是的，国民党的文革命，是以共产党『超过时代』『时世不到』『急色兒欲速则不達』的名义来屠杀工農民衆與共产党的。然而实际上中国革命歷次失敗，中国共产的被屠杀，正是因為落後了，不能適應时世的激進，拒絕領導革命的前進。

中国共产党过去机会主义策略的結果，是在没有独立的政策去领導五派，去领導小資产階級，甚至阻止農民的猛進，甚至和殘無产階級的階級鬥爭。當初反帝国主义運動中对於廣大的小資产階級群衆指導的作用，當初中国共产党在一般社会中鉅大的影响，在蔣介石反動時期逐漸的喪失。上海暴動期間（一九二七年初）與省港罷工期間（直到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在滬粵的影响是如何的大。甚至廣東資本家（簡琴石等）請共产党領導他们起来反对蔣介石的横征暴斂；甚至老賊吴稚晖只敢油腔滑調的說：『共产主义……並不是一二暴徒好立新奇名目，也是時世所需要的』（引吴稚晖的話，都見一九二七年国民党上海省市党部的『總理逝世二週紀念册』）。然而，四月的滬粵反動後，上海工人及廣東工農群衆的鬥爭只是自發的艱苦的鬥爭，他们找不着自己的領導。廣東海陸豐東江農民苦鬥支持兩個多月。然而中国共产党是在想着：或者武漢的東征或南伐能够救滬粵的工農罷？沒有號召工農自己的鬥爭，沒有切实勇敢的指導武漢之下的工農鬥爭和土地革命，更是遭

着同樣的命運。他們的領導机関甚至和小資產階級頑神异口同声的說：『幼稚』或『过火』。北方的工農自然也是只接到『靜候北伐到来再動』的指示。一九二七年三月革命的形勢中，中国共產党机会主义政策，也是一個很大動力——阻滞革命前進的動力。這是不能沒有他自己的結果的。結果是中国共產党與革命群衆日益離開，而革命群衆失去領導。一時的散乱現象，在工農勢力之中，便不能不成為革命暫時挫折的原因。

武漢反動之际，中国民族資產階級便利用無產階級政党的猶豫動搖，而取得对於小資產階級的領導。同時，中国無產階級又自己拋棄对於对農民的領導，甚至工人自己的隊伍，也喪失領導。然而，是否民族資產階級取得了革命領導權呢？可憐！民族資產階級取得『領導权』，只是完全成反革命事業。他的使命就在於此了無產階級始終奮起鬥爭，改造自己的領導机関，開始堅决的領導農民的土地革命，在散乱隊伍之中整頓自己的力量，重新取進攻的陣勢反抗豪紳資產階級嚴重的压迫，如此去征取中国革命的領導权。——這是在武漢反動之後，從南昌暴動以及不斷的工農鬥爭，鄉村暴動，經过廣州工農兵暴動直到現在的形勢。

武漢反動之後，革命勢力的進長有自己的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反攻之中整頓革命隊伍的時期，第二個時期是無產階級開始領導革命農民進攻的時期，第三個時期是革命與反革命進於長期激戰的時期，而革命勢力的進取雖然是極曲折極艱苦的勝敗更迭的然而却是自信的穩定的準准的。第一個時期，可以說是從南昌暴動到葉賀失敗，第二時期是廣州十二月暴動，第三時期是廣州暴動之後。

第一個時期的特点是：他繼承着武漢時期的革命勢力動搖猶豫與反革命勢力顯然進攻的形勢，自己也還帶

著許多不自信的嘗試的性質。當南昌暴動發動到葉賀失敗之間，工農自己已經見看新的領導旗幟，他們『試一試』反攻，但是他們在以前的苦無經驗之後，不能立刻充分的依賴這個新的領導旗幟。那時，湖北鄂南等處亦暴動起來，湖南華醴，平，浏一帶暴動起來，廣東的海陸豐紫金一帶又重新暴動起來，瓊崖也是如此，這都在八九月間；江西鄱陽星子等處後也有農民鬥爭的爆發，這一浪潮傳播到十月中直隸的王田暴動，以至山東的陽穀暴動，十一月初江蘇的宜興，無錫，江陰以至崇明的農民鬥爭和暴動，河南四方山等處也有農民的暴動。這些暴動大半是共產党直接領導，也有許多是零星的自發的。這一時期的革命旗幟，客觀上还是国民党左派的旗幟：葉賀舉兵是直接繼承武漢的国民党，起来反抗汪精衛等的反動中央。那時反動的武漢，正是急呼抗制工農的反攻，假意在分共之後立刻頒佈減租二五的命令；江浙国民党反動政府，也在高談『減租』和『業佃仲裁』。豪紳資產階級學着帝国主义的策略，想用口頭應允的改良政策『安定』農村，使農民不信無產階級的領導。但是，農民的大多數既然不信豪紳資產階級口頭的應允，同時也还不大信那些少數農民在共產党領導之下的抗租稅的暴動方法；他們是在動搖畏縮，不信任曾經背叛他們領導現在能夠成事，不信任革命的勝利。例如湖南農民在实行減租的時候，將所減『二五』之數，另外存在倉廩中，以備更反動的形勢来到，还是不得不交出去。甚至於廣東海陸丰農民，在十月間開始暴動的口号，就是『燒燬田契，搥坏田塹』；這是說：以備反動勢力重来，使他們难於恢復舊的剝削工具。然而無產階級是勇猛的領導革命的前進，在反攻的鬥爭过程中改造自己領導机関，雖然是慢慢的遲緩的學着更正確鬥爭的方法，但是，他是確定的往前進。同時，豪紳資產階級口頭

應允的改良政策根本上不能实現。農民暴動的爆發在這時期漸々擴大普遍，——葉賀的失敗，只是国民党左派旗幟最終取消，只是使階級鬥爭與階級分化更加激劇，一切小資產階級革命家（如鄧演達之類）的騎牆與無力的最終暴露，而不是革命之决定，勝負的失敗，——農民終久是到無產階級領導之下来。

五卅的反帝高潮使西山会議派的『革命党』，認為中国革命『超过時代；一三運動至上海暴動，使蔣介石戴季陶最終認着這個『真理』；両湖工農群衆的民权独裁『與土地革命，使汪精衛等認得這一『真理』；葉賀失敗至廣州暴動使鄧演達譚平山也認得了！

第二時期便緊接這種反攻形勢而進於進攻的時期。無產階級政党僅々有好的土地政綱，僅々实际派遣党員去農村指導暴動，都还不夠。無產階級自己鼓動鬥爭，以行動去領導農民的土地革命之廣州暴動，才開始了中国革命的新時期。無產階級以自己的行動取得革命的領導权。葉賀失敗至廣州暴動期間，農民暴動的性質，明顯的進於自信的進攻的形勢。中国革命是在進於蘇維埃革命的階段。十月至十二月期間，城市無產階級走出夏天散乱與幻想（加入工統会）的狀態之後，開始新的鬥爭，漸々的進於独立的階級陣地。這種过程也和農民鬥爭一樣，依地域及其特殊環境與習性而不同。北方天津等處及鉄路工人，則在経过無產階級政党初步改組的時期，已経是在沉寂大半年之後，開始尽量的経済鬥爭。上海工人群衆之中，方才開始從反对工統会而進於反对国民党的鬥爭，同時罷工鬥爭及勞資糾紛繼續不断的發生，国民党都不得不屢々討論什么劳動法，工会条例及劳資仲裁制度等问題。上海工人之中顯然有從個人暗殺政策，進於群衆的恐怖政策之進程。這雖然还不是武裝暴動的群衆要求，但是確是武裝方式鬥爭之要求的表現。

部分的勇敢的工人之傾向直動主义，在一般廣大群衆还沒有認識奪取政权之决心的時候，固然有引導到过早暴動的危險。然而工人鬥爭的急迫和新的階級覺悟的生長，是無疑的。武裝工人在這時候更加有群衆鬥爭的號動（如武昌的紗廠工人）而且在武汉经济十分恐慌失業衆多的经境之中，鬥爭更形劇烈，在国民党联合战線時期之後，階級意識的生長更加明顯。部分勇敢的工人之武裝鬥爭的要求也更加利害。長沙等處較小的城市，工人之中也在醞釀着武裝鬥爭的情緒。尤其是廣州的工人，直接於葉賀潮汕失敗之後，十月十四日黃卅工人和海員，就因為反对工賊開除工人而進於政治的示威，他们叫出"青天白日是白色恐怖的旗幟，鐮刀斧頭的紅色旗方是革命的旗幟"之呼声。黃卅的罢工鬥爭極利害的發動起来，波及各種重要的戰業工人；甚至然於在反動派影响之机器工人，也自動的違反他们領袖意旨的提出沒收机器廠改為工人合作社的要求。一般工人群衆日益堅决的認識自己起来奪取政权的必要。那時，農民鬥爭的號動，更加開展起来。江浙的農民都繼續抗租游擊的鬥爭。江西泰和萬安寧崗等處的農民，湖北的黃安等處，湖南的醴陵茶陵及湘南……則更進而割據鄉村。尤其是廣東，瓊崖已經有五縣在農民之手，海陸丰農民在十一月初佔領縣城，其他各縣不断的有農民暴動自發的起来。總之，這時候農民自發的各種鬥爭，以及游擊的武裝鬥爭，大致都有進於所謂"農民割拠"的趨勢。再則葉賀残部與農民混合，在海陸豐，在湖粤边境（朱德部）；武漢時期的湖南的工人自衛隊（安源）及農民自衛隊（毛澤東）在秋收暴動失敗之後，蔓延於湖贛边境；如醴陵則農民暴動之中創造出自己的武裝。廣州工人則其海陸丰等处一樣，不但有暴動之中自己創造出來的武裝組織（廣州工人赤衛隊），而且有国民党時期之遺

產共產党在軍隊中的影响（張發奎部的教導團等）。這種形勢之中，很明顯的：不論是工人農民階級鬥爭的激烈程度，不論是軍隊中革命影响，越是在国民党時期聯合，战線運用得較廣及較正確的地方，便越有力量。於是中国第一次的『赤色暴動』——工農兵士群衆的暴動，便暴發於廣州——国民党的發祥地。革命勢力由進攻而進於勝利，由海陸丰等處外縣的割據，而進於奪得省城。無產階級的廣州暴動，工人階級領導下的廣州暴動，建立起中国第一次的蘇維埃政府。工人群衆極烈的參加，甚至事後許多在国民党影响之下的工人（甘乃光派所謂『革命工人联合会』）都抱怨『共產党為什麼不早些通知他们暴動的日期』，甚至机器工会之下的工人，事後都說『共產党要的是工農政府並不是党政府，——像如今抑制我们的要求的国民党政府，——我们何必反对苏維埃』。廣州暴動中工人群衆的英勇鬥爭，失敗時鬥爭到最後一滴血，真正是亞洲工人階級第一次空前的鬥爭。他们証明：只有工人自己能爭得解放，並且証明：只有苏維埃政府，只有工人階級領導下的政府能夠給農民以土地，能夠給一般貧民兵士以生路。廣州暴動是失敗了；雖然受帝国主义軍閥豪紳資產階級联合反動的武裝勢力所摧殘，雖然發動全省以至廣州的群衆尚未充分，雖然無產階級一般領導貧民及兵士的力量还不夠，雖然因此種種而失敗了。但是無產階級用自己真实的行動集事实給全国農民，尤其是廣東農民看：土地革命要如此方能得到勝利，貧民兵士群衆要如此奮鬥方能得到自己的解放。廣州暴動使無產階級得到自己对於農民及兵士的領導。一般民衆在買辦豪紳資產階級压迫之下，在国民党反動之下，到此才看見自己唯一的出路。

第三時期，便是廣州暴動之後的長期激战的時期。

廣州暴動的時候，長沙有四郊農民的鬥爭以至暴動而來成的十二月十一日的暴動。其他各地的工農也在艱苦的鬥爭之中，無產階級開始領導農民的暴動，对於豪紳資產階級已經進於危險的時期。豪紳資產階級一面自己內部衝突正在繼續發展，一面受着工農勢力的打擊，他們以至世界帝国主义者，都驚慌到萬分。他們就狂似的向攻革命勢力。自然，首先受着打擊的是領導革命的無產階級，一則豪紳資產階級要維持他們僅有的真正权力於城市之中，二則無產階級經过將近一年的艱苦萬分的惡战，又受着廣州反動派空前的大屠殺（反動派於三天之內殺戮廣州工人至五千七百餘人）；上海與武汉都有資本的总攻進攻，取消「共產時代」的劳資条件等々，南京政府與苏联絕交。然而，廣州的工人，經过如此之大的摧殘之後，不久就又開始零碎的經济罷工；上海（在一九二七年底店員和工人反抗資本進攻的鬥爭，他在極嚴重的压迫之下進行）武漢和長沙受着巨大的白色恐怖，還是舊起鬥爭（如武汉各紗厰）。廣州暴動的影响，对於全国無產階級亦非常偉大，離廣州遠的北方工人都說：「這樣才幹得痛快」；上海工人說：「只怕我们的力量不够」。中国革命到此便不但進「蘇維埃階段」，並且是已經進到了「蘇維埃的階段」。蘇維埃的紅旗成了全国工農兵士群衆反抗的旗號。農民鬥爭的發展更加深入和擴大了。北方在天津鄭州等處工人階級的鬥爭更進一步的調動群衆（鉄路紗厰等的經济鬥爭新々發動）之中，紅槍会天門会等原始的農民暴動不但日益蔓延，並且漸々開始分化，開始有進一步的階級意識。如河南紅槍会分化出光蚕会，贊助共產党的農民暴動。四川的「神兵」分化為赤化派非赤化派。如直隸某縣（清遠？）農民成千成萬的到縣城示威反抗捐税等事，差不多各省都有，甚至奉化通化的大刀会举事攻下縣城，也打起紅旗。

山東在去年还有天門会領導的農民鬥爭特别表於聲明『不抗正稅』等的現象，而現在，開始分化了一群衆反对不澈底的領袖了。江蘇淮安，楓涇。青浦，黃渡等處繼續着發生無数的農民騷動；江陰無錫一帶要是深入，有些鄉村到最近形成割據局面。當時尤其進一步發展的，如江西萬安成立蘇維埃，湖北黃安成立『農民政府』——其餘汉川沔陽一帶游擊战爭盛行起来。湖南南境，到所謂西征軍入湘唐系軍閥倒台的時候，湘南有二十九縣在農民暴動勢力之下，尤其是醴陵以下，湘贛边境。廣東則海陸丰蘇維埃政府已經成立四個月，漸次往外發展，瓊崖的農民勢力也在發展起来。北江方面仁化韶昌，有新的農民暴動起来，也成立蘇維埃政府，南路農民也在暴動。這期的鬥爭表現革命勢力與反革命勢力互爭城市的鬥爭趋勢：例如海陸丰的外縣蘇維埃，以反革命勢力在廣州压倒暴動之後！更加覚着農民暴動的發展，如果不能進而取得經濟生活中心的大城市，那就不但不能完成革命的勝利，並且不能保障革命已得的战利品——土地。同樣，反動勢力在許多鄉村之中被打擊而不能鞏固其統治，那就僅々保持的城市中的政权始終也要不能保持。所以反動勢力急劇的發狂似的在城市之中施行白色恐怖進而想『清鄉』。廣東兩湖江西都在如此狀況之中；豪紳資產階級的統治十分的不穩定，他們困獸之鬥的要剿清共匪，他們自己覚得不穩了。因然，在這期間，海陸丰的縣城被軍閥取去江西万安也失守北江的蘇維埃被敵摧殘，更早些，湖北黃安的『農民政府』失敗。然而豪紳資產階級並不能消滅革命勢力。農民暴動此起彼落的仍在發展。豪紳都說：『現在世界真正翻了，鄉下一個好人也難找了，一個『靠得住』的人也沒有了，甚至六十歲的老農也揮着大刀殺人了』。這種現象尤其是在廣東湖南湖北。——報紙連篇累牘的說

『共匪』如何残忍！『瞎眼的学校　跛足的学教……』的造谣。一般人都觉得惊天动地的大变不知何时便要临到。城市工人之中，在极残酷的恐怖摧残之下，正在坚决的艰苦的团聚组织自己的力量。广州暴动不但如此的领导起农民斗争，而且领导兵士的革命运动之开始。广州暴动的有兵士参加，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新政权之发现，他虽则昙花一现，然而影响到全国兵士群众。不但广州有许多暴动工人加入军队，不但广东许多地方的武装斗争中，兵士甚至民团之加入开始与农民『联合』，投降到工农方面来。正在崩溃中的湖南军队裡，兵士大批的逃跑，或者跑到农民方面来。就是江西也有这种现象发见。其他普遍的兵乱和军队崩溃的现象，在军阀继续的混战过程中，更是不断的发生。这种影响正要扩大起来。北方的豪绅地主也觉得军队靠不住，自己天天造堡垒防备着农民。武装斗争是中国目前的最重问题——一切阶级的最重问题。国民党的反动与卖国正在一天天的『完成』。一般的经济财政的破产与全国的横征暴敛，使一般小资产阶级也日益表示不满於现状。革命在广州暴动之後，虽然在非常艰苦的胜负更迭的长期激战状态中，但是他无疑的是在高涨的形势之中。

二，武汉反动与广州暴动

武汉反动与广州暴动的意义，在上述的论断上已经说过。这期间，工农兵士的革命形势已经说过，豪绅资产阶级的情形又怎样呢？

武汉反动是革命的国民党之消灭。南昌暴动更促进一般小资产阶级领袖反动性之暴露。反动後的汪精卫政府还在高唱『东征讨蒋提高党权』。真是，这是军阀唐生智扩充地盘的假面具。唐生智取得安徽，即进而想联合孙传芳的势力打倒南京政府。武汉的豪绅地主阶级，皆汪精卫等的『党权』摧残工农之後；同样，湘鄂的豪

紳地主階級，借胡漢民蔡元培等的「老牌国民党」首先反動逼迫武漢而得到如此「圓滿」結果之後，——豪紳資產階級的當前的生死関頭，彷彿双方都覚得緩和了一下。如果四月到七月豪紳資產階級，一般而論，有些一致進逼工農的陣勢，那么，武漢政府落到反動派手裡之後，這種「一致」対於中国豪紳地主，是再也不可能再也不必要的了。中国的商業化的豪紳地主階級的本性是如此，他們内部的地方利益派別利益是如此之複雜而衝突：除非刀頭逼緊他的喉管時，他們是不能一致的。四月到七月間，南京方面蔣桂的衝突只是醞釀着，民族資產階級的領導还是有需要，需要消滅武漢的革命。四月到七月間，武漢方面唐系和譚系張系軍閥的衝突也是如此。那時豪紳與資產階級有共同的目的，救命的目的；所以南京政府是一切都用来消滅武漢，武漢方面的豪紳是一切都用来消滅工農革命勢力。「先反」後東征」的口号，在武漢是當然的現像；「共産政府」消滅之後，蔣介石便可以下野，在南京也是當然的現象。武漢反動了，国民党軍閥的混戰便開始了。

武漢的反動，彷彿使豪紳地主階級覚得危險減軽了，雖然當時的南昌暴動，有葉賀等的軍事勢力與工農共同開始反攻，但是這対於豪紳地主階級还沒有什么可怕，葉賀暫時是在「荒野之地」；工農力量已經被四月以来各地屠次的反動打擊下去，「群衆始終是沒有什么用的」！這些軍閥那時這樣想着。既然如此，那么，蔣介石也可以用不着，汪精衛更是用不着。「純粹的」反動統治痛快得多。什么実行関税自主（蔣介石），什么二五減租（汪精衛），都太麻煩，現在可以不用了。這種情形，便使「赫々乎」的武漢東征，一変而為寧漢合作，再変而為西山会議派的南京中央特別委員会——汪蔣俱倒了。

但是葉賀失敗之後，工農勢力反而高漲起來，這出於豪紳地主階級意料之外。他們一面繼續互相併吞，以求解決內部的衝突一桂系軍閥亟々乎去打唐生智，奪得武漢地盤，一面在廣東竭力攻擊汪精衛張發奎等的所謂『左派』軍事勢力，衆霸住廣衆的地盤。張黃的『左派』軍事勢力實際上也不過是『左傾』的資產階級，還夢想着以騎牆政策取得自己的政权：一面殺共產党，一面欺騙工農。這種勢力是豪紳地主階級所萬不能容忍的，因為他們還是始終『玩着民衆運動』，雖然客觀上仍旧是替豪紳資產階級維持統治，但是豪紳地主連武漢革命政府都能推翻的時候，如何還用得着他。廣東的張黃政變（十一月十七日），正是工農革命漸取進攻的形勢中，小資產階級政客的汪精衛却想與反動老手的西山会議派等，爭着做豪紳資產階級統治的代表，多見其不自量力罷了！這兩派劇烈的鬥爭（不但在廣東，並且在湖北：程潛曾經一度以汪的旗号與西山派爭），却在工農革命勢力整頓着自己的隊伍向豪紳資產階級進攻的背景裡，於是蔣介石便漁翁得利了。

工農進攻的猛烈：一直到爆發廣州十二月暴動，豪紳與資產階級覺到莫大的危机，他們覺得自己統治的根本危險，覺得這和葉賀南征，有些小小的『不同』！他們更覺得汪精衛等以前的工農，聯共，聯俄，『三大政策』的玩弄，正是罪大而惡極。汪精衛是在必去之列，同時蔣介石却又有些『必要』。民族資產階級的『較開通較全国性的』『賣国殃民政策，現在又有需要：豪紳地主的內部衝突需要民族資產階級的反革命領導权來『維持均勢』。雖然汪精衛先意承旨的叫出『殺盡共產党』？『停止一切民衆運動，與『对俄絕交』的三大政策，但是，始終是蔣介石樹起這面大旗而上台了。汪精衛等的『左派』到此便完全投降蔣介石，公推蔣介石為統

司令，而汪精衛被逐（十二月中）。

蔣介石的重新登台，完成他的反革命事業，這是豪紳資產階級所共同需用的。所以雖然內部鬥爭——如湘鄂戰爭及廣東的討張黃戰爭——繼續不斷的進行着，雖然蔣介石一派，壟斷的「包辦着南京政府，然而國民党第四次全体会議開成了，確定了一致的反動政綱，這政綱仍是（一）平民不可起来抗政，政权仍是在「有治权的軍阀官吏手裡，（二）一切宗法社会的制度須得相當保存，（三）嚴厲鎮压工農暴動，以維持工商業；（四）請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合作，和平修改条約。对帝国主义是公開的投降懺悔，說近年来是「革命的錯誤」。所以要很快取消民衆運動，改為訓練（鞭策）民衆。但是，他們之間除一致压迫剝削工農外，不能再有什么一致。蔣系桂系的互鬥立刻繼續着醞釀爆發。

自從廣東爆動後，革命的高漲進入長期激战的形式，豪紳資產階級日益感覺一班的種々的「反革命任務之困难，他們便一面數衍塞劾的維持表面上国民党的統一，一面一致的实行最残酷的压迫工農政策。他們感覺自己的实际政权已經有許多地方受着農民暴動的打擊，他們特別要保持工商業中心的权力。這些是豪紳買資產階級一致的。但是他們的不一致也開始在他們之間互爭工商業中心。「一国民党中央会議（二月間）一方面完成豪紳資產階級的反動事業，『取消一切共產党的方法與理論』，而替一年来屠殺压迫混战賣国的事業，找着『學理上的根據』。別方面就是蔣介石排斥廣西派，拉攏馮王祥的把戲。所謂北伐，实际上也是如此。蔣介石派在南方和廣西派爭着武漢（要想，派譚延愷去武漢當政治分会主席而抵制白崇禧），爭着廣州（想利用陳銘樞抵制李濟琛），收集錢大鈞方鼎英張黃旧部的繆培南等到江浙與白崇禧爭上海。廣西派却亦在收編曹生智部隊，

鮮夫葉開鑫，殘和兩湖境內的湖南派軍閥；在廣東排斥許克祥等的部隊而拉攏陳銘樞。其結果（三月底），最近是錢大鈞得了上海，李濟琛與陳銘樞暫時妥協而抓着廣州，李宗仁與白崇禧程潛等抓武漢。雖然各區域的內部伏着許多軍閥間的互相暗鬥衝突，但是暫時还沒有形成公開的战爭。因此，廣西派，蔣介石派，馮玉祥溝錫山等軍閥，表面上还以国民党的形式，結合成一種軍事同盟，與北方的軍閥对立着。国民党從革命的各階級之政治联盟，最後的变成為豪紳資產階級式的軍閥之軍事联盟。」北方軍閥是代表買办階級，最落後的大地主階級。他是帝国主义的老走狗，他的內部仍然和以前一樣，分出許多派別互鬥着。不但孫傳芳張宗昌與張作霖之間，就是張作霖一系的內部也分着新舊(1月)派而互鬥。」國民党軍閥之中，極大多數是代表商業化的豪紳地主階級，他的內部因派別利益地方利益而分成許多的個別系統，如廣西派，湖南派，馮玉祥溝錫山等々。民族資產階級的蔣介石，实际自己只有很少的黃埔式的新軍隊，他需要拉攏許多襍色部隊来做自己的勢力。」　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能力的薄弱，不但不能形成自己独立的政党和軍隊，不但不能独立的領導革命，並且不能独立的執行「反革命的任務」。不过，他在：（一）工農革命勢力日益高漲而與豪紳資產階級長期的激战状態之中，（二）在豪紳資產階級的反動联盟还沒有能完全取得買办階級的中央政府——蔣國全权政府的地位之時，（三）襍乱糾纷的各省軍閥大小混战的过程之中，他能够利用這些条件而实行領導反革命的嘗試。他要用許多表面文明口頭進步的大政方針，来表彰綜合各地豪紳地主階級殘酷無比的反对農民的政策，敷衍塗飾的維繫這種对於工農之剝削的『中央秩序』及『統一的政治』，他要做這種反革命事業的中心和指導者，因為豪紳地主階級在

危險萬分的時機，需要這種「指導者」。他用北伐的名義，用孫中山主義的名義，來牽制統轄不肯就範的豪紳軍閥，去和買辦階級爭奪賣国权。他能夠利用許多豪紳軍閥的互鬥，而实行操縱独闢的策畧，以維持自己的地位。但是，這並不是說他便能穩定自己的統治，正因此而時起々止的內部混战和糾紛，要不断的生長，而日益剝削他的統治。

總之，武漢反動至廣州暴動期间，當革命勢力經过一期散乱狀態而開始整頓自己的隊伍以反攻的時候，中国的豪紳地主階級與資產階級並未乘武漢反動完成反革命而團結一致的穩定豪紳資產階級的統治。恰々相反，他們因此而內部衝突爆裂瓦解，開始普及各省的錯綜複雜的混战。廣東暴動之後，工農兵士群衆的力量，使豪紳資產階級不能不相信自己的命運是在危險狀態之中，無產階級取得对於農民群衆的領導权，隱然團結全国各省普遍的農民騷動以至割據的勢力於自己的周圍；這時候，再加上豪紳地主式的軍閥各種的混战，便形成反動統治的更加削弱的動搖，如是為救命起見，重新要「擁戴」民族資產階級做反革命統治的領袖，民族資產階級再取得对於豪紳地主的「領導权」。可是，這和去年四月間蔣介石的領導反革命大不相同了。當時民族資產階級还是真正領導着豪紳地主派的軍力，而且征取小資產階級的群衆，以反对無產階級與農民。現在呢？民族資產階級客觀上不得不听命於豪紳地主階級，「穩定而堅决的」实行反動的賣国政策，以求穩定自己的統治。以求消滅工農革命勢力及一切稍々有革命意义的現象。他便不能不使小資產階級格外失望而不滿，開始動搖而離開他。

三、五大矛盾

中国現狀是在南北新舊軍閥激烈的互鬥混战之中，

同時也在工農革命勢力與買办豪紳資產階級的長期激战之中，這種現象顯然是武漢反動以来全国的經济政治社会的總危机，不但沒有減少，而且更加蔓延擴大起来。這是因為中国社会根本上陷於極大的極複雜的種々矛盾之中。所以客观上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雖然受着屢次的失敗與挫折，然而他觸發了這些矛盾的爆發，並不因為資產階級的背叛而能停止——而能用某種妥協的方式部份的暫時的解决這些矛盾。如是革命便有無間斷的進展之前途。這些矛盾是：

第一，是帝国主义之間的矛盾。當革命急遽的進展時，帝国主义的政策首先便是如何加速中国資產階級的背叛，如何分裂革命而取得买辦階級以外之新的破坏鎮压革命的力量。當時帝国主义者联合向武漢的進攻，如果革命内部裂痕尚未巨大至可以用强力撲滅的時候（一九二七年初），帝国主义不得不忍痛的在革命勢力之前讓步（漢口的一三交涉案），那么，革命内部的資產階級力量顯然開始背叛的時候，他们便以炮擊南京，出兵上海，軍艦屯駐武漢，以至日本大兵扼守山東等的武力政策来威脅，此時資產階級的妥協軟化——直到第一屆蔣介石政府之九月一日「实行関税自主」而不成，都是帝国主义的炮艦政策的功能。革命受資產階級背叛而完全消滅其政治中心（武漢政府）之後，帝国主义便可更加開展他们的互爭勢力範圍的政策。即時，每一個国民党軍閥都向帝国主义爭寵，都已經擺脫其俄的赤化嫌疑。於是英帝国主义收買李濟琛，從豪紳地主階級的政治代表之中找出代替以前買办階級的新走狗，而與南方更落後更商業的資產階級建立新的関係。日本帝国主义便添招蔣介石為新走狗，因為日本对華貿易，雖然也用買办，而大半都與英国不同，是直接経营的。所以他更可以利用中国的「民族資產階級」。同時，

英国帝国主义更想「稳定」中国豪绅買办资产阶级的『不稳定的统治』，造成『不稳定之稳定』，就是维持各地军阀的割拠局面。因此，他对盐税，鄧政以至関税，都先後以自己管轄全国而使各地軍阀政府略得分潤的政策来嘗試，要如此来控制全中国，於是李済深一向欢迎督港取消反帝反英口号，甚至要敷掉「血与泪」的沙基惨案紀念碑。並且應允粤漢粤九接軌停築黃浦港等的条件，去向英国借一千萬的秘密借款，這些傳聞盛極一時，一面唱着聲国後防要緊粤東不能参加北伐的論調。日本呢？他内部在一九二八年春正掀起了改選国会弾劾田中内閣的風潮，田中内閣的滿蒙積極政策，山東出兵，都是更加進攻北方中国，維持張作霖的政策。然而民政党等的工業資産階級傾向於联絡蔣介石。蔣介石下野之前便叫戴季陶到日本去联絡。『開明的日本国民』。下野之後他自己跑到日本去。最近蔣介石更在新生命雜誌上說：『更希望日本全国人士明白中日両国在世界上所處地位之重要，不僅從種々方面同情我们的国民革命而早日促進於完成。』——中日『同文同種共存共栄』的理論，成為中国国民党蔣介石派的大政方針。戴季陶在去年蔣介石到上海時，曾経致電日本前内閣（田中以前的内閣），勸日本政府『一面即日撤回日本之海軍，勿替英国負此無益之責任，一面勸英国……。』可惜『日本前内閣倒了，継起的就是田中内閣，日本就出兵山東。』以後延長着一大段田中的対華侵略史（戴季陶之『青年之路』）。最近日本改選風潮中，国民党机関报只在希望田中内閣倒台。所以蔣介石與日本的関係，表面上還是在若即若離之際。可是日本現在以要求蔣介石承認滿蒙之日本已得权利為不伐北伐之条件，李済琛向蔣介石之爭，顯然是英日之爭的反映，李済琛在廣東向英帝国主义賣国。蔣介石在南京便对

於日本惨殺福州漁民擅捕厦門的華籍韓人，日本輪船撞沉新大明輪，日本水兵殺死上海車夫等案，件々事妥協讓歩屈服以求日本的帮助．英日対華的両国衝突是很明顯的，美国就可以『超然的』取得承認自己的权利。最近関税問題上，日本反対英国易純士的政策（増関税至一二.五，即使地方政府分得関餘的政策）．因為日本有許多無担保的債款，要求関税増收做担保，同時日本輸入中国的大都是軽工業的製造品，非要求互恵関税不可，就是非反対増加関税不可．英国却在暗送秋波給南京反対，他首先与南京政府解決事案（炮撃南京案）。要蔣介石以屈服於承認開炮為不得已的条件之下去換他口頭的應允增加関税，修改不平等條約的『実恵』，蔣介石所要得的『実恵』，也只是承認南京政府。英日帝国主义的政策，就在這一『形式問題』也不能一致，他們内部引起許多矛盾衝突。其結果便是無論那一帝国主义都不能帮助豪紳資産階級統治之穩定。也不能穩定自己的対華統治。他們只能開始在各自各自找着自己的走狗而互鬥：例如北京的張作霖，滿洲的奉系舊派軍閥，廣州的李済琛，上海則用帝国立憲主义統合資産階級，運用巧妙的手腕来利用蔣桂及地方資産階級間的衝突，而自取其利（最近華董問題解決，英工部局准許三華董加入等々）。

第二是帝国主义与中国之矛盾．中国国民党先後背叛国民革命之後，他們要『剷除中国共産党的理論与方法』，這是説：中国革命無須変更土地制度，只要修改不平等条約，発展経済実業的建設，三民主义於是可以成功，而中国不但国富而兵強，並且階級都消融而全体国民到天堂上去了！但是事実上因為土地革命受着残酷的鎮圧，反帝国主义運動是絲毫不能成功．帝国主义与中国之間矛盾，並未得着甚么『修改』関税自主不能実行，

盐税邮政租界以及金融经济交通的最高权，更被帝国主义所独佔。国民党完々全々背叛国民革命，並未能以妥协手段解决任何国民革命——資産階级的民族民权革命之任務。自然現在説帝国主义与中国之間的矛盾，第一重要意义，就是国际資産階级与中国極大多数工農民众之間的利益矛盾更加剧烈的衝突起来了，因为中国豪紳資産階级轉過帝国主义方面去，然而這一矛盾仍旧同時含着帝国主义与中国資産階级之間的矛盾。不但関税問題等表面上很明顯的中外資産階级相互之间仍舊保存着矛盾而不能解决，而且混战之中帝国主义者可以利用治外法権而継続経营工商業，中国資産階级便不能，於是更加々多帝国主义独占経济最高权的力量。因此，中国資産階级是要求消滅買辦階级的北系政府而取而代之，以求北伐战争之終结而妥协手段与帝国主义磋商民族改良主義之实行。這在資産階级观点上是如此的。中国資産階级在经济上与国际資産階级的衝突是一種事实。帝国主义不到萬不得已的时候，他也不能容許对中国資産階级的任何讓步的。当武漢是革命政府的時候，帝国主义的政策是使武漢「南京化」。直接下去，便是要使南京「北京化」。帝国主义贊助南京政府去消滅武漢，贊助資産階级去消滅可能的工農小資産階级的革命政府，但是他还要進一步贊助買办階级去消滅資産階级的政府。可是這所謂「消滅」，可以是战争的消滅，也可以是政治的消滅。武漢崩溃之後，英帝国主义者立刻贊助西山会議及廣西派消滅蔣介石的較資産階级化的政府。然而革命沒有死滅，工農勢力爆裂而成廣州暴動。蔣介石重新登台，南京政府的性質，始終是帶着資産階级的性質，與北京買办階级政府相对峙。南京政府与北京政府的对抗，仍然帶着中国資産階级「反对」帝国主义的性質，——实在来説，就是一边是帝国主义買办階级，一面是資

產階級，雙方爭着剝削工農所得之利潤．資產階級總还想多要些。如果西山会議的中央特別委員会政府，不因為革命潮流高漲而倒台，帝国主义的高唱南北和議，亦許想完全和辛亥革命後一樣，可以使中国仍旧回到買辦階級式的軍閥統治．這是南京之北京化的一個方法。這就是豪紳地主階級的完全買辦化。但是歷史不是如此簡單，蔣介石上台之後，帝国主义还想做這種尝試，而至今沒有成功。第二種方法是就北京打掉南京，或是南京打掉北京，双方都可以用收編敵方軍閥的方法。可是北京打掉南京是事实上不可能的了。買辦階級完全恢復旧势力的基礎是沒有了，南京商業化的豪紳地主階級在地方市場上的力量增高了。南京打掉北京的事还有理論上的可能。於是帝国主义就要用威迫利誘的方法——如要求尊重不平等条約，或某々特殊已得权利——使南京純粹北京化。中国資產階級背叛革命而成為工農群众所絕对反对的对象之後，他是沒有能力抗拒帝国主义。所以蔣介石的北伐或者是根本不能成功或者是成功後等於不成功。北伐根本不成功，就是帝国主义的实际瓜分政策照旧的穩定下去——混战的穩定。北伐成功等於不成功，就是帝国主义的瓜分政策经過北京政府的消滅而实現出来，一高談修改不平等條約等々的蔣介石拋棄最後的假面具（或是滾蛋），而形成国民党"統一"中国之名義下的更多更碎的小軍閥割拠的局面，混战的陣势变更而混战仍旧要继续。總之，帝国主义对中国資產階級也根本不能讓什么步。

第三，就是豪紳軍閥之間的矛盾．豪紳地主式的軍閥，如何形成的呢？我們可以舉一個縮影来看，江蘇江北地方有些縣份農民的破產失業急遽而廣大，弄得遍地皆匪，而匪的首領便可以是当地的大豪紳，豪紳可以為土匪買槍彈走衙門。這種豪紳率領下的土匪往々不搶本

地而向外发展。国民党式的軍閥，便是這種性質。中国社会鉅大的「游民化」——造成二十年来兵匪現象，這是帝国主義侵略的结果，也是反帝国主义革命鉅大開展的原因之一。如此生長而向外發展的無数量的小軍閥——豪紳地主性的軍閥，居然也会在孫中山「領導」之下来「参加」革命。這是客观的事实，這是因为整個社会经济崩潰的结果：這些豪紳地主都和地方市場上的商業資本尤其是貨幣資本（Денежный капитал——錢莊当舖等）有密切的関係，全中国的這種商業貨幣資本有集中的積聚的趋势，他内部的競爭傾軋非常之劇烈，破産而失業的数量也非常之鉅大。這些鬥爭，是以地方同鄉團体或其他宗法社会関係（如同姓，親戚，同學等）的團体之名義来表現的。豪紳地主階級所以成為一個階级，只是因為他們共同維持着半封建性的对於工農的剥削制度。過此以往，他們内部的鬥爭，是複雜到十分的，二十年来中国各省小軍閥的互鬥，就是這種表演——四川福建是最明顯的例。国民党的「革命」——虽然以資產階级的蔣介石来領導，但是客观上不能不是「尾大不掉」的領導，中国資產階級只能靠着收拾這些豪紳地主階級的軍隊来革命。所以国民党的軍隊之中，分着廣西派，湖南派，馮玉祥，閻錫山以及其他賀耀祖柏文蔚等々無数的派別，派別之内又有派別，就是蔣介石的黄埔軍隊也是逐漸同化於這些性質的軍閥隊。這些派別，各自都要伸張自己的軍隊，各自都要向外發展，擴充地盤。他們之間的衝突并酋混战是不能解决的，除非兵士群众起来推翻他們，起来與工農联合自覚的参加革命，根本解决中国的土地問題。

第四，就是豪紳地主与資產階级的矛盾。資產階級是与豪紳地主結合反動的联盟。以強暴的残殺政策来取消革命——国民党的消滅与背叛是如此解釋。国民党成

為一反動联盟的党，固然，国民党还有些小資產階級的反動派在内，但是国民党四次中央会议完成反革命事業，一言以之，完成国民党的反革命化之後，实际上国民党成為豪紳資產階级的軍事联盟——一切党部的作用縮小到極点，或者公開的取消。国民党是除軍隊以外，現在沒有什么别的力量。然而並不是說他既然结合联盟，内部便沒有利益的矛盾。豪紳地主和資產階级是有矛盾的。資產階级客观上是需要全国市場的統一，豪紳地主都要廢厘金関卡以便利於自己的壟断地方市場操縱物價。資產階级是需要，譬如說，禁止棉花出口，豪紳地主实际上都可以和買办階级联合而反对禁棉出口。資產階级需要統一幣制，而豪紳地主却要霸佔地方市場的金融，利用無伝統幣吸收貧民膏血。資產階级急需要的剷大的战争（战争事实上不能免）以屠殺消滅他们所謂『過剩的人口』，就是消滅許多雜色軍隊，統一中国。但是豪紳地主都不能不各自擴充武装，從小小的民團以至軍隊，他们互相吞噬，亦就互相反对别人的侵犯。最後，一般資產階级社会，受着豪紳地主性的軍閥之苛捐雜税重々压榨而经濟財政急剧的破產，這是個根本的矛盾。最近一般資產階级及小資產階级都在抱怨国民党：北伐初起時說減少捐税，現而反而更加增多了。然而革命的工農『蠢動』，使他们又必須养着這許多軍隊，以保護自己的剥削。那就必須負担捐税，而剥削更加加重，於是工農革命的势力更加要起来反抗，而資產階级又不得不負担豪紳軍閥的更多的給養。這是資產階级自身根本沒有出路的一个矛盾。簡单生說：便是資產階级一面需要豪紳軍閥的統治以维持其剥削，别一方面又沒有這種经濟力量来维持此廣大的軍隊。於是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間工農革命愈生長，資產階级愈不能夠多多维持豪紳軍隊，直到最近，這種財政经濟的困难，便与工

農革命影响合攏起来，使軍閥的軍隊加速崩溃，兵士的騷動与暴動已经常々听見，日益成为经常的現象。所以李济琛与蔣介石的衝突，固然在政治上有些民族資産階級与豪紳地主階級的衝突之表現，但是工農革命势力蔓延幾省的農村，普遍全国的反抗抵制一切反動政府的搜括（抗税抗租等々），使治者階级的財政沒有办法，更加使資産階级与豪紳地主之間，豪紳軍閥的各派之間的衝突經常的劇烈起来；因为捐税的搜收入日益减少，經济恐慌也因战爭革命而日益加深，而軍閥軍隊之却日益增多，分贓更難分均勻了。

第五，就是農民和地主劳動和資本的根本矛盾。中国經济既然在帝国主义軍閥資産階級等的許多矛盾衝突之下，而急劇的崩溃。那么，農民和地主及劳動与資本的根本矛盾，也更加劇烈爆發起来。武漢反動之後，汪精衛等都說：「不要共産党还是要工農」，上海総商会的日報，以及一切偽善的国民党「思想家」現在都說要趕緊实行「社会政策」等々。彷彿資産階级要行什么改良以和緩革命似的。但是這不过是心願罷了。這個心願也只是表現他們的恐慌罷了。中国的工農不能「安份」下去，這是資産階級看得很清楚的。但是他們根本沒有什么能力实行改良。廣州暴動之後，我們看見豪紳資産階級不得不或公開的（如廣東湖北湖南）或者無形的（如浙江）取消减租二五及「共産時代」的劳資条件，極党猛的進攻工農，即使長江交通一時恢復，金融经济流通了些，但是這些發出許多萬數的漢口中央銀行中交鈔票，搜括了全社会之後呵，這是取消自己發的紙幣沒收了一大批民众的金錢之後呵。這種经济損失，使多少人民破產呢？所以這决不是資本家地主可以穩定自己的经济，而給工農民众以某種改良的政策的出路，只有更加多增資本家地主「恢復原狀」的進攻形势——事实上現

在是資本家地主要求一切回復去年革命運動發生以前的狀態。經濟恐慌的程度，使地主資本家不但不能實行改良政策而和緩工農革命的鬥爭，並且不得不以最殘酷的白色恐怖來勉強維持自己的生命——更談不到甚麼發展經濟等々。所以地主資本家的狀況，現在是 先々全々消滅工農運動，而實行絕無限制的剝削便不能經營自己的經濟 而這種地主資本家進攻的政策，事實上只更加破壞經濟生活，不僅武漢有十萬以上的失業工人，甚至上海的失業最近也成了日益劇烈的問題。各省的財政恐慌日甚一日，無論是北伐的戰爭或其他戰爭，都是要求巨量的籌出，要求發出庫券及種々捐稅（北方政府之苛捐雜稅至九十三種之多，南京政府則發行一千六百萬券稅庫券，軍事特捐，煤捐，煤油特稅，糖捐特稅，船稅，基主醬缸加捐，鹽斤加價 ----，使一般平民都是反對現在的統治。而國民政府的賣國政策以及外交上失敗和屈辱，更在激起小資產階級的反抗情緒，而日益暴露國民党的始終是帝國主義的走狗。

中國這許多矛盾的錯綜糾葛，並沒有得着絲毫妥協改良式的解決，並且更加深入與激厲起來，這是很明顯的。

所以：第一，廣州十二月暴動的失敗，不但不是全國的失敗，而且只是全國革命勝利的序幕。各地的農民暴動恰好連續着更加猛進，各大城市的工人雖然受着極艱苦的鬥爭，極嚴重的壓迫，然而他們的勇氣並未摧殘，他們的決心正在增長，他們正在積極團結自己的力量準備着起來鬥爭。第二，廣州暴動失敗之後，農民不但沒有離開無產階級，沒有孤立革命（例如一八四九年的法國農民）而且空前的迅速的廣泛的，佔在革命這方面來，實行革命的鬥爭。第三，廣州暴動失敗之後，中國豪紳資產階級不但沒有什么工商業的發展以達及普遍經濟

恐慌的希望，並且豪紳資產階級的經濟狀況，正在更加惡化，財政更加破坏，混战更加擴大，（北伐中的軍隊調動等々）；国民政府及北京政府的对外関係，実际上也只是更加受着帝国主义的進逼（如日本之於満洲，英国之於廣東，美国於解決寧案時的声言炮击南京為不得已侵辱中国），並沒有什么『修改国际関係』；所以，甚至一般小資產階級的民众都是失望不滿，不要說工農因此更加受着巨大的压迫和剥削了。第四，廣州暴動给了全国以工農联合兵士暴動的開始，給全国以大城市暴動战術的经验。這種情形之下，中国革命顯然是高漲的，武裝暴動奪取政权的総策略仍旧是目前的明顯，而且更加要求更具体的解答。

(四) 共產党的任務

総之，現在的形势是有兩種最複雜最劇烈的国内战爭：一是新旧南北軍閥内部相互的战爭，一是工農貧民和豪紳資產階級的国内战爭。這兩種国内战爭，都是已經早已開始，都在從爭奪各省外縣的政权，進到爭城市工商業中心的過程之中。尤其是工農貧民和豪紳資產階級的国内战爭，在方式上進到極残酷的肉搏（城市的白色恐怖與暴動地域殺戮豪紳地主）在発展形势上，處在各暴動區域的傾向於滙合数而奪取省政权，湖南南部七八縣及江西西南幾縣已經在暴動農民势力範圍之内，從萍鄉到株州從醴陵到平江也是如此。江西其他各縣，尤其湖北的各縣，以至河南南境，農民暴動及游擊战爭大小的蔓展。凡是這些革命势力都要求滙合联絡，而実事上走到奪取幾省政权的局面。這種局面日益接近，也就使江浙（江陰，無錫，江北）甚至北方的農民的自発的鬥爭，重加進於有力的情状；這種局面的日益接近，不但使廣州武漢等城市工人鬥爭的領導地位更加吃緊，使上海天津等處工人階級鬥爭更加要千萬倍的努力認真的準

備暴動的工作。

固然，在這種激战之中，農民暴動與工人運動的零星的失敗與受着大的摧残是可能的，有時足以延長奪取某省政权的時期，要求工農方面重新加多的努力，如海陸豐區域之失守；但是，這並不足以影响到革命高潮的前進。革命高潮的形势，很明顯的是在進到更加緊張的過程之中。

同樣在革命敵人方面，他們的政权已經在廣東三分之一的縣份之中動搖而喪失，湖南江西的許多縣份，湖北的甚至河南南境認真的搖動起來。革命敵人的軍隊開始崩潰，国民党反動的面目，在南京最近会議之後，在一年來日益緊張劇烈的階級鬥爭之中，以至公開的国内战爭之中，完完全全的暴露。他在群众中的信仰可以說得沒有絲毫，群众对他的毒恨，日益擴大而深入，同時共產党的威信更加深日益入廣大的工農兵士貧民群众共產党的旗幟變成一般革命的廣大民众的旗幟……正因為如此，所以国民党單關在現時僅々保有政权的地方，在一般城市之中，在拼命的压迫，以未苟延残喘，尤其是对無產階级——革命領導者的区域（工商業中心——如上海等處）他們加緊十倍百倍的压迫，用極恐怖的手段禁止工人的革命行動，不但是罷工，甚至發一張傳單也要殺頭。

大城市中的這種状况，使工人鬥爭一時不能有大規模的暴露，表面上的現象，可以說是大多数工人似乎畏縮不能鬥爭，或者少数勇敢份子要求立即武裝暴動。如果現時是不能暴動，那么，一般的日常鬥爭也不能做了。

這種状况顯然是要求無產階级政党更加加緊領導，更加認真的準備群众力量，使群众在日常鬥爭中團结自己的力量，知道達到暴動的正確道路。要知道工農兵革

命的勝利在中国要求長期的努力和犧牲，不是一擊而中，可以如此痛快而容易的。

可是有些同志，例如上海，却說現在這種情況，不但是上海革命潮流已低落，就是全国革命潮流也已低落了。這应當採取保守的策畧了。這種論調顯然是錯誤的。顯然是陷於机会主义的观点。

中国革命的發展，有經濟的歷史的種々原因，他的過程之中，表現不平衡的狀態：各省區域的革命形勢不平衡，城市與鄉村，工人農民与兵士貧民的革命勢力發展也不平衡，——五卅以來，無產階级受革命勢力受着歷次極巨大的摧殘之後，然後農民群众的土地革命方才開始得着廣大和深入的規模，兵士及一般貧民自覺的參加革命，發動得更加踴躍。這種形勢使党的任務更加加重，必須要切实注意配合各種革命力量与各省区的發動，否則，決定勝負的大發動是以使革命受着極大的損害。

現時中国共產的策畧和任務应当是：

(一) 革命勢力向反革命勢力的鬥爭既然日益緊迫的要進到奪取工商業中心的鬥爭，所以城市中認真的準備暴動的工作应加緊到十二分緊急。這就是說工人日常经濟鬥爭的發動和領導，群众赤色工会的建立——却要注意到新的方式的找着与運用，尤其是自下而上，從自厰自業自身的幹部活動形成群众中的核心。這種鬥爭過程中，加緊的切实的宣傳全国鬥爭的總策略——武裝暴動奪取政权之必要与道路。失業工人中的工作日益重要起來，不但要組織他們於工会之中，要組織他們的群众去為"恢復業"而鬥爭，並且要尽可能的領導他們以群众的示威要求政府發給津貼，開办公共食堂，宣傳失業工人有受社會供給的当然权利。這種示威的要求其運動必然要進到剧烈鬥爭的方式。同時武漢，廣州，上海，天津都

应当有系统的準備工人武装，訓練工人的暴動战術，組織赤衛軍或工農革命軍等々实际工作。

城市战工運動的策略，决不能認為应当是退讓的或是保守的，而应当是勇猛堅决的有步驟的領導並發動群众鬥爭，只要真正能團結群众起来，不論是極小的鬥爭或廣大的罷工都应当堅决的發動，雖然在鬥爭方式上採取"無党群众"方式的必要（如普通的某廠工人代表團等），但其实际上，本党及赤色工会的宣傳與組織都应当積極進行。

在国民党四次全国会議發佈停止民众運動封閉工會的命令之下，不但可以引起革命工人群众的憤激与反抗，且可以引起蒙蔽於国民党黄色工会欺騙之下的群众的憤極与反抗，因此，在這個机会之下，統一工人战線的運動是非常重要的工作，這一工作不单是在日常经濟鬥爭之下才可以作起来，而且可以在反抗禁止談話，出版，集会，結社，罷工等自由的口号之下作起来。

(二)農民鬥爭的一般自發的暴動，都应当去領導，尤其是要努力去联合各個零星区域，使擴大而形成農民割據的局面。第一，在農民群众中要廣大的宣傳土地政綱的意义，要使群众了解這個意义。農民鬥爭一起来要在土地革命口号之下行動，不致將這個鬥爭变成簡单的武装衝突的形式。第二，是要發動群众的抗稅抗捐抗租抗債等的反对豪紳政府的鬥爭。第三，要領導從上述的鬥爭而發動的一般散戮的零星的少数人秘密的游擊战爭，使進到群众的公開的游擊战爭。第四，是要領導這種群众的反抗暴動，使進於有組織有指導机関的鬥爭——鄉區的工農代表会議的建立，及農民武装的組織。——工農革命軍。第五，是要由此而創造割據的局面，联絡幾縣的勢力——作可能的联合廣大区域的群众的發動。一般的要注意城市手工工人店員們鬥爭，使縣市工人群众

中的党的基礎，確实鞏固，不但能与四鄉農民運動相联絡，而且能為農民運動的領導能与匯合農民的鬥爭势力，奪取城市的政权，使現在自发的農民攻取縣城的傾向能更進一步。同時就必須纠正現時各地党部事实上对於縣市工人運動忽畧的傾向。

(三)在目前階級鬥爭愈加劇烈的時候，反帝国主义的運動已成為一個嚴重的問題，最近的事实表現出来，不但是北方旧軍閥終始是帝国主义最馴服的工具，南方的国民党新軍閥蔣桂兩派系近亦与英日帝国主义作親密露骨的往来，這般国民党忠实同志很快的变成了帝国主义新的忠实工具。在這種新的实事之下，不但增加了革命的工農和城市貧民的階级仇恨与反抗情緒，一般小資產階級亦將不滿於国民党軍閥的這種賣国行動。因此我们須將反帝国主义的運動從革命的工農貧民群众一直擴大到城市的小資產階級身上去，這一工作在北方国素求其可能性，而在南方新的实事之下我们亦应想出種々新的方法来擴大這個運動，宣傳小資產階級反抗帝国主义，反抗豪紳資產階級的賣国行動来破坏豪紳資產階級与小資產階級的联盟。

(四)兵士運動应當在各省各縣甚至在各区各支部積極開始。一般兵士運動的組織上鼓動上方針都应為切合当地兵士群众中的要求。同時要指出工農兵联合的總意义——工農兵士群众自己取得政权，取得土地和大生產，而使成為工農貧民自己的国家公有，兵士和貧民只有如此才能解放。

(五)現時革命的一般鬥爭過程之中很重要的任務，就是改造党的任務。因為改造党的沒有澈底進行，所以新的工農指導人材沒有提拔出来，旧的一切自上而下的組織及工作方法都有許多保存着，群众鬥爭及全国範圍内的发展已经急劇的前進，而旧式的指導机関还沒有是落

後，机会主义的餘毒还是隨處表現不能代表真正群众的情绪，反而将自己的悲观恐懼和舊方法中無出路的低落情绪去影響群众。所以現在只有在一般鬥爭的過程中努力執行改造党的任務，——党内的民主化，提拔工農的指導人材，刷除机会主义的成份，黨的指導机関的真正集体化……在工人農民兵士之中發現展党的組織，建立党的群众的基礎。同時要注意秘密工作，一切疏忽而被破獲都是对於革命的損失。

這些任務是現在我党全国各地党部所必須注意去切实地執行的，現在中国革命的發展和階级鬥爭的劇烈已經要進到國内战爭的時期。革命与反革命的鬥爭，正在趁着反革命軍閥自相战爭的時机而日益擴大發展，日益進於爭奪商業中心的鬥爭，奪去一省以至幾省政權的準備，更加成為重要的問題了。

完

Стеклография КУТК. Москва. Волхонка. 16.

Мосгублит 24196 КУТК. А404. т. 1000 экз. 1928г.

2108 H